王宏凯 著



中国古代游艺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游艺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游艺文化的内容异常丰富多彩，主要的种类包括节日游艺、儿童游艺、博戏、棋弈、益智游艺、文字游艺、酒令、禽戏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游艺 / 王宏凯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8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206-8

Ⅰ. ①中…　Ⅱ. ①王…　Ⅲ. ①游戏—简介—中国—古代　Ⅳ. ①G8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6397号

中国古代游艺

著　　者	王宏凯
责任编辑	徐丽丽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0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06-8/G·1303
定　　价	25.00元

无穷的魅力（代序）

在中国游艺史上，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传说故事，记载在南北朝任昉编写的《述异记》一书中：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

樵夫王质入山伐木，忽见二童子在对弈。王质在旁津津有味地观看起来。童子将一颗枣子递给王质吃。王质便不觉饥饿了。一眨眼时间，一局棋尚未下完，王质依靠的斧头，木柄已烂尽。王质回到家中，已过了百年，旧时的亲朋都已不在人世。在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中，仙界的缥缈，人生的苦短，与围棋这种游艺活动有



王质烂柯图

机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棋弈的无穷趣味和迷人魅力。

围棋只是游艺活动中的一种，但它却反映出整个游艺活动所具有的益智、愉情、欢娱的独特功能。正因为游艺具有这一特性，所以赢得人们的衷心喜爱，并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扎下了根。千百年来，丰富多彩的游艺文化，祖祖辈辈，相承不绝，像围棋、象棋、风筝、骰子、毽子、七巧板、九连环、斗鸡、斗蟋蟀、谜语、酒令等数十种游艺项目，直到今天，仍然盛行不衰。如此众多而古老的游艺活动，能够流传千百年，并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游艺，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进行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游艺”一词源于孔子“游于艺”的话。《论语》上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要求学生要有志于儒家的思想，要遵守于道德，要依附于仁义，要熟悉六艺。这里所谓“六艺”即孔子教授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最初“游艺”一词的本义是用六艺来陶冶身心，这与今天所讲的游艺概念完全不相同。

“游艺”一词是从何时具有娱乐、游戏的含义呢？现代“游”和“遊”两字可以相通，“遊”是“游”的异体字，但在古代，两字是有区别的。“游”字的含义多与水有关。只有“遊”字才有闲暇、嬉戏的意思。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遊”字，说“闲暇无事为之遊”。表明游戏是在劳动之

余的闲暇时间内进行的。三国人张揖在《广雅》说："遨，戏也。"清朝钱大昭解释说："遨，游戏也。"宋代大学者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孔子的"游于艺"，就是"玩物适情"。因此可见，最迟在宋代，"游艺"一词已经具有玩物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

中华5000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游艺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游艺文化的内容异常丰富多彩。主要的种类包括节日游艺、儿童游戏、博戏、棋弈、益智游艺、文字游艺、酒令、禽戏等几大类。细分起来，则有爆竹、烟火、风筝、秋火、灯彩、灯谜、竹马、空竹、陀螺、赛龙舟、九九消寒图、冰嬉、琉璃喇叭、不倒翁、斗草、酒令、射覆、猜枚、划拳、投壶、六博、塞戏、双陆、樗蒲、握槊、骰子、打马、叶子戏、纸牌、麻将、升官图、蹴鞠、马球、木射、捶丸、击壤、射柳、围棋、象棋、弹棋、七国象棋、蒙古象棋、鹿棋、满洲棋、拔河、踢毽子、谜语、回文、顶针续麻、七巧板、益智图、斗蟋蟀、斗牛、斗鸡、斗鹅鸭、斗蚁、斗鱼、养金鱼等等，多达数十种。这些游艺的项目，包括原型和派生的新品种，构成门类庞杂、自成风格的中国古代游艺体系。

游艺以娱乐为目的，因游戏者亲自参与其中，所以与戏曲、歌舞等纯观赏性的艺术表演不同；游艺的许多内容与体育同源异流，它与体育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游艺主要强调娱乐消遣，不以竞技为目的。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把游艺、学问、艺术、劳作并称为“趣味主体”，认为“趣味”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他说：“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活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从梁启超此段话来看，游艺无疑是人类健康生活的必需。缺少它，人生便失去光彩，失去风趣，失去价值。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可以使人们在紧张劳动之余，得到高尚健康趣味的精神享受，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可以激发人们的各种才能，使人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得到锻炼，启迪人们的智慧。比如，踢毽子可以活动筋骨；投壶可以磨炼意志，培养注意力集中的好习惯；而谜语、七巧板、酒令、围棋、象棋等则可以锻炼和启发人的智慧。游艺活动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它是人类健康的生活需要，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游艺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轨迹，同时又是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的窗口。游艺小则关系一个人的性格与趣向，大则涉及了解一个民族。近代学者林语堂曾说：“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我们若不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我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善于创造生活的民族。了解研究中国游艺文化的发展史，无疑是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对提高现在和未来中国游艺水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游艺的起源

探讨中国游艺的起源，必然要追溯到人类的最原始时期。在距今170万年前，我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最早的人类。那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未有麻丝，衣其羽毛”。生存环境十分艰苦，但作为具有强烈动物性的原始人类的生活并不单调。在食可果腹、风和日暖的时候，他们会进行各种无意识的嬉戏，这是在动物生理机制驱动下的“娱乐原欲”。所以，中国古代典籍《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歌、音乐、舞蹈的产生是由某种激情所致，同样，娱乐游艺也源于人的生物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化，人类的各种感觉和意识变得丰富、深化起来，那种受生理机制驱使，无意识的娱乐变成了有意识的娱乐。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或游艺才开始产生。这一演变过程从击壤、球戏的产生上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至于具体游艺活动的源渊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它与社会经济、宗教、军事，以及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各种科学知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探索中国游艺起源的问题时，既要注重游艺活

动的生理性，又不可忽视它的社会性，两者应并行不悖。

一　帝尧之世，击壤而歌

击壤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游戏，相传起源于传说中的帝尧时代。东汉王充的《论衡·艺增篇》记载：

帝尧时，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这段记载是说在尧那个时代，天下太平，百姓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地生活。曾有几位年纪50多岁的老人在大路上击壤。有个看热闹的人说："真好哇！如果没有尧的恩德，这位老者哪有闲功夫玩击壤呢？"老者们听了这番议论，很不高兴，冲着他大声说："我从一清早就开始劳动，直干到很晚才休息，吃水靠自己凿井，吃粮靠自己耕种，尧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任何人也管不着我们悠闲的生活"。



击壤图

尧的时代尚处在传说阶段，那时是否真的有“击壤”之戏还很难说，不过这个有关击壤游艺的传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游艺是在人们衣食有了节余，有了闲暇时间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游艺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人们的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凭借自己创造的简陋生产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当人们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根本无暇于娱乐游艺。随着人类生活资料逐步丰富，人们在得到温饱之后，才有了闲暇时间，有了获得精神享受的要求。于是，那些曾是训练生产技能的活动便以娱乐游艺的形式再现出来，追逐演变成赛跑，攀登或许渐变为秋千、爬绳，投射发展成为投壶等游戏活动。而有些曾经是原始人类投掷工具的石球之类，则成为人们最早的玩具。就击壤来说，“壤”并不是什么高级的物品，《辞海》说：“壤，泥土的通称。”可见，击壤游戏最初采用的用具不过是最普通的土块。至于后世用木头制成的“壤”则是击壤这种游戏继续发展的产物。

进入文明社会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得到极大的提高，随之便带来两个积极的结果，一是社会产品的增加，二是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闲暇时间，于是可以充实人们闲暇生活的游艺活动便迅速地发展起来。原来简单的游艺，继续发展成较高级的娱乐形式，或衍变成各种新的游艺项目。击壤在三国和两晋时已相当流行。晋朝东吴的盛彦写了一篇《击壤

赋》，其中有“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在各种娱乐的游戏中，击壤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游戏。这时的“壤”已发展成长一尺四寸，宽三寸，前宽后窄，形状如屐（古代的一种木鞋）的木制品。宋代以后，击壤又演变成“抛堶”、“飞石”、“打板”等多种游戏。其他游艺活动的发展也无不如此。这一切都是以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基础的。

二　石球、陶球之谜

近年来，我国的考古学家在原始人生活和居住的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原始人使用过的石球和陶球。在距今约7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遗址中就有发现，不过那时制作的石球十分粗糙，数量也很少。到旧石器中期，石球的制作技术提高，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如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出土的石球数以千计。根据民族学资料研究，这些石球是原始人狩猎的简单工具。但是在一些遗址中发现的石球和陶球却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比如：西安半坡遗址一个三四岁女孩的墓葬中，出土三个石球和一个陀螺。河姆渡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都出土了陶球。陶球分实心和空心两种，并有大小之分，有红彩、黑彩不同颜色，有的镂空，斜刺花纹；有的心实如弹丸，摇之有声。这些石球或陶球的用途，尚无定论，有的认为是装饰品，有的则归入生产工具类。但我觉得，说它们是一

种进行球类游戏的玩具更合适。

首先，女孩墓葬中发现的三个石球既不是让死者像生前那样用于狩猎，也不是用石球来装扮孩子，最大的可能是让孩子能像活着的时候那样，继续玩石球游戏，过着愉快的童年生活。同时出土的陀螺也说明了这一点。其次，那些陶球质地坚脆，容易破碎，肯定不是作狩猎工具，形状也不像生活用品，从出土情况看，许多陶球都出自儿童墓葬，应当是孩子们生前所玩之物。这些说明，在四五千年前的氏族公社时代，作为狩猎工具的石球已经部分脱离生产劳动，成为人们娱乐游艺的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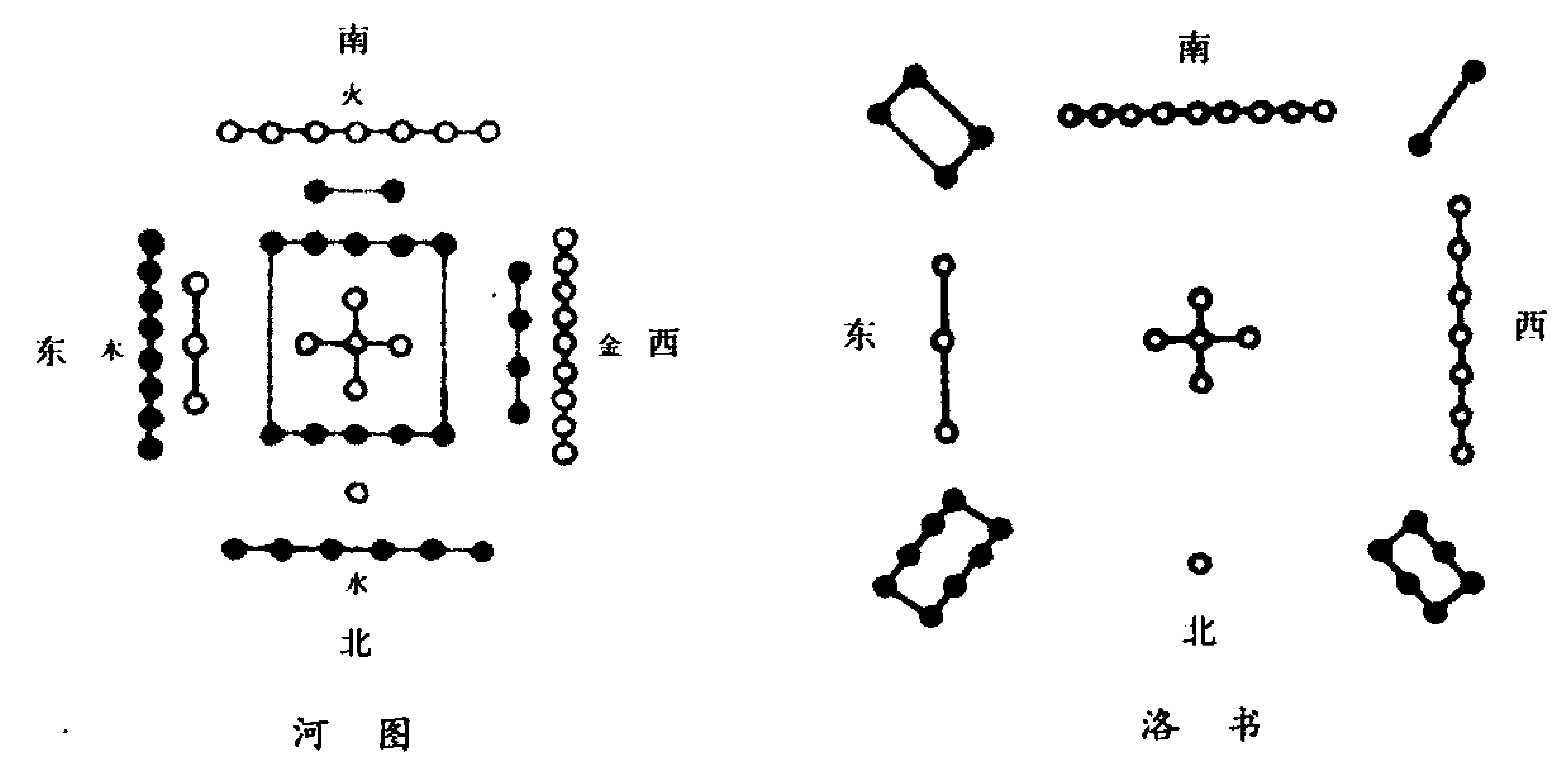
球类游戏的产生，证明了游艺活动的起源与人类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没有一种形式的游戏不是以某种严肃的工作做原型的。"从这个意义说，游艺起源于劳动。

三　洛书、九宫图和围棋

中国游艺起源于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劳动，其中，除了直接来源于生产活动中的具体事物外，还与人们对宇宙和自然的认识，以及与人们的天文、地理、气候等知识有关。

相传在远古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黄河里跳出一匹龙马，马背上画有一幅图画，人们就叫这个图为"河图"。

在夏禹治水的时候，洛水里出现一只神龟，神龟背上也画有一幅图，这个图就叫“洛书”。这两幅神秘而又奇妙的图形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宇宙自然的认识与想象。一般认为河图为圆，象征天，洛书为方，象征地。河图上的符号代表着天上的星座；洛书上的符号则代表反映地域观念的九州。后来，在洛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九宫图”。它是用9个数字代替“洛书”中的圈点而排列的图形。这种排列就是现代数学里说的幻方或纵横图。



河　图　　　洛　书

大约在宋代，人们在九宫图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数学游戏——“重排九宫”，这就是移块玩具的“老祖宗”。“重排九宫”的玩法是制作一个带有3×3个方格的方盒，里面放8块正方形木块。木块上分别写有1至8这8个数字。玩时，先把8块木块胡乱地放在方盒内，然后利用一个空的方格，使胡乱排列的木块排出一定规律的顺序来。后来，人们在“重排九宫”玩具的基础上，创造出至今仍然风靡世界的“华容道”。由于这种玩具数学道理十分深奥，

对提高智力的作用很大，所以被称为“智力游戏界的三大不可思议”之一。

河图与洛书相结合，并结合古代的八卦思想，又演变成了“太极图”。太极图中的黑白相反的对称结构暗示宇宙间阴阳的变化和自然界永不休止的运动。这种上古的思维方式在围棋这一游艺项目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围棋的圆形棋子代表天，方形棋盘代表地。黑白棋子则分别代表着阴、阳。阴阳最初的含意是指冷和热，后来便具有了抽象意义，即表示黑暗与光明，而且还表示女性和男性。古代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阴阳之气的消长与融合中发展的。围棋盘上的“天元”代表着方位坐标的中心；分布在棋盘上的8个“星”，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位；四个角上的星和天元，代表了“五岳”；四个角星则体现春、夏、秋、冬四季中最有特征的那一天。这反映了古人对地域方位和季节的认识。如果把棋盘上的天元、星构成图形，不正与“洛书”的图形相近吗？难怪古代学者，总是把围棋与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联系起来。《敦煌棋经》中说：“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元代虞集在《玄玄棋经》序中说：“夫棋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枯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虽然这些说法有封建文人墨客故弄玄虚的因素在内，但不能否认，在古人创造围棋等游艺活动的过程中，注入了他们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除围棋外，这一因素在象棋、六博、叶子戏

等游艺起源问题上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

四　黄帝作蹴鞠与尧舜造棋

中国的游艺起源于远古时代，因为那时没有文字记载，游艺产生的情况是靠世代口头相传下来的，所以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游艺起源的神话和传说，其中以黄帝作蹴鞠和尧舜造棋的传说最具代表性。

蹴鞠，亦称蹵鞠、蹋鞠。“蹴（cù）”，意思是脚踢；“鞠（jū）”即皮球。蹴鞠就是踢球，与现在的足球很相似，是我国古代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娱乐游戏。

最早记载蹴鞠活动的书是《战国策》。书上说：齐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可见，距今2300年前，蹴鞠已在齐国一带流行。《战国策》的记载仅是蹴鞠开展的情况，远不是它的起源。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写道：“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轩辕黄帝传》载：“黄帝令作蹴鞠之戏，以练武士。”这两段记载大意相近，都认为蹴鞠是黄帝发明的。

传说中，黄帝是黄河流域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生活在大约4000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所有的社会文化，都靠口头相传遗留下来。黄帝有没有创造蹴鞠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陕西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制作精细的石球。这些地区正是当时黄帝部落活动的地区。从目前考古学的研究来看，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已经发明了简单的球戏，所以，“黄帝作蹴鞠”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黄帝发明的不是后世那种用皮革制成的球，而是简单的石球罢了。

西晋张华《博物志》等文献上记载了尧、舜以围棋教育儿子丹朱、商均的故事。丹朱是尧的长子，顽劣不堪，喜欢带着随从臣仆，到各地漫游。那时洪水泛滥，丹朱不顾百姓痛苦，总是乘船到处游荡，稍不遂意，就大发脾气。尧见丹朱骄傲乖戾，教育无效，便制作了围棋来教丹朱玩，希望用棋弈来潜移默化地改造丹朱的性情。据说尧给丹朱制作的这副围棋是用文桑木做棋盘，拿犀角和象牙做棋子的。商均是舜的儿子，他少年时，骄横不驯，愚笨无知。为此，舜也用围棋来教育商均，培养他的智力。果然药到病除，两个劣子天天下棋，乐不可支，从此改邪归正了。

在象棋的起源上也有类似的传说。如，宋人晁补之《广象格》序说：“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故戏兵以象戏名之。”此外，还有舜造象棋教育商均和象的传说。象是舜的异母弟弟，性格傲慢狠毒，多次谋杀舜。为此，舜把他禁居起来，又恐他寂寞，所以为他做了象棋，使他有所娱乐。因他名叫象，所以称作象棋。

传说中的尧、舜是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人物。他们造围棋、象棋的可信度，还是一个谜。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文化遗址、仰韶

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一种“棋盘纹图案”。这种图案线条均匀，格子整齐，类似围棋盘。如，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出土一个彩陶罐，上绘有纵横各十至十三道类似围棋盘的图案。当然，这还不是棋局本身，但可以说明当时具有萌发围棋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在一些国家的百科全书中，明确写着中国围棋的发明时间。例如：《大英百科全书》中说：“围棋，公元前2356年起源于中国。”《美国百科全书》说：“围棋于公元前2300年由中国发明。”公元前2356年，即尧即位元年，这是后人依据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民报》上使用的黄帝纪年推算出来的。显然，它的根据也是“尧造围棋”的传说。诚然，这种说法未必精确，但它至少说明在国际上，不少学者都认为围棋起源于我国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

神话传说作为人们口头相传的历史材料，尽管其中有些内容荒诞神奇，但是，这些神话传说不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凭空幻想出来的，而是客观现实的曲折反映。在中国游艺起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对待这些神话传说，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

第二章

春秋战国游艺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变革时代。诸侯国的分立、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学术的空前活跃，打破了商周以来奴隶制文化的旧体制，对当时的社会风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游艺活动方面。当时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都有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和繁荣，逐渐成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在通都大邑中，出现了一些适应市民生活的游艺娱乐活动，诸如木鸢、六博、斗鸡、投壶、秋千、龙舟竞渡等。围棋、蹴鞠等游艺则有所发展，成为民间娱乐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史记·苏秦列传》记载：齐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当时和临淄相当或略小于临淄的都市还有不少，如魏的温，韩的荥阳，燕的涿、蓟，赵的邯郸，楚的宛、陈等。这些城市都很繁荣，因此，临淄兴盛的游艺活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都市游艺娱乐活动的缩影。

一　弈与博

春秋战国时期，棋类游艺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围棋更加普及，深入人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当时人们在讲其他

事物时常用围棋作比喻。比如，“举棋不定”、“专心致志”等。

围棋，又叫弈。汉杨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汉许慎《说文》解释道：“弈，围棋也，从廾，亦声。”“廾”的古文字为“{ }”字，即两人举手握棋对局的形象。“弈”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和《左传》中。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说：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不如玩玩六博，下下围棋。因为这些活动可以锻炼人的思维。《淮南子》上面也说：“以戈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广矣。”它不赞成玩“博弈”，认为用打猎下棋的时间来读书，可以增长见闻和知识。由此可见，“弈”是春秋战国时代围棋的专用书面语。

春秋战国时期还新出现一种棋戏，名叫“六博”，简称“博”，开后世博戏的先河。博戏是指各种借助骰子以赌输赢的游戏。在中国古代，博戏繁衍生息，蔚为大观，产生出六博、塞戏、樗（chū）蒲、双陆、打马、彩选、宣和牌、叶子戏、纸牌、麻将等十几种游艺项目，在游艺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六博的“博”字，也可写作“簙”。《说文》说：“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从竹，博声。”六博是在棋局上，以掷采决定下棋步数的博戏，因为双方各有六枚棋子，所以名叫“六博”。

围棋和六博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两种棋类游艺，所以，在文献中，经常是“博弈”并提。孟子认为，当时有五种不孝的行为，其中之一就是“博弈好饮酒”。后人还专门撰写《博弈论》，论述六博和围棋。不过，这篇由三国人韦曜写的文章是反对人们玩博弈的。

二　有关六博的故事

博弈之中，人们对“弈”比较熟悉，对“博”较生疏，这是因为，围棋一直流传至今，而六博早在唐代就已经销声匿迹了。由于资料的贫乏，这种游艺活动的产生时间还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商朝末年已经出现。《史记·殷本纪》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殷王武乙曾作木偶人，称它是“天神”，与它玩六博。① 中国古代神话小说《穆天子传》中说：周穆王满是个六博迷，他与神仙井公下了三天的六博，结果都输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六博已相当流行，为当时宫廷和民间喜闻乐见的游艺活动之一。

在先秦及两汉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六博的记载，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广为流传。《左传·庄公十二年》记载，春秋时，周庄王十五年（前682），宋国发生大将军南宫长万用“博局”棋盘杀死宋闵公的重大事件。原来，在

①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

此前一年，宋国与鲁国交兵，宋军大败，南宫长万被俘。后来，由于周天子的斡旋，宋、鲁和好，南宫长万被送还宋国。从此，宋闵公时常以“败军之将”、“鲁国俘囚”的话奚落南宫长万。不久，宋闵公游历蒙泽（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令南宫长万与他对博，以大金斗盛酒为罚。闵公擅长玩六博，长万连负五局，罚酒五斗，已醉到八九分了，心中不服，再请对博。闵公又是语带双关地讽刺说：“你已是常败将军，怎么还敢和寡人争胜。”长万被羞得哑口无言。恰在这时，忽报周王使臣到，说周庄王死了，周僖王即位。闵公说，要派人前去吊丧和送贺礼。长万要求充当使臣。闵公讥笑道：“就算我宋国无人了，也不至于让一个俘囚任使臣。”宫人听了都大笑起来。长万面颊红赤，恼羞成怒，酒醉性起，不顾君臣之礼，大骂道：“无道昏君，你知道俘囚也能杀人吗?”闵公怒道：“贼囚怎敢无礼!”随手拿起身边铁戟，想要刺他。长万不去夺戟，却用六博棋盘，把闵公打倒在地，再挥拳猛击，闵公竟被打死。[1]

战国时，在魏国的宫廷里，玩六博也十分盛行。一次，魏安釐（xī）王与其弟玩六博，忽然快马来报，说赵国举兵欲侵入北方的边境。魏王大惊，把棋局一推，马上就要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御敌之计。其弟却不慌不忙地说：“赵王不过是狩猎，不会进攻魏国，请大王放心下棋好了。”两人继

---

① 《左传·庄公十二年》“宋南宫长万杀闵公于蒙泽”。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载之甚详。

续对博，但魏王心不在焉，连走错棋，而其弟却镇定自如。过了一会儿，快马又来报，证实赵王确实是在打猎。从此，魏安釐王十分器重其弟，让他任大将军，参与执掌魏国的大权。魏安釐王的弟弟就是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这段故事记载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

从现有材料来看，六博不仅在东方的齐、魏、燕、赵、韩等国，而且在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也同样盛行。近年来，在湖北云梦等地的楚国和秦国的墓葬中发掘出多件六博棋具。《韩非子·外储说》中讲了一个秦昭王玩六博的故事：秦昭王酷好六博，为了做玩六博用的博剑（类似骰子的用具），下令工匠爬上险峻的华山，伐取千年松柏，只选用松柏的木心做博剑。据说，博剑长八尺，棋长八寸，上勒刻着"王与天神博于此"的文字。至今在华山东南的一座孤峰上，还有"博台"的遗址。

三 《楚辞》中的六博诗

六博棋是什么样子？它是怎样行棋的？根据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可以知道一个梗概。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曾作《楚辞·招魂》，诗歌描述了楚国宫廷的生活，表达了对楚怀王的哀悼和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诗中也写到了六博的玩法。诗中写到：

箟蔽象棋，有陆簙些。

分曹并进，遒相迫些。

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第一句，“箟蔽象棋，有陆簙些。”这是讲六博的用具。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包括箸、棋、局。箸又称“蔽”、“采”，相当于骰子，通常是用一种叫箟簬的竹子制成的。两边各置一细铜丝，中间填金属粉，外涂黑漆。由于它的一面是平的，另一面为圆弧形，所以投掷时有正反两面之分。在行棋前先要投箸，按投箸出现的结果行棋。棋子一般多为象牙或兽骨所制，所以又叫象棋。棋子六黑六红，共12枚，大小在2～5厘米之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种类，一种是12枚棋子都是正方形；另一种则是每方6枚棋子中有一枚棋子较大，称“枭棋”，其他5枚棋子较小，称“散棋”。两种不同的棋子用于两种不同的玩法。六博棋盘称“局”，是用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板制成的，正面涂白或黑漆作底色，上绘或阴刻规矩形纹槽及圆点，有的将象牙嵌入槽内。局的四个侧面多用红漆勾画各种花纹图案。贵族使用的博局也有用青铜铸造或用石板雕凿而成。

第二句，“分曹并进，遒相迫些。”这是讲行棋对博的方法。“分曹”就是分组的意思。六博本是两个人玩的，如果加入博戏的人多，就采用分曹的方法。以下六博的两人为主，其他人以一对对的方式分别加入其中一方，并将赌注加在自己参加的一方，这样就成了分曹的局面了。“并进”表示双方运子进攻。“遒相迫些”即双方相互逼迫。这是因为六博棋盘上刻有厂T的棋道，谁先争占有利的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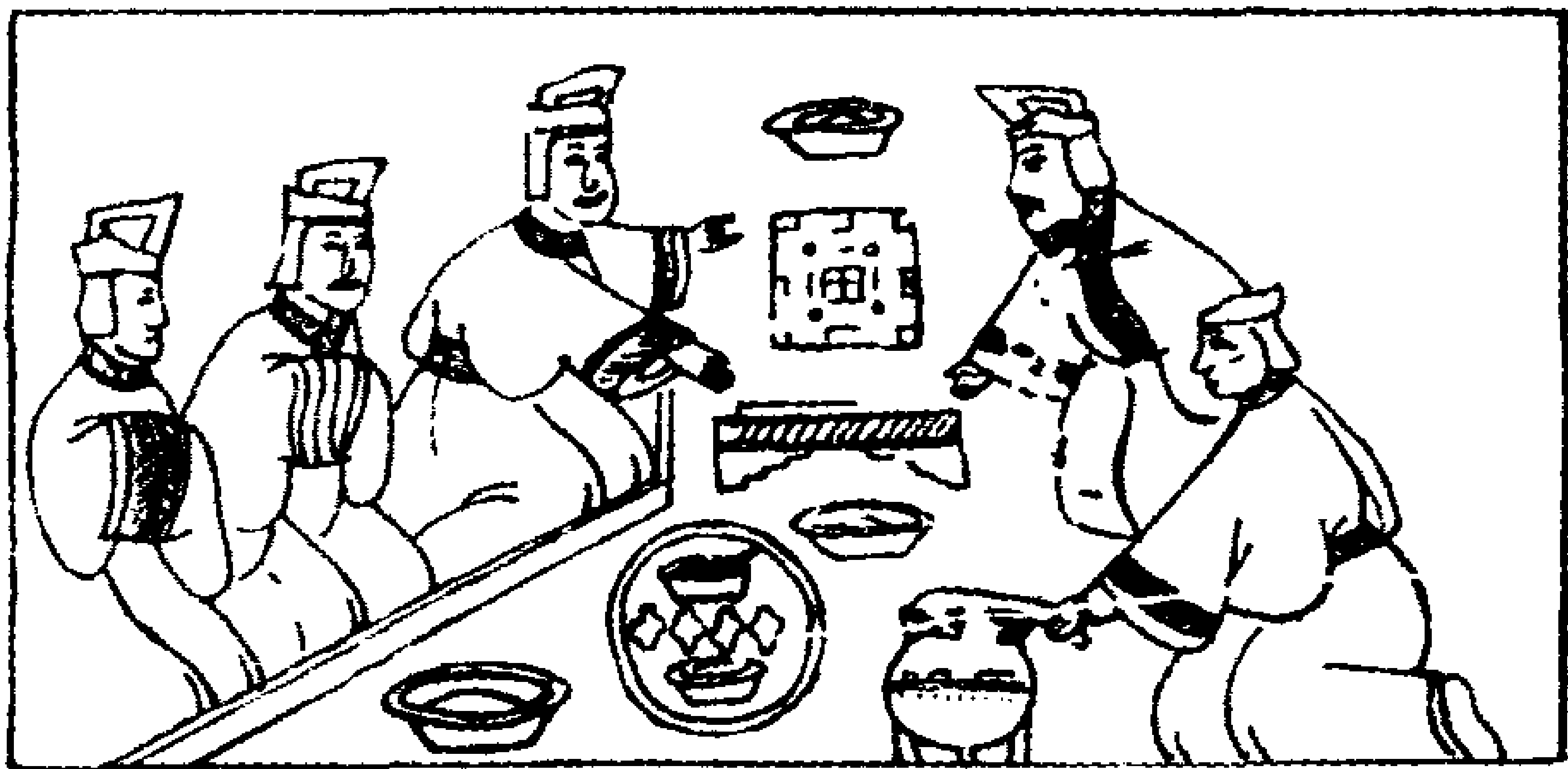
谁就有取胜的可能。《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战国末年，以刺杀秦王政闻名天下的勇士荆轲，曾游历赵国邯郸，与鲁勾践玩六博，因抢占棋道，惹得鲁勾践大怒，叱骂了荆轲。荆轲斗不过鲁勾践，只好默默地逃走。[①] 可见争道对胜败有影响。

第三句，“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是讲取胜的方法。“枭”是贵、骁、勇、健之意。枭棋不同于一般的散棋，正如现在象棋中的将、帅。对博的胜负，决定于枭棋是否被吃。《韩非子》中说：“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就是说：枭棋被吃，全盘棋就输了。在 12 枚棋子都是正方形的情况下，按六博的规则，成枭的棋，要竖起来，以示区别。“成枭而牟”就是指当自己的棋子变成了枭棋时，就高兴地叫喊起来。而散棋是否成为枭棋，关键要看掷箸的结果，“五”、“白”是最高的采，如果掷箸能成“五白”，就可获得最后胜利。所以，博者在掷箸时，往往大声喝彩，希望掷出“五白”来。

目前考古发掘出的六博实物，主要是秦汉时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少。1974 年河北平山三汲战国墓葬中出土一件石六博棋局。长 44.9 厘米、宽 40.1 厘米。局呈浅褐色，中央划一正方形，每边为一 T 形。局四边和四角划一厂形，这是局上的棋道，称作“曲”、“曲道”，简称道。在

---

① 原文为：“荆轲游予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



汉石刻《六博图》

棋道之间的空白处，雕刻着繁复的花纹。整个六博棋局十分精巧，应当是贵族所用的玩物。这个棋局，可以与《楚辞·招魂》互为补充，使我们对春秋战国的六博有更为完整的认识。

四　最早的饮酒游戏——投壶

前面讲到，秦昭王采用“博剑”来下六博。这种长达八尺的“博剑”不同于一般的“箸”，而是采用投壶的剑。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组汉代陶俑像，在六博的旁边就摆着一个投壶。《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当时城镇酒肆中，“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在这里“六博”和“投壶”并列，可见两者有着一定的联系。

有的学者认为，在采用“博剑”玩六博时，投壶是玩六博的一种程序。也就是不用箸来定采，而是以投壶的方法来决定采点，再按点数行棋。

那么，投壶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呢？原来，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弓箭的作用，并把射箭纳入到国家的礼仪之中。周代的“射礼”包括“大射”、“飨射”、“燕射”和“乡射”，其中，燕（通“宴”字）射是诸侯招待国宾一起在宴会上举行的射箭仪式。到了春秋战国时，一些诸侯士大夫并不善于射箭，但在宴会上又不能违反礼制，于是人们就用宴席上的酒壶作为箭靶，改用特制的短箭来投。这样，投壶代替射礼成为诸侯士大夫们应习的一种礼。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娱乐宾客的饮酒游戏。《礼记》是记载秦汉以前礼仪制度的重要著作，书中有“投壶”一章，专记投壶的方法礼节。蓝田吕氏在注释《礼记》的“投壶”一章说：“投壶，射礼之细也。投壶原其她也，必以燕饮之间谋以乐宾或病于不能为射也，举席间之器以寄射礼焉，此投壶所由兴也。”“细”是微小的意思，与大相对。表示投壶作为被人视为“小道”的游戏，是属于“大道”的射礼的一部分。投壶的出现是因为在宴会上要娱乐宾客，并解决不善于射箭人的问题，所以，利用宴席上的用具来代替射礼。

春秋战国时期，投壶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宫廷和民间都迅速盛行起来。《史记·滑稽列传》说：民间城镇酒肆中，男女可同座边饮酒边投壶。在宫廷中，投壶更加流行。有时在各国交往的国宴上也举行投壶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段诸侯间投壶的史事。

公元前530年，各国的君主来到晋国祝贺新继位的晋昭公，晋昭公设宴招待，并与齐景公等人一起投壶。晋昭公

先投，齐景公后投。晋国的大臣中行穆子起身致辞说："我国的酒多如淮水，我国的肉高如陵阜，我们的国君投中了这一箭，当为诸侯的盟主。"那时各国都想称霸，晋国也不例外，似乎投壶投中了便是能称霸的一个吉兆。结果晋昭公真的投中了。齐景公也不甘示弱，回敬道："我国的酒多如渑水，我国的肉高如陵阜，寡人投中了这一箭，代替你们的国君为诸侯的盟主。"结果也投中了。[①] 晋昭公和齐景公的对话使这一场投壶带上了政治斗争的色彩。他们两位能每投必中，说明水平不低，是经常玩投壶游戏的老手。

关于投壶的方法，《礼记》中的"投壶"和"少仪"篇都有详细的记载。投壶所用的壶，广口大腹，颈部细长，壶的腹内装满又小又滑的豆子，防止投的箭跃出。所用的"矢"是用柘木制成，一头削尖如刺。矢的长度有二尺、二尺八、三尺六三种，用于不同的投壶场合。一般每次比赛，只准投四根矢。

投壶之前，主人捧矢盛情地邀请客人道："某有枉（不直的）矢、哨（口不正的）壶，请以乐（娱乐）宾。"客人推辞说："子有旨酒（美酒）、嘉肴（好菜），某既赐矣，敢辞。"彼此反复谦让三次，客人才敢拜受，从主人手中接过投壶用的矢，走到宴席前投壶。客人先投，主人后投。这时，专门负责裁判的"司射"宣布："胜饮不胜者"。意

---

① "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

思是优胜者让输的一方喝酒。并奏《狸首》乐曲。“狸首”本是一诗篇的名字，后来配上了乐曲成了投壶游戏的伴奏乐。一般要反复奏五遍，第一遍乐曲是投壶前的序曲，待第二遍乐曲终了，鼓声起时，投掷正式开始，宾主更替各投一矢，然后是奏第三遍乐曲，再击鼓投矢……到第五遍乐曲和鼓声都停了，四矢也全部投完。

每投进一矢，由司射给投中者一边放上一“算”，即用来计算投中数目的用具。假如投中者高兴得忘乎所以，不等对方投掷就抢先又投一矢，即使投上了，司射也不给“算”。大概“不算”一词即由此而来。四矢投完算一局，司射为胜者“立一马”。共要进行三局，谁立三马，就算取得最后胜利。输的一方就要喝酒。这种游戏一来可使嘉宾多饮酒，以示主人盛情款客，二来可增添宴会欢乐气氛，一得两便，倍受古人的欢迎，故一直流传到近代。

五　龙舟竞渡溯源

在中国整个游艺习俗体系中，节日游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从时间上决定了人们在一年中所进行游艺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其他游艺活动大都是围绕着各个节日而展开的。在诸如元旦放爆竹；元宵观灯；清明斗草、拔河；端午赛龙舟等节日游艺中，以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龙舟竞渡为最早。千百年来，龙舟竞渡作为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

一项传统游艺活动，以其丰富的内涵，受到人民的喜爱，历久而不衰。那么，龙舟竞渡是怎样起源的呢？它起源于何时何地呢？解答这些问题，对探寻中国节日游艺的起源是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关于龙舟竞渡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美妙传说，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说法是为了拯救伟大诗人屈原。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最早讲龙舟竞渡起源于屈原投水。书中说："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后世大都沿袭这种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竞渡曲》，有"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之句。"灵均"就是屈原，因为屈原字灵均。"振楫"是挥动船桨的意思。这两句说，屈原投江之日，也就是竞渡习俗开始之时。

清朝学者赵翼曾作一首《连日竞渡再赋》诗，也认为竞渡源于屈原投江。诗曰：

竞渡传从楚岁时，为投角黍吊湘累。①

谁知千载沉渊痛，翻与人间作水嬉。

意思是说：竞渡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为了是把角黍（粽子）投给怀抱沙石投江而死的屈原。谁知道这件令人悲痛的事，千百年后竟成了人间的娱乐游戏。

除纪念屈原的说法之外，还有纪念伍子胥、勾践、马

---

① 湘累：指屈原。古代称无罪而死的人为"累"，屈原赴湘水的支流汨罗江而死，所以称屈原为"湘累"。

援、白洁夫人等说法。伍子胥是春秋时吴国大夫，曾为振兴吴国出了大力。到吴王夫差时，吴越争霸，吴国攻破越国，伍子胥劝吴王拒绝越王勾践求和，未被采纳，反而遭到疏远，后被赐剑自杀。所以吴地人说龙舟竞渡“事在子胥”[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灭吴雪耻，称霸中原，所以越地人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②] 马援为东汉著名将领，曾任伏波将军，经营陇西，功绩卓著，受到西南人民的爱戴。所以有人说：“竞渡龙舟，始于马伏波。”[③] 此外，云南大理白族说竞渡是纪念自己民族的白洁夫人，西双版纳傣族纪念的是自己贤明的国王岩洪鳖。这些传说都表达了人们一种共同的心理，即对英雄人物的崇敬与怀念。起初，龙舟竞渡所纪念的历史人物是因地而异的，随着时间的发展，伍子胥、勾践、马援的影响逐渐淡灭，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屈原以悲壮的事迹和名著《楚辞》，受到人民的敬仰。所以，一般人们都认为龙舟竞渡起源于纪念屈原。

实际上龙舟竞渡同其他游艺活动一样，也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古代，中国南方水网密布，人们以舟代步。节日里人们划船走乡串寨，碰到一起常常要比试一下划船，看谁划得快。这种活动年年相袭，并流传下来，形成最初的竞渡习俗。后来又由于宗教的盛行，人们受中国“龙神”观念的影响，将舟船作成龙形，在龙舟竞渡中注入图腾、

---

① 《荆楚岁时记》注引邯郸淳《曹娥碑》。

② 《事物原始》引《越地传》。

③ 《湖北来凤县志》卷二十八《风俗》（同治五年）。

祭神等内容，使龙舟竞渡中增加了一定的宗教性。但龙舟竞渡从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闻一多先生认为："在急鼓声中，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①]

从目前一些考古资料来看，龙舟竞渡在屈原之前就已存在。1976 年在浙江鄞县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钺。春秋时鄞县属越国。铜钺也具有明显的越族风格。铜钺一面为素面，另一面在边框线内，上方有两条相向的龙。下部以边框线表示狭长的轻舟，上坐四人，头戴羽冠，双手划船。这种纹饰被称为"羽人划船纹"。这种纹饰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铜鼓上也普遍存在。从各种划船纹的内容来看，这些船皆狭窄轻便，道尾两端高翘，装饰着"鹢（yì）鸟"纹，[②] 无桅、无篷，都用短桨。船上的人物，大都戴羽冠，基本上是两人并排划水，大多为坐姿。船头有执羽杖指挥的人。这些船纹几乎与现在的龙舟竞渡完全一样，应是当时竞渡习俗的真实反映。

无论是起源于屈原、伍子胥和勾践的传说，还是为数众多的考古资料，归结起来都说明一个史实，即龙舟竞渡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随后不断发展，由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神活动，逐步变成完全娱乐性的游艺活动，并传到北方，形成一种具有全国普遍性的节日游艺风俗。

---

① 闻一多：《端节的历史教育》，见《神话与诗》。

② 鹢鸟：一种水鸟。古越族人曾以鹢鸟为图腾。古人多将船头装饰成鹢首纹样，认为可保佑行船平安。以后它逐渐与蛇图腾结合，逐步转变为龙的图案。

六　秋千的传入

秋千是我国传统的游艺活动，古往今来，从南到北，我国各地区、各民族都盛行这种娱乐游戏，所以，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万里秋千习俗同”的诗句。

秋千的名称有许多，如荡秋、磨秋、观音秋、纺车秋、转轮秋、二人秋、担子秋等等。归纳起来，秋千的种类不外乎三种：一是传统的荡秋千，即“植木为架，上系两绳，下拴横板，人立于板上，”作钟摆一样的来回摆荡；一种是车轮秋，“磨秋”、“观音秋”、“纺车秋”等都属于车轮秋。它是“植大木于地，上安车轮状圆轮，在呈辐射状横木上，系绳于下，以架坐板。”游戏时，坐秋千的人用脚蹬地使车轮旋转，然后悬空转动；一种是担子秋，也叫二人秋，“竖长柱，设横木于上，左右各坐一个，以互落互起而飞旋不停，”类似跷跷板的游戏。

秋千一词，由来很久。相传汉武帝时，为祈祷武帝的千秋之寿，宫女们乘绳悠荡助兴，“千秋”是祝寿之词，于是将二字一颠倒，就将这种游戏称作“秋千”。[1] 明人陈卧子作诗说：“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千秋。”就是指这件事。所以后人也有称秋千为“千秋”的。清代吴景旭

---

① 《事物纪原》：“秋千者，千秋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戏。”

《历代诗话》卷五七有《千秋》诗曰："穿花蹴鞠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关于"秋千"一词产生的传说，是否表明，汉武帝时才出现秋千游戏呢？

据《古今艺术图》一书记载："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齐桓公伐山戎，此戏始传入中国。"山戎也叫北戎，春秋时代居住在今河北东部，与齐、郑、燕等国境界相接。据说山戎人大都勇猛强悍，善于攀登。荡秋千便是山戎人平时训练攀跃山崖溪流能力的一种活动。公元前663年，齐桓公为救燕国，发兵进伐山戎，一直打到孤竹（今河北卢龙）才撤兵。很可能，在北伐山戎的过程中，齐桓公看到当地人荡秋千的游戏，觉得很有趣，便把它的玩法带回了中原。

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山戎"的祖先是从西南迁移过来的，所以，秋千的源头在今天的云南。这一观点是有些道理的。首先，在我国，云南是开展秋千最活跃的地区，不仅参加的民族众多、地域广阔，而且秋千的种类齐全。其次，发现了至今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秋千的形象资料。1971年，云南博物馆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的西汉时期古墓群里，发掘出土了一面青铜鼓。在这面西汉早期的铜鼓腰部，有一组由四人同玩一个磨秋的图案。图形是：中立一柱，顶有一个中轴，上系四绳，绳端各有一环，四个古滇（云南简称）人，上身裸露，下系有"衣着尾"（古代滇人的衣饰），头戴一件羽毛装饰物，作环绕转为转。[①] 这幅秋

① 《考古》1977年第3期。

千图案证明，云南最迟在2000多年前就开展了秋千活动。

这一考古发现可以与古代文献相印证。《云南通志》记载：“壮族人知耕织，其俗以正月元日作秋千戏，殆以习轻趫而寓介寿之意欤。”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爨（cuàn，古彝族），春节，竖长竿，设横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落互起为戏。”而且，在云南壮、彝、苗、羌、黎等民族中，都流传着许多关于秋千起源的美丽动人的传说。有些传说是十分古老的。

综上所述，秋千究竟起源于何时？可谓众说纷纭。孰是孰非，还难下结论。但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秋千源于劳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活动。古代人在攀跃山崖溪流时，利用盘在树上的藤，依据自己的意志向某一方向荡去，如此便产生了秋千。二是秋千首先产生于边疆的少数民族中，像山戎或西南彝，其中以最先出现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可能性最大。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秋千由边疆传入中原，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传统游艺活动。

七　鲁班、墨子造木鸢

在中国游艺史上，还有一种流传最广、深受人民的喜爱的游艺项目，也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产生的，它就是风筝。

风筝有许多的名字，如纸鸢、鹞子、风巾、春申君、

毫见、风瓦、纸鸱等。其中以“纸鸢”和“鹞子”的名字最为古老。唐代诗人元稹《有鸟》诗说：“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宋代诗人陆游《观村童戏溪上》也有“竹马踉蹡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的诗句。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说：“纸鸢，俗曰鹞子者，鹞乃击鸟，飞不太高，拟今纸鸢之不起者。”在我国古代，南方称风筝为“鹞”；北方管风筝为“鸢”。鸢和鹞同是一种飞禽，即鹞鹰，由于这种鸟能长时间在空中平伸翅膀滑翔，看上去好像一动也不动地在空中盘旋。而古时风筝多为鸟形，凌空放飞时，双翼也是不动的，形状酷似鹞鹰，所以古人把风筝称之为“纸鸢”或“鹞子”。

风筝的起源，从目前的历史记载和发现的古代风筝看，最初的风筝问世，是受到飞鸟的启发，因而模仿飞鸟的形状制作并以飞鸟命名。同时，这一理想的实现则建立在人们对风能的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上。

鸟是人类的朋友，它赋予人们美好的理想。人类从产生之时，就希望自己能像飞鸟一样在空中翱翔。所以，在原始社会，鸟作为一种图腾受到人们的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后，鸟的图案被用于礼仪制度和民间习俗之中。周武王伐纣“以鸟画其旗”，表示正义之师，所向无敌。《诗经》中说：“织文鸟章，白旆中央”。意思是说，旆上织有鸟纹图样，白色的燕尾状飘带多鲜亮。古代军队中使用绘有鸣鸢的旗子。鸣鸢，就是张口鸣叫的鸢。古代越人以鸢为风伯，作为风神。后来，人们发明了风筝，其形状就是鸢形

的。可以说，风筝寄托着人们希望翱翔蓝天的美好理想。

要想把风筝放到天空上去，就必须懂得如何借助风力。在秦汉以前，中国人已经懂得了风能的作用。这表现在风帆、风车和风筝的发明上。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已有多种“帆”字。这说明我国人民使用风帆的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在汉代的壁画和画像石中常可以见到“风轮”的形象，造型与现代玩具风车相似，迎风即可自转。风帆利用风能作水平运动，风车利用风能作旋转运动，而风筝则利用风能作垂直和水平运动。应当说风筝比风帆和风车在风能的利用上又进了一大步。如果从使用技术的简、繁来判定它们产生的时间顺序的话，应该是发明风帆在前，风筝在后。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利用风能进行交通运输和劳动生产，而且发明了风筝，用于人们的娱乐生活。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和创造力。

风筝起源于何时？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宋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数种观点。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观点被视为定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风筝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400年的历史。此说所依据的资料是先秦古籍中关于公输般（鲁班）、墨子制“木鸢”的记载。《墨子·鲁问篇》载：

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引《朝野佥载》：

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韩非子·外储说》：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

春秋战国时代，造纸术还没有发明，风筝是用竹子或薄木制成的，所以风筝又叫“木鸢”。这些资料是关于风筝起源的最早记载，后人大都赞同这一观点。汉代王充曾说：“儒书称鲁般、墨子之巧，刻木为鸢。”唐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也说：“墨子作木鸢，飞三日不集”。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木鸢和风筝虽然都属于飞行器，但二者的性质不同：木鸢属于“扑翼飞行器”，即靠扇动翅膀，拍打空气飞行；而风筝则属于“定翼飞行器”，依靠自身与空气相对运动所产生的动力飞升。因此，不能把木鸢视为风筝的前身。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木鸢不一定是“扑翼”的，因为像现代定翼的滑翔机，同样可以在空中翱翔。因此，不能简单否定木鸢是风筝前身的论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风筝起源于秦末汉初。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有关韩信制作风筝的传说。最早记述这一传说的古籍见于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书中写到：“俗谓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高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放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也。盖昔传如此，理或然矣。”此说纯是后人推测，事迹均不见史传，因此很难认为风筝源于韩信。

第三种观点认为风筝始于五代。魏崧在《壹是纪始》中指出："纸鸢始于五代"。近人徐柯《清稗类钞》也持此说："风筝，纸鸢也，五代时，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其实，在五代以前的史书中早有关于纸鸢的确切记载，风筝源于五代的论点不攻自破。

第四种观点认为风筝起源于南北朝。《资治通鉴》卷62：梁"武帝太清三年，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胡三省注："纸鸱即纸鸢，今俗谓之纸鹞。"《南史·侯景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观点所依据的史料都来自正史，较之墨子、公输子造木鸢和韩信造风筝的传说，可靠程度要大。但这些材料只是说羊车儿使用过风筝，这不等于风筝就是他最先创造的。

在这四种观点中，从史料记载和风筝产生的客观条件两方面来分析，应该说，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风筝已经产生，它的创造者是公输般和墨子。问题在于，这时出现的"木鸢"是用竹木制成的，是后世风筝的雏形；南北朝时才出现用纸糊的"纸鸢"；五代以后定名为风筝，沿袭至今。这是中国风筝发展的三个阶段。

八　孔子的娱乐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由于历代统治者尊孔读经，重文轻武的影响，在人们

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开口仁义道德斯斯文文的老夫子。其实不然，从《论语》等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出，孔子是位很重视身体锻炼，懂得娱乐，善于娱乐的人。他关于娱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孔子认为娱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据《礼记·杂记下》记载，孔子有一次给学生子贡讲解民间年终祭祀游乐的意义，说了两句著名的话：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意思是：只是紧张而不得轻松，即使是文王、武王亦做不到；只管轻松而不紧张，那又是文王、武王所不愿意的；所以只有时而紧张时而轻松，才是文王、武王的办法。孔子用弓弩的张弛，来比喻生活的劳逸，并以此说明娱乐对修身治国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逸"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开展一些游戏娱乐活动。比如，孔子认为六博、围棋是人们度过闲暇时间的一项良好活动。《论语·阳货》说："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认为，空闲时间玩玩六博、围棋，总比无聊地什么都不干要好些，可以推想，孔子及其弟子们可能经常玩六博和围棋。

孔子重视娱乐的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倡游山登高，从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得到快乐。《论语·雍也》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他的意思是说：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喜爱山水，动静自若，从中陶冶性情，得到娱乐与长寿。《论语·先进》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孔子向弟子曾皙问道：“你的志向是什么呢?”曾皙回答说：“暮春三月，我穿上轻便的衣服，邀请五六位好友，到沂水（今山东境内）河边洗个澡，在树木成荫的祭台上吹一吹风，然后大家唱着歌，一路游玩而归。”说罢，曾皙以为老师会训斥他胸无大志。不料，孔子听了长叹一声说：“我十分赞同曾皙的志趣呀!”这个故事表明孔子是很赞同闲暇时间里从事有益的娱乐消遣活动的。

孔子不仅要求学生参加各种有益身心的游艺活动，而且身体力行，参加钓鱼、登山、弋射和田猎等活动。《论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提倡钓鱼，不赞成用网打鱼；提倡射箭，不赞成用带绳索的矢射杀鸟禽。这段话虽在于宣扬孔子的“仁”，但可知孔子是喜爱钓鱼射猎的。《孟子》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韩诗外传》记载：“孔子游于景山（今山东境内）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说明孔子多次登山游历，有时还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活动。《孟子》中还记载孔子在鲁国当官时，还抽空参加打猎的活动。

孔子是古代杰出的教育家。他提倡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教育学生，同时认为“六艺”中具有丰富的游艺娱乐的因素。他最早提出“游于艺”的观点。朱熹解释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游艺，则小

物不遗而动息有养。”[①] 这说明孔子懂得“游艺”的娱乐作用，认为消遣娱乐有助于以礼乐教化来熏陶人们，可以陶冶性情，强健身心。从此，“游艺”一词便成了中国各种娱乐消遣活动的总称。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②] 颠沛流离一世，但始终保持着乐观进取的精神，这与他的娱乐思想和身体力行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孔子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位懂得娱乐，善于娱乐，在中国早期娱乐史上有所建树的伟大人物。

---

① 《四书五经》上册，第27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

② 《史记·孔子世家》。

第三章

秦汉三国游艺

秦汉三国（前221～280）是我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时期。游艺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同样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继承先秦游艺的基础上，有所扬弃，形成了后世游艺发展的基本格局。

秦汉三国，特别是汉代，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为游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史记》上记载：汉"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老翁竟如同孩儿一般沉醉游玩嬉戏之中。另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也刺激了封建贵族追求享乐的欲望，促使宫廷游艺迅速发展起来。宫廷中大兴土木，修建游戏场所，像蹴鞠用的景福殿，斗兽用的射熊馆、别囿馆等。贵族富豪也竞相攀比，陆机《鞠歌行·序》云："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连阁遍地，鞠城弥于街路。"蹴鞠场竟侵占街道。贵族中游玩之风盛行，当时，"贵人之家"无不爱好"蹋鞠、斗鸡"。"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①] 这种奢靡之风给游艺活动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奢侈放荡的世风，引起儒士们的不满，提出要将游艺娱乐活动纳入儒家学派的礼乐制度之中，由此引发

① 《汉书·食货志》。

了关于消闲娱乐方式的争论。

秦汉是我国古代节令的定型时期。节令中浓厚的宗教色彩开始让位于游乐和欢庆的主题，从而形成多项重要的节令游艺活动，比如除夕放爆竹，元宵观灯，端午登高等。一些游艺项目进一步发展完善，产生出诸如格五、弹棋等新品种。由于匈奴的降服与西域的开辟，汉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频繁起来，在中国游艺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中外游艺交流的高潮。

一　神仙棋话

秦汉之世，宗教信仰是以上帝为首的多神教。佛教到西汉末年才由印度传来，所以，当时神仙之说十分盛行。这种社会思潮反映到游艺活动之中，便产生出丰富多彩的神仙棋话。

自古人们就认为围棋是神仙玩的游戏，“非人间之事”，“乃仙家养性乐道之具”。汉刘歆的《西京杂记》说：“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在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相传此后每年这个日子下围棋成为汉宫中的风俗。晋干宝《搜神记》则记载说：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晨星求长命乃免。”原来，民间传说南斗星主管生，北斗星主管死。但为何遇生病之事要以下围棋来决断呢？原来，北斗、南斗二星最好下围棋。

《搜神记》记载了这样一段神话传说。三国时代有位懂得鸟语的算命先生，他叫管辂。一天，他见到农夫颜超的脸色发黑，便告诉颜超三日必死。颜超跪下请求救命。管辂说："明天你带酒一壶，鹿肉一斤，到麦地南大桑树下，如看见磐石上南北坐着两人对弈，可乘他们弈兴浓时奉献酒食，必能得救。"颜超依管辂之言前去，果然见二人在下围棋。颜超送上酒食，二人一边下棋，一边饮酒食肉。过了一会儿，坐在北边的人忽然叱问道："你为什么在此?"颜超只是跪拜并不说话。南边的人说道："吃了酒食，应该回报。"北边的人便查了本子，颜超只有19岁寿命，便将"十"一撇一勾改为"九"。这样颜超有了99岁寿命。回来后，管辂说："北边坐的人是北斗星，南边坐的人是南斗星。"

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讲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武帝正在承华殿与东方朔下围棋，忽然有位身着青衣，美丽非常的仙女下界要与武帝对弈。武帝问她从何而来，仙女回答道："我乃墉宫玉女王子登，乃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过了几年，又有一位名叫卫叔卿的神仙，乘云车，驾白鹿，从天而降。汉武帝想让他在朝中任职，叔卿不言而去。武帝很后悔，命叔卿的儿子度世去找父亲。度世来到华山，在悬崖绝顶下，见父亲与几个人在绝顶上下棋，儿子问："与你同弈的人是谁?"父亲答道："有洪崖先生、许由、巢夫等人。"

麻姑是民间流传很广的仙女。相传，汉桓帝时，仙人

王方平带着妹妹麻姑来到蔡经家，与蔡经对弈。这局棋十分精彩，最后麻姑胜了半子。在明朝的《万汇先机》的棋谱中，有局棋谱叫《麻姑真迹》，据说就是这局棋。

《幽明录》中记载：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见两位仙姑，遂结为夫妇。1966年，在上海宝山顾村镇明朝墓葬中出土一件明代著名竹刻艺术家朱缨的传神佳作——刘阮入天台竹刻香熏。香熏上刻画的图案正是刘阮入天台的故事。画面上，在古松盘屈的山石下，洞门半开，门前一女子手执蕉扇，呼唤着梅花鹿和仙鹤，若有所思。前面的石桌旁坐着三个人，男女二人正聚精会神地弈棋，中间的一个男子托着腮，坦腹露脐地在观战。整个竹刻以围棋为中心，清幽飘逸，一幅动人的仙境图画。

汉代众多的神仙棋话说明了汉代围棋的盛行。

二　汉代古围棋盘

神仙棋话不管多么美妙生动，总还是人们的一种艺术的创造，那么，秦汉三国时期，围棋发展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秦朝的统治时间只有15年，有关围棋活动缺乏记载。西汉至东汉初年，六博等博戏盛行，围棋活动一度冷落，所以东汉初期班固感叹“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到汉魏之

际，围棋活动由衰转盛，百姓好尚，相习成俗。东汉王符说：当时富人“游敖博弈为事”。三国时，东吴一带“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①] 这说明围棋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围棋作为一项娱乐解乏的雅戏，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中较为流行。魏太祖曹操酷好下围棋，棋艺水平和山子道等名手不相上下。汉魏间的一些名士都会下围棋，如班固、孔融、王粲、应玚等。孔融被曹操抄家时，他“二子，年八岁，时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相传，王粲看别人下棋，可惜棋盘被碰翻，棋子散了一地，王粲帮忙拾起，棋竟归还原位，不差分毫。可见他有极强的复盘能力。曹植《祭仲宣文》称赞他“棋局逞巧，博弈唯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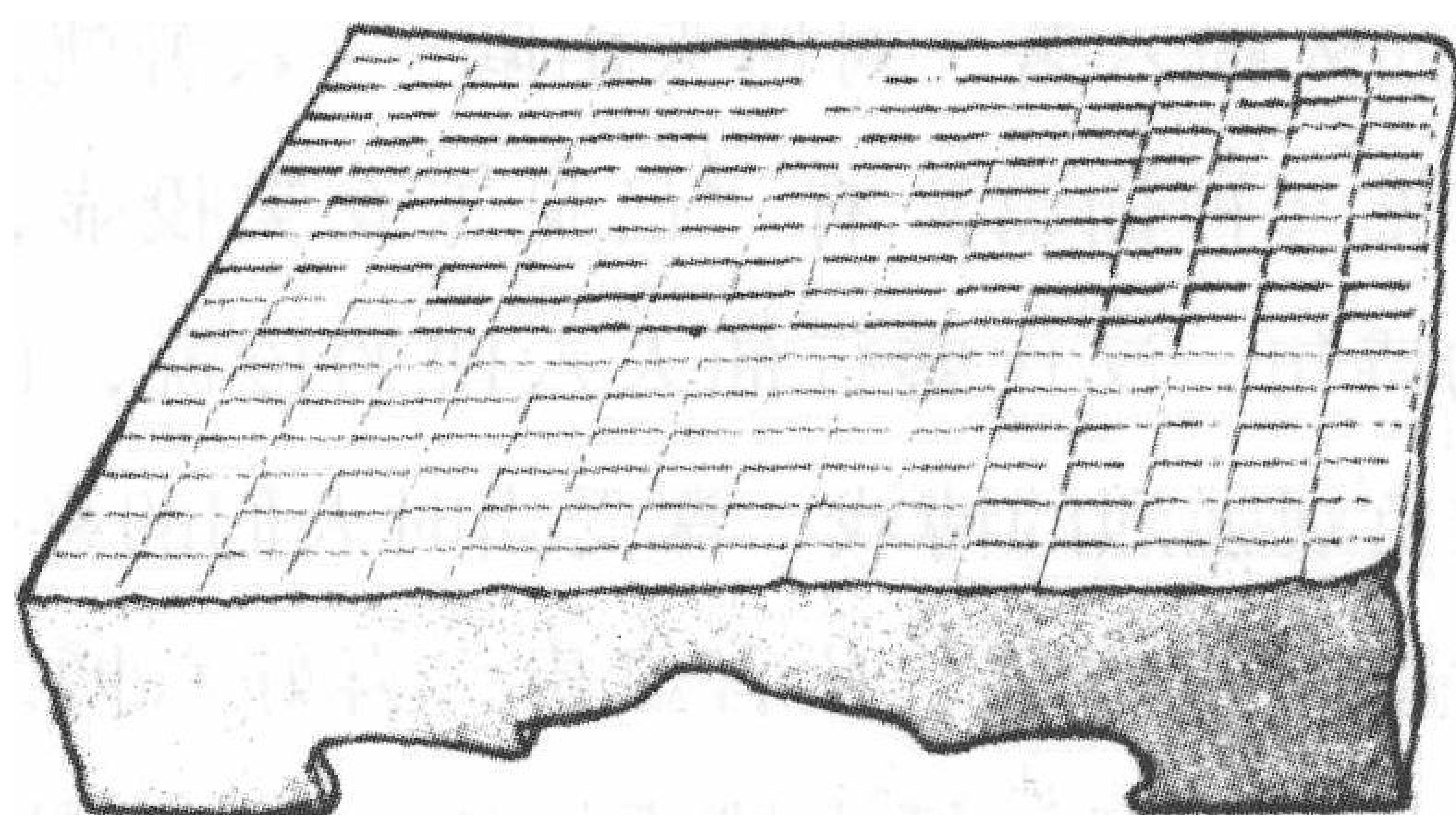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一天，他与朋友下棋，有人奔来相告：“阮伯母已去世”。对弈的人不下了，阮籍不肯，非要下完不可，终局后，他饮酒三斗，号啕大哭，吐血数升，胖汉变成了瘦子。

汉代的围棋盘与现在的不一样，是十七道的，而现在的围棋盘是十九道的。魏邯郸淳《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明胡应麟《庄岳委谭》也说：“汉制十七道”。1952 年河北望都县汉代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围棋盘。该棋盘为石质，高 14 厘米，宽 69 厘米，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盘面上纵横十

---

① 东吴韦曜：《博弈论》，见《三国志·吴书·韦曜传》。

七道，年代相当于东汉时期（25～220），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棋盘。地下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符，说明汉代流行十七道的围棋盘。



东汉围棋盘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一幅弈棋图，画中的棋盘也是十七道。这说明唐朝时在边疆地区还流行十七路棋盘，而此种棋盘传入边疆地区很可能就在汉代。现在我国西藏地区流行的藏棋，也是十七道棋盘。又据日本安永一《中国之碁》称，在20世纪50年代，锡金仍流行十七路棋盘。

三　仙人六博

六博发展到秦汉达到极盛，所以班固说："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在不断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常常可以见到"仙人六博"的图案。四川成都、彭县等地出土的"仙人六博"画像石上，两位仙人跪坐在地上，相对博戏。仙人头

上有角，身上长带飘举。棋盘两边有食具，仙人身后有仙草，天空凤鸟飞翔。当时一些怀有避世脱俗思想的文人，非常向往羽翼九天、仙人六博的生活，所以，曹植《仙人篇》说："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六著就是六博。南朝齐人张正见《神仙篇》有"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的诗句。汉代盛行仙人六博的传说，说明六博被当作一种胜负观强烈的博戏，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秦汉时期宗室贵族，达官显贵，喜好六博之戏，一时成为风尚。战国末年，奸人嫪毐（lào ǎi）依恃太后宠幸，专横跋扈，准备废秦王嬴政，作太上皇。他平日最喜好六博。秦王政九年（前238），嫪毐参加秦王冠礼，竟与左右官吏对博赌钱，口出狂言，结果招致全家被诛。汉文帝时，太子刘启与吴王刘濞的太子玩六博，因为争占棋道，竟用博局杀死了吴王太子，重演南宫长万击杀宋闵公的故事。汉代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喜好博戏，在朝廷专门设立棋博士、博诏侍，专门陪皇帝玩六博。

在皇帝的带动下，群臣百姓中也盛行六博。《汉书·食货志》说："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前，生活在民间，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陈遂是好朋友，经常玩六博，陈遂常败在宣帝手下，输了很多钱。宣帝即位后，将这位博场上的朋友提升为太原太守，并赐书说："太守的官尊禄厚，可作以前玩六博屡败的补偿。"汉代民间甚至出现经营"六博"等博戏的"博徒"。当时，一个叫恒发的博徒因此一跃成为富

翁。从这时起，“六博”被后人斥为“恶业”。

近几十年来，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六博文物被发掘出来，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秦汉时期六博的状况。

最为珍贵的六博文物是六博俑。1972 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墓中发现六博模型，有棋盘和两个对博的木俑。木俑呈跪坐式，以白、黑二色彩绘面目须发，条纹长袍，头梳圆髻。右侧俑右臂向前伸，拇、食二指握着一长方形棋子。左侧俑左手举于胸前，五指伸直，形象生动逼真。1974 年在甘肃灵台傅家沟西汉墓中出土“铜四人博戏俑”。这组跪坐博戏俑，神情姿态各异。掷彩的一方，形骸放浪，张口狂呼，袒右臂而身前扑，有的伸右臂准备掷骰子，有的扬左手以助威。另一方紧闭双唇，屏住气息，紧张地注视着对方手中的骰子，生动地展现了博戏的情景。

六博俑还为了解汉代六博的玩法提供了宝贵资料。1972 年河南灵宝张家湾出土东汉陶六博俑。一张坐榻上置长方形盘，盘的半边放着六条长箸，另半边放方形六博局。方盘上两边各有六枚方形棋子，中间有两枚圆形棋子。方盘两旁跽坐两俑进行博戏。这组六博俑表明汉代六博的玩法较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变化。春秋战国时，六博的棋子只有 12 枚，都是方形的，汉代出现了新的玩法，即利用“牵鱼”来决定胜负。所谓“鱼”就是灵宝张家湾出土六博俑中的圆形棋子。具体玩法从《列子》所引《古博经》得知：掷彩行棋，行到规定位置，可竖起，成为“骁棋”，便可以入

"水"（博局中间称作"水"）"牵鱼"，即吃掉对方的鱼。每牵一次鱼，可得二筹，如先得 12 筹，即算获胜。

六博究竟包括哪些用具，长期以来未搞清楚。马王堆 3 号西汉墓出土了一套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里。盒内有一博局，6 黑棋、6 白棋，共 12 枚，短筹 30 枚，长筹 12 枚，以及环刀和削；在盒正中有一圆窝，内置博茕（qióng，通琼字），即类似骰子的用具。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也出土了一套，包括博局、棋子、筹和木骰子。墓中的策简记录还应有"博席"和"博橐"。这些出土的六博棋具对研究六博的具体形制和玩法有重要意义。

六博游戏还影响到人们日常使用的铜镜纹饰。汉代流行一种图案与六博棋盘的曲道完全一样的铜镜。它的图案是仿六博棋盘设计的。考古界称这种铜镜为"规矩纹铜镜"，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应改称"博局纹铜镜"。这从一方面说明汉代六博游戏的盛行。

六博自汉代以后，开始衰落，其原因主要是六博主要靠掷骰，侥幸取胜，远不如围棋那样充满魅力，可以培养人的思维，启迪人的智慧，所以缺乏生命力。外因即是六博的赌博化，使它遭到正直人的抨击和批判。虽然六博未能流传到现在，但它的影响还是可以看到的，比如长方形棋子，为现在的麻将牌所沿袭。再如六博中"水"的设置，其形式保存在象棋的"界河"里。中国象棋受到印度象棋的深刻影响，而印度象棋和西洋象棋都没有界河，界河为中国独创，是从六博借用过来的。所以，对六博的研究将

有助解决不少中国游艺史上的疑难问题。

四　古代的跳棋游戏

在春秋战国之际，除六博、围棋以外，人们又创造出一种名叫“格五”的棋戏。格五与六博的区别在于六博是掷“箸”或“琼”行棋，而格五则采用一种特殊的用具——簺（sài，通塞字），所以又称为“塞戏”。格五的行棋方式，类似如今的跳棋，可以说格五是古代的跳棋游戏。

塞戏与六博相比，除行棋方式不同外，棋盘、棋子的形式与六博大致相同，可以说塞戏是在六博的基础上脱胎出来的，所以古书上常以“博塞”并称。塞戏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臧与谷两人一齐到郊外放羊，结果把羊都丢掉了。主人非常生气，问臧干什么事去了。臧回答挟着竹策去读书了。又问谷干什么事去了，谷说去玩博塞了。此外，在《管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中也有关于塞戏的记载，可见早在2000多年以前，塞戏已经在社会上流行了。

到汉代，塞戏最为盛行，当时通称为“格五”。西汉宫廷中专门设置“棋待诏”，陪皇帝和后妃们玩格五。《汉书》记载：待中中郎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他因擅长格五而召为“棋待诏”。后来升为光禄大夫。东汉的

梁冀以好游戏著称于史，《后汉书·梁冀传》："性嗜酒，能挽蒲、弹棋、格五、六博。"东汉文学家边韶（字孝先，官至尚书令）爱好格五，曾作一篇《塞赋》来记载塞戏。文章以象征的手法记述了塞戏的形制，说塞戏有四道，象征一年的四季，棋子有12枚，象征着中国古代音乐中的十二律，棋子分红白两色，象征着阴阳，等等。边韶在《塞赋·序》说："可以代博弈者曰塞。"认为塞戏是比博弈更好的棋戏，可以从游戏中使人明了天地万物、阴阳五行、四时吕律、仁义王霸等自然和社会的道理，使自己的品德得到修养。[①]

格五或塞戏失传已经1000多年，其具体制度、玩法，如今已难尽其详，我们只能结合文献材料和考古发掘的文物加以推测。有的学者认为：塞与六博的根本区别是，六博是掷骰子（箸或琼）行棋，而塞戏不掷骰子行棋，摆脱了侥幸取胜的成分。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清人郭庆藩疏《庄子·骈拇篇》所说："投琼曰博，不投琼曰塞。"[②] 实际上，从汉代的文献上分析，格五或塞戏还是采用一种类似骰子的东西——簺，掷簺，按采行棋。《后汉书·梁冀传》注引鲍宏《簺经》说："簺有四采：塞、白、黑、五，是也。至五即不得行，谓之格五。"意思是说：格五采用簺，簺有四采，即塞、白、黑、五，遇到"五"时，则阻碍不得行，

① 边韶：《塞赋》，见《古今图书集成》卷807。
② 郭庆藩：《庄子解释》卷四。

所以叫“格五”。“格”字的意思是受阻碍，被阻隔。格五称为“塞戏”，也是因为采用“簺”的缘故。

根据前人的记载，簺是一个六面体，除去两面各有一个尖头以外，还剩有四面。这四面之上是：

第一面刻一画，叫塞；第二面刻二画，叫白；第三面刻三画，叫黑；第四面不刻，叫五。

塞、白、黑代表赢，五代表输。这种四面刻采的“簺”，起着骰子的作用。明清时流行升官图游戏，使用一种骰子，也是四面，其中“德”、“才”、“功”三面表示赢，“赃”代表输。清人郭庆藩讲塞戏不用琼，是指不用那种14或18面的“琼”。

玩格五时，先掷簺，掷出塞、白、黑可按数行棋，掷到五，则停止行棋。至于如何行棋方式，类似今天的跳棋。格五或塞戏到南北朝时有所变化，棋子变为黑白各五枚。《南齐书》中说：沈文季“尤善簺及弹棋，簺用五子。”[1] 到唐宋时，称“格五”为“蹙（cù）融”。这种游戏一直流传到明清。清朝人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一《格五》条说：“今儿童以黑白棋子各五，共行中道，一移一步，遇敌则跳越，以先抵敌境为胜，即此（格五）。”可见，格五的行棋方式与跳棋相似，所以说格五或塞戏是中国古代的跳棋游戏，对后世跳棋游戏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

---

① 《南齐书·沈文季传》。

五　陈思王创骰子的误说

骰子，实在是一件奇特的游戏用具，几千年来，这个小东西不知给人们带来多少欢乐与苦恼、喜悦与悲伤！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人见之即呼赌具。不过，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许多游戏项目，如六博、格五、樗蒲、打马、升官图等都与骰子密不可分，但这些游艺项目本身早已失传，唯独骰子源远流长，存在了2000多年，至今不衰，这是中国古代游艺史上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骰子，本名投子，是中国传统的游戏用具，用来投掷，以决胜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弈旨》中说："夫博悬于投"。[①] 注："投，今作骰。"清朝人顾张思的《土风录》云："骰亦作投，以其可投掷也。"[②] 最初，骰子多为玉石质，故称作"琼（茕）"。《列子·说符》注引《古博经》云："其掷采以琼为之"。后来，投子改以骨制，便称为"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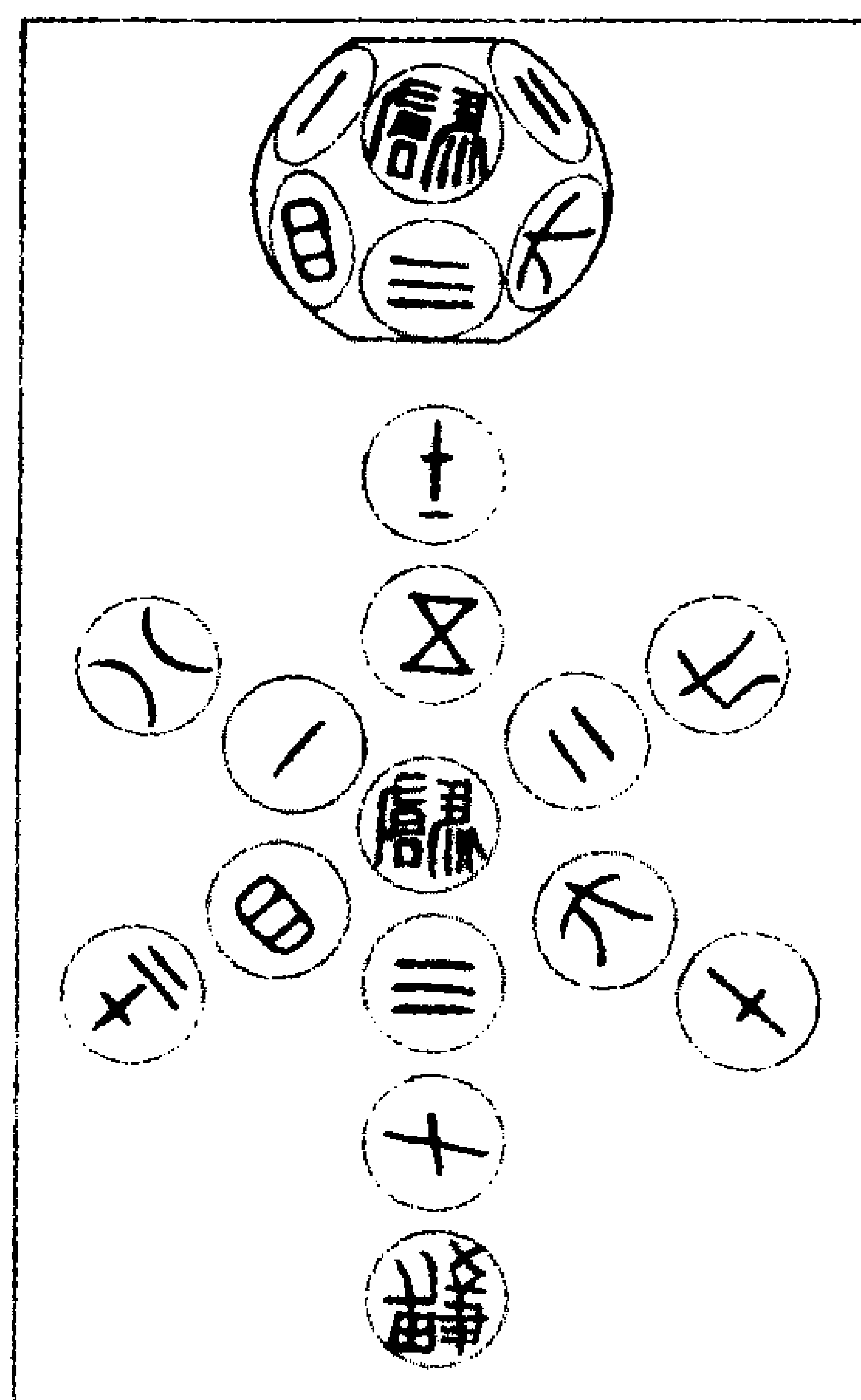
骰子源于何时，确切年代尚不可考。古书上曾记载，骰子是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植所创。明朝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某官修筑魏州（今河北魏县）城，发现数斗骰

①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

② 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五《骰子》。

子。郎瑛认为："投子乃陈思王（曹植封陈王，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所制，恐后世之莫传，故埋之以需人间玩好。"①骰子果真是曹植所发明吗？中国古代习惯于把许多事物的发明归于某一个人，如说仓颉造字等，骰子的起源同样如此。

目前我们所知中国最早的骰子实物是2000多年前秦代的骰子，它先于曹植所处时代400余年。1976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内发现一枚秦代14面体的石制骰子，12个圆面分别刻有篆字一至十二，两个对顶面分刻"骄"、"媿"二字。古文字学家认为这是一对反义字，相当于现在"输"和"赢"的意思。由此可见，骰子并非曹植所创，最初的骰子为多面体而非后来的六面体。



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石骰

当然，秦代并非骰子产生的时代，在春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出现类似骰子的游戏用具，名叫"箸（zhù）"。箸的制法比较简单，材料多用竹，共6根，为双方共同使用。箸上分别刻有枭、卢、犊、雉、塞等形象，其中一箸

① 明郎瑛：《七修类稿》。

不刻为白，按掷箸所得采来决胜负。箸形状细长像筷子，有的地方也叫作“箭”。《楚辞》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意思是说，六博游戏的玩法是投掷六根箸，按采各行手中六枚棋子，因而称作六博。因此可见，六博中所用的“箸”具有骰子的功能，它比骰子要简单，后世骰子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汉代骰子的形制基本上沿袭秦代，多为18面体的球形。近年来，考古发现汉代骰子较多，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西汉墓出土木骰一件，为圆球形18面体，除阴刻文字一至十六外，其他两面分刻“骄”和“嫖”字。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和安徽霍山县西汉墓出土的木骰与之相似，只是对称的两面刻“骄”和“䫱”两字。1968年，河北定县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一枚铜骰，为22面体，除刻一至二十数字外，另两面一为“骄”，一为“酒来”。[①] 据考证，“骄”有取胜之意，而“嫖”、“䫱”均可读作“媿”，是输的意思。而满城西汉墓出土的22面体骰子，正如《汉金文录》卷四所说，是一种酒令器，用来掷采行酒令。

在现今所见骰子中，以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的铜骰为最大，直径约5厘米；最小者是满城窦绾出土的铜骰，直径仅2.4厘米，但其工艺最精。铜骰上数字都采用嵌金地错银的工艺，各面空隙处，用金丝错出三角卷云纹，

---

① 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西汉汉城遗址等地也出土过汉代骰子。

中心镶嵌绿松石或红玛瑙，可谓汉代骰子的精品。

在汉代，骰子已经成为人们游戏娱乐活动中重要的用具之一，主要用于六博和行酒令。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木骰，都跟一整套六博棋具同出，显然骰子是六博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满城窦绾墓铜骰同出土的还有两套“宫中行乐钱”，一套20枚，其中一套分别铸20句韵语，像“起行酒”、“饮酒歌”、“饮其加”、“自饮止”等。显然刻有20数字的骰子与20枚一套的“宫中行乐钱”相配合，用于饮酒时的娱乐。很可能是宾客各执一钱，掷骰面上的数字与钱所写相符，便要饮酒。可见，骰子可单独用作酒令器。后世，酒令游戏中有“骰子令”，大约源于此时。

中国与印度、古罗马、古希腊等国家的骰子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国早期骰子的形制是14面或18面体，而印度等国一开始出现的骰子便是六面体。大约在晋朝，中国多面体骰子演变成了与现在相同的六面体骰子。

六　刘太公的爱好

《西京杂记》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原是楚国沛县丰邑的平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太公接到长安当“太上皇”。可是，尽管这位“太上皇”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仍然终天闷闷不

乐。于是，刘邦派亲信到刘太公处打听，才知道刘太公自幼生活在民间，“平生所好，皆与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而现在住在深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所以感到不愉快。于是，刘邦下令在长安城东，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模样，造起一座新城，把丰邑的百姓都迁到新城，让刘太公住在那里，满足“太上皇”斗鸡、蹴鞠的爱好，以欢度晚年。这座新城，后来被命名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潼县的新丰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汉代，蹴鞠是民间盛行的游艺活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蹴鞠引入宫中。《汉书·外戚传》记载：刘邦的皇后吕雉残害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将她囚禁在“鞠域”。所谓“鞠域”，相当现代足球场的球门。汉武帝最喜好蹴鞠。他出游长安附近离宫时，离不开蹴鞠、射猎、赛马等娱乐活动，每有感触，就命大臣枚皋吟诗作赋，讴歌蹴鞠之戏。武帝宠臣董偃擅长蹴鞠，他曾聚集各地蹴鞠、斗鸡名手在宫中举行蹴鞠、斗鸡比赛，史称“鸡鞠之会”。汉成帝嗜好蹴鞠，群臣都认为蹴鞠的活动有损健康，不是皇帝应该玩的游戏，应玩活动量不大的弹棋。三国时，曹操对蹴鞠也很感兴趣，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忘记把蹴鞠高手孔珪带在身边。

汉代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的手段，将军事训练寓于游艺娱乐之中。所以刘向《别录》中说：“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当时在长安的离宫中修建有球场，供军士举行蹴鞠比赛。《史

记》记载，汉武帝时的大将军霍去病、卫青，在出兵征讨匈奴的过程中，一到达宿营地，便平地筑球场，开展蹴鞠活动。三国时，南方东吴的士兵也是“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不出征时，经常进行蹴鞠活动，以保持军事素质。汉代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兵伎十三家”之内，可见，汉代很重视蹴鞠中的军事训练作用。

在唐代，《蹴鞠二十五篇》还流传于世，唐人司马贞讲其中有一篇《域说篇》。“域说”就是讲球门规格的，可见这部书的内容很详尽。可惜，现在这部书已失传了。我们只能从汉代的诗文中窥见汉代蹴鞠之戏的大概。东汉李尤作有一篇《鞠城铭》，十分珍贵。铭文说：

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圆的球，方的鞠场墙，这是仿照天圆地方的阴阳道理修建的。两边只有六个球门，一方有 12 个人上场。比赛时设立裁判长和裁判员，要坚持公正的游戏规则，不因亲疏的原因，偏袒任何一方。球员要作风正派，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责怪裁判员或其他什么人。

《鞠城铭》文字不多，但涉及到蹴鞠游戏的若干方面，包括场地、球具、队长、裁判、比赛规则、裁判员及球员

的道德作风等。这些内容都称作“鞠政”。汉代蹴鞠用的球，是以皮革作外皮缝制而成的。西汉杨雄在《法言》中说：“捖革为鞠”。东汉应劭《风俗通》说：“丸毛谓之鞠”。这种球是用熟皮制作的，球壳内填有弹性的东西，如毛发之类。

汉代是我国蹴鞠之戏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蹴鞠风行宫廷和民间，而且蹴鞠的体制已经基本具备，它对后世的蹴鞠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七 “舍蹴鞠而好弹棋”

汉代，蹴鞠活动盛行，尤其得到皇帝和贵戚大臣们的喜爱。但蹴鞠之戏活动剧烈，一些大臣认为玩蹴鞠有损皇帝的龙体，于是，在汉成帝时，刘向创造一种类似蹴鞠的棋类游戏，进献给皇帝，取名叫弹棋。

弹棋起源于汉代，脱胎于蹴鞠之戏，是无可置疑的，但究竟兴起于汉代何时，史书上记载不一。晋人葛洪所辑的《西京杂记》中说：“（汉）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①]《西京杂记》叙述西汉传闻遗事、掌故，所依据的史料多源于汉代，有相当高的价值。这里所

---

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工艺部》十一，第3 349页。

说的“家君”，是指刘歆的父亲刘向。南朝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巧艺注》引晋人傅玄《弹棋赋序》，亦持此说。所以，汉成帝时，刘向创弹棋是可信的。

晋人徐广《弹棋经序》中认为，早在汉武帝时，弹棋已经出现。他说：“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鞠而习弹棋焉。”[①] 这把弹棋创造的时间提前了几十年。但是这种说法有些疑问，早在汉武帝平定西域之前，蹴鞠之戏早已盛行于汉朝宫廷之中，并受到汉武帝的喜爱，说汉武帝得胡人善蹴鞠，才喜爱此戏，后又舍蹴鞠习弹棋，是不符合史实的。徐广把弹棋说成“仙家之戏”，把弹棋的创造归于被道家奉为神仙的东方朔身上，显然有附会的痕迹。

不论两说是非曲直，但有一共同之点，即弹棋之戏，创始于汉代，是依据蹴鞠之戏而发明的。

弹棋最早兴起于汉宫廷，长期流行于宫廷之中。所以，《弹棋经序》说：“习之者多在宫禁中，时人莫得而传。”[②]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腐败的统治激起绿林、赤眉起义。农民起义攻占长安，推翻了王莽政权。弹棋“于宫人所传，故散落人间。”[③] 到东汉章帝刘炟时，他喜好游戏，弹棋又复兴起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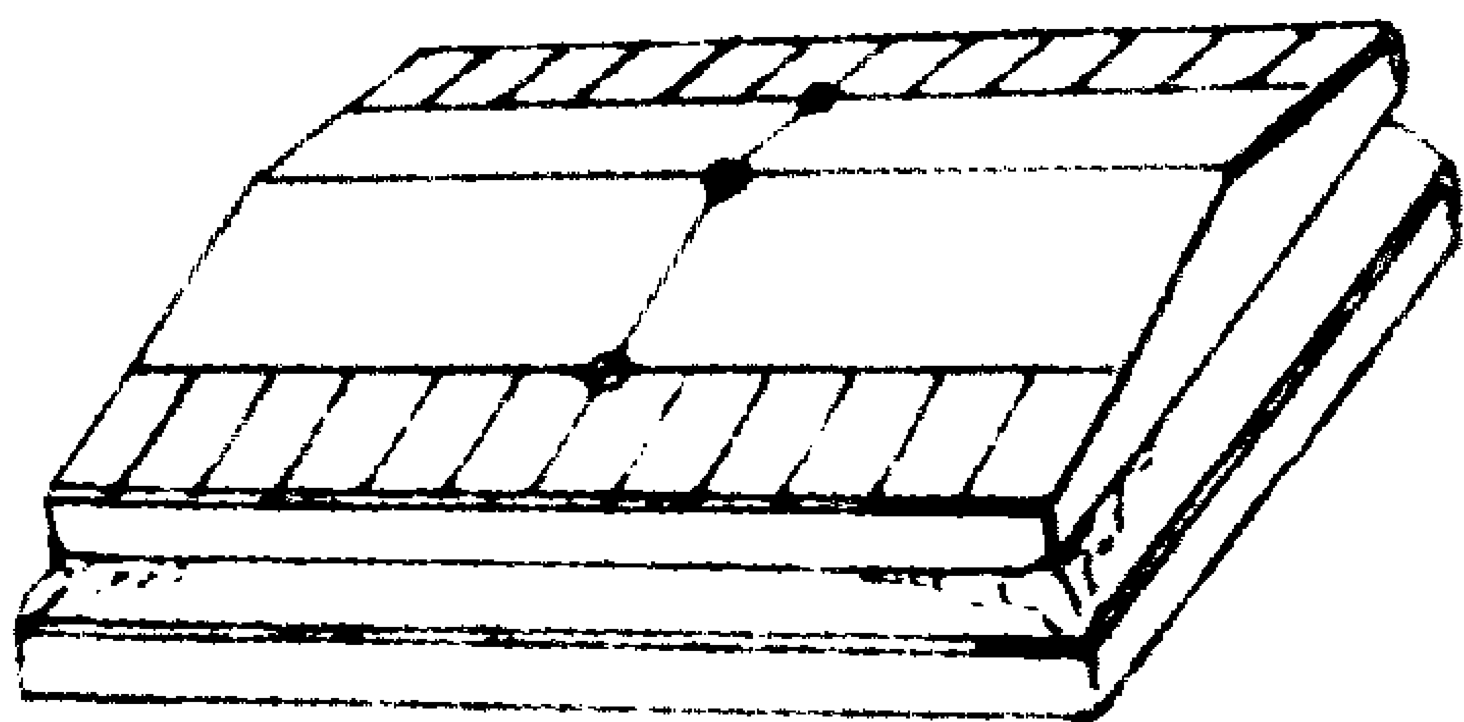
① 《古今图书集成》卷八〇一，《弹棋部》。
② 《古今图书集成》卷八〇一，《弹棋部》。
③ 《古今图书集成》卷八〇一，《弹棋部》。

弹棋与六博、围棋相比，需要较为特殊的棋具，一般百姓无力参与，仅仅是流行于贵族之间。东汉时的权臣梁冀最好弹棋，盛夏之际，袒胸露背，大汗淋漓，也要玩弹棋。他对弹棋还很有研究，曾撰有《弹棋经》一卷。汉安帝时，乐成王家中有丧事，他身穿丧服，躲在停放棺材的地方玩弹棋，受到汉安帝的严厉训斥。可见，贵族嗜好弹棋到了何种程度。达官贵人之家，每有宾客，或者玩投壶，或者六博、弹棋，招待客人。所以古诗云："玉樽延贵客，入门黄金堂。……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①] 到东汉冲帝、质帝之后，弹棋逐渐衰落。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19），曹操控制朝政，各种游戏用具都不准置于宫廷中，弹棋几乎断绝。一些宫人为了消解烦闷，用金钗、玉梳之类的小东西，在妆奁上弹玩。到魏文帝曹丕当政后，他好弹棋，此种棋类游戏才再度复兴，并一直流传到唐宋时代。

梁冀撰的《弹棋经》已失传，无法详细了解汉代弹棋的玩法。从汉文学家蔡邕《弹棋赋》和其他文献中得知，汉代弹棋的棋盘按照蹴鞠"圆鞠方墙，仿象阴阳"的思想设计成外方内圆的形状，在方形底盘上设有一个向上隆起的圆锥形体。棋盘多采用石和玉，取其坚硬平滑，便于棋子移动。两人对局，各执六枚棋子，色分黑白。玩时，用手指弹击对方的棋子，如果击中，就从棋盘上取下。技艺高超的人，可以一子连击对方数子。所以，蔡邕《弹棋赋》

① 《艺文类聚》卷七四。

中说："不迟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无与俦。"[①] 描写弹棋的击弹技巧，出手后，棋子在盘上的速度要恰到好处，慢了打不到，快了就会飞出棋盘，在恰当的击弹时，可以一子击掉对方六子。到魏晋、隋唐时，弹棋的玩法又有了新的发展。



弹棋盘

八 曹植的《斗鸡赋》

前面讲到刘太公的爱好，除蹴鞠外，他还好斗鸡。斗鸡是利用雄鸡的好斗性，来取乐消遣的娱乐活动。它将两只雄鸡放在场中，使之互相啄斗。斗鸡属于一种禽戏，古代称为"斗戏"。

要了解汉代斗鸡的情况，需追溯一下它的渊源。在中国，斗鸡的文字记载始见于春秋时代。中国有句成语叫"呆若木鸡"，形容人呆头呆脑，像木鸡一样。这个典故出自古书《庄子・达生篇》，讲的是2800年前，纪渻子为周

① 蔡邕：《弹棋赋》，见《太平御览》卷七五五。

宣王养斗鸡，经过40天的训练，这些鸡让人见了如同木头鸡，平日一动不动，而相斗起来，一般的鸡不敢与之交锋。可见，我国从很早就有了斗鸡及训练斗鸡的人。

两汉以前，斗鸡主要是皇室贵族们的玩物，一般百姓无心于此。春秋时代，鲁国的季平子和郈昭伯两家都酷好斗鸡。他们所用的斗鸡都出自山东的阳沟。阳沟是古代出产斗鸡的地方，这里的斗鸡长到3岁，就很魁伟，加上人们采用把狸膏涂在鸡头上的办法，常常战胜对手。狸，是一种善于捕捉家禽的小动物，取狸的膏脂涂抹在鸡头，就会使对方的斗鸡闻气味而畏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季、郈两家为了战胜对方，采用了“介其鸡”、“为之金距”的方法。介，就是铠甲，距，就是鸡爪。季平子把斗鸡用特制的鸡甲武装起来，增强了鸡的防御性；郈昭伯则将金属的利器套在鸡爪上，加强鸡的进攻力。一攻一防，用心良苦。魏人应玚《斗鸡》诗：“介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描写的正是这种斗法。

汉朝，斗鸡之风甚为盛行。

汉朝初年，刘太公将斗鸡带入宫中，受到皇帝、权贵的喜好。汉武帝时常与宠臣董偃“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①] 鸡鞠之会是专门斗鸡、蹴鞠，供皇帝观赏娱乐的地方。汉宣帝也喜好斗鸡，常到以斗鸡为业的“斗鸡翁”家中去游玩。汉成帝在鸿嘉年间（前20～前17），

① 《汉书·东方朔传》。

仿照汉武帝“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① 鲁恭王是汉景帝的儿子。他养了许多斗鸡和其他禽类，所花费的费用巨大，一年就耗费稻谷 2 000 石。东汉骄横一时的权臣梁冀，“好臂膺走狗，骋马斗鸡”②。

在近几年的汉代考古中，不断发现汉画像石上的斗鸡图。成都市郊出土《庭院》画像砖，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很高的望楼矗立在后面，庭院屋宇宏敞，前院两只斗鸡交颈相斗，后院两只仙鹤翩翩起舞，厅堂上宾主二人正在对饮方酣，观赏着斗鸡舞鹤。河南南阳出土一块汉画像砖，描绘了斗鸡和斗鸡人的形象。画面上，两侧各站一位斗鸡人，都戴着高冠，穿着长衣，两手前举，似在吆喝助威，中间是两只雄鸡，长颈长脚，突胸长尾，展



汉画像斗鸡图

① 《汉书·张汤传》。

② 《后汉书·梁冀传》。

翅昂首，正在交颈而啄斗。这些中国最早的斗鸡图，造型古朴，形象逼真，可以说是当时斗鸡习俗的真实写照。

三国时，斗鸡之戏仍然盛行。《邺都故事》说：太和（227～232）年间，魏明帝曾筑斗鸡台，与群臣斗鸡取乐。魏国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其中，刘桢、应玚、曹植等写下了多首吟咏斗鸡的诗篇。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儿子。他的辞赋情感炽烈、慷慨动人、词采华茂、声韵谐亮，代表着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曹植写有一篇有名的《斗鸡诗》：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游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落嘴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这首诗的大意是：人们赏舞听琴已经厌倦了，主人无所事事，客人们纷纷进献娱乐的方法。于是众人摆开长筵，来到斗鸡场观赏斗鸡。斗鸡开始了。一群雄鸡态势威猛，气盛形张，双翼高扬。他们挥动翅羽，奋激清风，悍鸷之目怒发朱光。短兵相接，尖嘴落处，轻毛飞散，利爪一抓，往往伤及对方。最后战胜者踌躇满志，长鸣入云，轻轻扇着翅膀，显示着余威。雄鸡多么希望，如果能助我以“狸膏”，那么我可以战胜所有对手。

这首诗用奇妙生动的语言，描写了鸡的争斗，有声有色，形象逼真，如在目前。而且把鸡人格化了，写出了鸡的神情，也表达了作者尽情游戏的愉快心情。这首诗以艺

术的手法再现了曹魏时代斗鸡游戏的生动情景，十分珍贵。

九 藏钩、射覆和投壶

在秦汉三国时期，酒令游戏继续发展。东汉贾逵撰有《酒令》一书，专门总结研究酒令，距今近2000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酒令专著，可惜已经失传。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新的酒令品种：藏钩和猜枚。相传藏钩游戏起源于汉代宫廷。《荆楚岁时记》记载：汉武帝的皇后赵氏，最初进宫时，两手总是蜷曲着，武帝很纳闷儿，于是亲自将她的手掰开，见里面有一枚小巧的玉钩，拿出玉钩后，赵皇后的手就伸展了。所以后人称赵皇后为“钩弋夫人”。由此，宫廷中产生了一种酒宴上的游戏，名叫“藏钩”。玩时，准备一枚玉钩，将参加游戏的人分成两组，将玉钩藏在一方手中，令另一方猜玉钩在谁的手中，猜对者要罚输者喝酒。这种游戏后来传到民间，流传不绝。唐人李白《宫中行乐词》中便有“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的诗句。

在藏钩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射覆”游戏。射，是猜的意思；覆，是以杯盘覆盖藏物的意思。这种饮酒时猜射覆盖之物以劝饮的游戏，在汉武帝的时代尤为盛行。它的游戏方法是先用杯或盘将一物覆藏于内，再令猜射识破中所藏之物，但又不能直接说出物名，而是用韵语把藏物的

形状、特点等描摹一番，最后才点出藏物。《汉书·东方朔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汉武帝宴请群臣，将壁虎藏在盆下，让大家猜，但谁也猜不出。最后让东方朔猜射，东方朔说："这个东西似龙但有角，象蛇又有腿；最善于爬墙壁，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武帝与群臣都十分惊叹。后来东方朔又一连射中了好几样东西，武帝赐给他许多宝物。

《三国志·魏书》中有管辂射覆的故事：管辂应邀到新兴太守家作客。主人将燕卵、蜂巢、蜘蛛藏在杯盆之中，让他射覆。管辂稍加思考，便说道：第一个物品，遇到合适的气候就要变化，而后飞到房屋的檐下安家，这是燕卵。第二物是倒悬在房室之上，门户众多，能到秋天便化成蜂，这是蜂巢。第三物有长长的脚，会吐丝，作网寻食，这是蜘蛛。在史书中，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管辂百发百中，令人叹服。后来，射覆继续发展，到今天，射覆演变成了填字游戏式的酒令。

在汉代，酒宴上举行的投壶游戏仍然盛行。贵族、士大夫们喜好投壶，每"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献帝春秋》里记有袁绍的投壶活动。《魏略》中记载了北地太守游楚和台郎王弼饮酒投壶，相互比试的故事。在汉画像石中也有投壶图像，这说明投壶在当时流行的情况。南阳画像石中有一幅《投壶图》，画面上中间立一广口大腹长颈投壶，壶内已投入两矢。壶侧放一个三足酒樽，樽上放一勺，用来舀酒。壶两侧有五人，其中二人投壶，每人怀抱三矢，手执一矢，向壶中投掷。画面左端一彪形大汉，已有醉意，

席地而坐，正被一人搀扶退场，显然为投壶场上的败将。画面右端有一人踞坐，双手拱抱，正在观战。这幅生动的画像石刻画典型反映了汉代投壶游戏的情况。



汉画像投壶图

这一时期，投壶游戏的方法也有变化。据《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这种名为"骁"的新投法，省去了许多繁琐的礼节，不用传统的"棘"制木质箭具，而采用竹箭，目的是为了增加箭杆的弹性，提高了投壶的技巧。旧式投壶为避免箭杆反弹出壶口，在壶中装上小豆；郭舍人去掉壶内小豆，使箭投入壶中立即反弹出来，他接箭在手，再投箭入壶，如此一投一反，连续不断。这种投法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很受人们的喜欢。不过这种投法难度较高，能"骁"的人恐怕不多。

自西汉以后，新旧两种投壶游戏并行于世。汉魏年间人邯郸淳写有一篇《投壶赋》，描写了这两种投法。赋中说当时的投壶"厥（其）高三尺，盘腹修（长）颈，饰以金银，文以雕刻。"显然这种壶已不是席间通常来盛酒的壶，

而是精工制作的游戏专用壶。汉代的投壶实物，目前发现的不多。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曾出土绿釉直颈陶壶，江苏盱眙东阳东汉墓也曾出土刻花直颈铜壶，它们的造型特点与《投壶赋》中投壶“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通高1尺2寸，约27.6厘米）的记载正相符合。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游艺

两晋南北朝（265～589）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色的时代，它并不像旧史学家所说那样是漆黑一团，是中国历史上的中衰阶段。实际上，这一时期，经济仍然继续发展，江南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经济的一个中心；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思想文化呈现繁荣景象，产生出许多发明创造，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两晋南北朝游艺在秦汉游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取得了丰富多彩的成就，具有独特的游艺文化特征。

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社会较为安定，文化发展，与北方战乱频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状况使南北游艺活动存在着相当差异。在南方，各种游艺的开展都十分广泛，水平也较北方要高，代表着这一时期游艺活动的最高成就。

两晋南北朝政治的最主要特征，是门阀士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权益的地主阶级阶层。门阀士族面对长期的政治动荡，变得意志消极，不涉实务，终日穷奢极侈，纵情享乐。史书记载："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因此，两晋南北朝游艺呈现一种畸形化的繁盛现象。一是围棋、樗蒲、握槊、弹棋等

室内游艺达到极盛。士族文人“尤好蒲弈，日夜不息”，甚至母亲去病，仍对弈不停。而活动量较大的蹴鞠、秋千、赛龙舟等室外游艺相对衰落。二是博戏盛行。樗蒲、握槊、弹棋、骰子、斗鸡、斗鹅鸭等游艺中都含有浓厚的赌博性，甚至用围棋来赌博。如谢安与谢玄曾“以围棋赌别墅”；梁武帝与臣子到溉对弈，赢得到溉家奇特的“到家石”。这无疑是两晋南北朝游艺中的消极方面，而另一方面，由于士族文人多不务政事，专心于棋类、投壶、斗鸡等游艺活动，使得这些活动得到发展，水平有显著提高。

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是这一时期又一特点。这使得多民族之间的游艺有了交流发展的机会。比如，围棋、蹴鞠等游艺在鲜卑、突厥、匈奴等民族中的流行。《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同时，像樗蒲、握槊等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游艺也非常盛行。可以说，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各民族游艺交流的第一个高潮。

魏晋南北朝游艺具有许多特点：第一，游艺发展极不平衡，南北存在差异；第二，各种球类游艺衰落，围棋和博戏空前盛行；第三，出现握槊、斗鹅鸭、养金鱼、回文诗等新的游艺品种；第四，中外游艺交流进一步发展，六面骰子传入中国，樗蒲等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总之，两晋南北朝的游艺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处处呈现汉唐两大盛世间过渡时期的风貌，它为隋唐时期的游艺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 “忘忧清乐在枰棋”——围棋高潮的到来

围棋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展最为广泛的游艺活动之一。爱好围棋的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帝王、权贵、文人和普通百姓，这是前所未有的。梁朝沈约《棋品序》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生动地表述了这一时期的围棋盛况。所以，两晋南北朝被认为是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

晋代棋风很盛，在史籍不乏记载。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就颇好下围棋。《晋书·杜预传》记载：一日，司马炎与中书令张华弈棋，大将军杜预奏问伐吴的日期，司马炎正弈得高兴，随便回答：“留待明年”。张华赶忙推开棋盘，进谏道：“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民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司马炎听了，很是赞同，便立即下令择吉日出兵。280年，晋兵20万，渡过长江，迅速灭掉了东吴，俘虏吴主孙皓。《晋书·王济传》记载：司马炎常与王济对弈。一天，他与王济对弈正酣，软禁在宫中的孙皓在旁边看棋。司马炎曾听说孙皓为政严酷，常挖人眼，剥人的面皮，突然问孙皓为什么要剥人皮？孙皓见王济把脚伸到了司马炎的前面，便故意说：“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要被剥皮。”在著名棋谱《忘忧清乐集》中保存有一局“晋武帝王武子弈棋谱”。王

武子，就是王济。

在众多酣好围棋的权贵、世家大族中，王、谢两大家族的棋风最盛。《晋书·王导传》记载：王导与大儿子王悦弈棋。平日谦恭的王悦，在棋桌上却寸步不让，着着进逼，使王导无可奈何。王导笑着对儿子说："亏得有父子的骨肉缘分，否则要逼我走投无路了。"王导的小儿子王恬，棋艺更高，被称为"中兴第一"。王导与他下棋，要被受二子。王导有位从兄王澄，自少年时代便与王导齐名，曾官任荆州都督。但因他"与内史王机日夜纵酒博弈"，多次被当时农民起义军打败，结果被免职。

谢家成员中，谢安的名望最高。他平日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和尚支遁和中郎官王坦之等好友聚会弈棋。据说，东晋穆宗永和九年（357）暮春之初，王羲之等42位朋友相聚在绍兴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对弈抚琴。其中就有谢安、殷浩、褚裒（póu）三位围棋高手。

谢安在淝水之战中"赌墅"、"折屐"的两个围棋故事，也十分有名。383年，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准备一举消灭东晋。谢安与其侄谢玄率领8万军队迎敌。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使东晋朝野惊慌不安，身负重任的谢安却镇定自若，约集亲朋好友到乡间别墅游玩，还要与谢玄下围棋赌别墅。棋艺本来稍低的谢安，反而胜了棋高一着、但心神不宁的谢玄。谢安的从容镇定稳定了军心。不久，东晋军队在淝水大破苻坚百万大军。战报传来，谢安正与客人下围棋。他心里十分高兴，但不改常态，若无其事，

继续下棋。而下完棋后回到屋内，因为高兴，不觉得把木鞋的钉齿也撞断了。谢安忧喜不变色的涵养深受后人的赞赏。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缂丝《谢安围棋赌墅图》，清代苏六朋也画有一幅《东山报捷图》，东山是谢安的号。元代著名画家王恽绘有《谢太傅弈棋图》，并题诗云：

胜负胸中料已明，又从堂上出奇兵。

怡然一笑楸枰里，未碍东山是矫情。

南北朝时，围棋之风盛行不衰。史书上记载，南朝宋少帝"游戏无度"，其弟庐陵王"警悟好弈"。宋文帝与黄门侍郎羊玄保赌棋，竟官升宣城太守。宋明帝棋艺不高，但大家捧他为三品。一次，他与一品王抗对弈，一条长龙断了就归不得家，王抗恭维道："皇帝妙棋，臣抗不敢断。"明帝信以为然，下棋的兴趣越来越浓。更有甚者，尚书右丞罗彦运常与明帝下棋，其妻很不高兴，抓破了罗彦远的脸。明帝看了便说："我为你治疗，如何?"罗彦远回答道："听从圣旨"。晚上，明帝竟下旨赐死罗彦远的妻子。

齐高帝萧道成下起围棋来"累局不倦"。梁武帝萧衍"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北魏世祖拓跋焘也着迷围棋。一次，他与给事中刘树下棋，大臣古弼急事奏报，世祖专心下棋，没有发觉，古弼气得火冒千丈，上前揪住刘树的头，"以手搏其耳，以拳殴其背"，说道："国家治理不好，都是你这种人的罪过。"世祖闻言道："下棋而不听大臣奏报，实在是我的过失。"

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风行，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

所谓“竹林七贤”。他们在政治上崇尚无为，思想上趋向神秘主义，在行动上则表现为放荡不羁，纵酒行乐，不拘礼法。在游艺娱乐上则常常是纵欲享乐，下棋无度。这样的例子很多。《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是一个很讲孝道的人。母亲去世时，他正与人下围棋，对方提出停止，阮籍坚持下到底。一局终了，他一口气喝下二斗酒，放声悲号，吐血数升。《世说新语》记载：中书令王坦之，在守丧时，只要有好友来，他就不顾礼教关于丧期不能作乐的禁忌，公然与好友下棋。

这种文人豁达、任诞的棋风到南北朝时仍然风行。《南齐书》记载：494 年，萧鸾带兵攻入皇宫，杀死即将登基做皇帝的郁林王。吏部尚书谢瀹（yuè）正与客人对弈，左右惊恐万分，纷纷逃走。谢瀹镇定自若，专心下棋，若无其事。局终，竟坦然回家休息。若论胆量和酷好围棋的程度，谢瀹还比不上刘宋时的王彧（yù）。王彧，字景文，他的名与宋明帝相同，所以遭到宋明帝的妒恨。宋明帝派使臣送毒药赐他自尽。使臣送来敕书时，王彧正在下围棋，读完后神色怡然不变，将敕书放在棋盘下，继续与好友对局，为局上的一处劫争绞尽脑汁。待一局终了，他将棋子整整齐齐收入棋盒，才从容地告诉棋友自己奉敕赐死，拿出使臣送来的药酒道歉地说：“此酒不可相劝”，然后一饮而尽。这段故事可谓惊心动魄了。

围棋，有不少雅号，其中最主要的“坐隐”、“手谈”、“忘忧”和“烂柯”等都出现在晋代。《世说新语》中说：

"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王中郎就是那位守丧还与人对弈的王坦之；支公即支遁，是东晋有名的高僧。"坐隐"的意思是说，下围棋需宁神静气，全神贯注，坐在棋盘前就好像遁世隐居一样。"手谈"是说下围棋，两人不必开口，但可以通过下棋来逞能斗智，交流思想，就像用手交谈一样。所以，宋人黄庭坚有诗云："坐隐不知岩月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忘忧"出自祖逖"闻鸡起舞"的英雄祖逖的哥哥祖纳。祖纳喜好围棋，有人劝他说，应珍惜时光，祖纳回答道："我亦忘忧耳。"这五个字言简意赅，说明了当时人爱好围棋的缘故。后来，宋徽宗写下了"忘忧清乐在枰棋"的名句。"坐隐"、"手谈"和"忘忧"将围棋所具有的性质作用作了高度的概括，说明围棋在人们游艺娱乐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 "盘龙癖"

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博弈游艺中，除围棋外，就属樗蒲了。樗蒲之名，源于自然界的两种植物，樗是一种落叶乔木，即常见的臭椿；蒲则是一种可以织席的水草。在古代，人们缺乏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正确认识，常用投掷樗的叶子和蒲来占卜，视其投掷后的正反面及纹路，预测吉凶祸福。后来人们创制了一种博戏，叫"樗蒲"，这是因为

用来掷采的东西（即骰子）称作“五木”，类似古人占卜用的樗和蒲。

樗蒲的起源，至今仍是个谜。相传，樗蒲是道家的祖师老子所创。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樗蒲，老子入西戎所造。”东汉马融《樗蒲赋》中也有这样的句子：“昔伯阳入戎，以斯消忧。”伯阳是老子的字，这里代指老子。戎是一个不确指的泛称，指西方的民族或国家。意思是说，当年，老子到西方的部落中去，为了消除忧愁，发明了樗蒲。老子骑青牛入西戎的故事，一般认为是后世道家敷演《后汉书·襄楷传》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一语臆造，因而断言老子创制樗蒲，论据不足。不过，推断樗蒲传自西方是有道理的。因为马融《樗蒲赋》中云：“枰则素旃（zhān）紫罽（jì），出乎西邻。”“旃”与“毡”字相同；“罽”也是一种用毛做成的毡子；“枰”就是掷骰子的地方。古时在玩六博、樗蒲时，都要在掷骰子的地方铺一张布，名叫“博席”。《樗蒲赋》中的这句话是说：用素色或紫色毡子织成的博席，出自西方的邻国。

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汉代以前未见到有关樗蒲的记载。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卷四载：西汉长安有位姓古的读书人擅长音乐、投壶、弄丸和“樗蒲之术”。东汉著名学者马融写有一篇《樗蒲赋》，描绘了樗蒲游戏的用具、玩法及其当时贵戚公侯玩樗蒲的情形，说明樗蒲在至今约2000多年的汉代已经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樗蒲极为盛行，不管是帝王、贵戚，

还是官吏、百姓无不喜好樗蒲。西晋初年，皇宫中有位胡贵嫔，玩樗蒲的水平十分高超。晋武帝司马炎常与她下棋。一次因争着行棋，竟撞伤了晋武帝的手指。当时有名的朝臣陶侃颇重德行，为政慎密，勤于职守，常勉励部下要珍惜光阴，不可贪图醉饮樗蒲。他命人把部下的酒器、樗蒲用具都投到了江里，对部下说樗蒲是“牧猪奴”玩的东西。

东晋末年，有位显赫一时的人物，名叫刘毅。他曾出任豫州、荆州刺史，拜卫将军，盘踞长江中游，与东晋王朝对抗。刘毅嗜好樗蒲，因他小字盘龙，后来人们称玩樗蒲成癖的人叫“盘龙癖”。《晋书·刘毅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东晋义熙元年（405），刘毅和后来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等人聚会在江宁（今南京）玩樗蒲，最后只剩下刘裕与刘毅两人，不分上下。又一轮争斗开始，刘毅把五个骰子掷到盆中，骰子的颜色都是白色，这是仅次于颜色皆黑的高彩，十分难得。刘毅大喜，提着长衣，对同坐的官员说：“太好了，虽然不是五子皆黑的高彩，但已经很难遇到了。”刘裕见此闷闷不乐，轮到他掷骰子时，他手握着五枚骰子，口中念念有词，呼喝着五子皆黑的高彩。他掷出骰子，五子中有四个是黑的，而另一个则旋转不停，刘裕与众人紧张地盯着这个骰子，骰子转来转去，最后停下来竟然也是黑色的。五个骰子的颜色都是黑色，称作“卢”，是最高的彩，所以，刘裕战胜了刘毅。刘毅十分沮丧，对刘裕说：“看来您的座位是不肯让给别人的。”

南北朝时，樗蒲继续流行。南齐时，明帝萧鸾召集众臣

庆祝破贼胜利，让群臣玩樗蒲，大臣李安民五掷皆卢，使明帝大惊。北魏大臣张烈的弟弟张皓甚好樗蒲，可是玩时不择时间和对象，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隋唐以后，樗蒲已渐入衰落，只有极少数人还会玩樗蒲。据说奸相杨国忠就是因善于樗蒲才得到皇帝的赏识。到了宋代，樗蒲之戏已废不行。李清照《打马赋》说："打马爰兴，樗蒲遂废。"

樗蒲的玩法，后人多语焉不详或误讹相袭。从现有材料来看，东汉马融的《樗蒲赋》是探讨樗蒲玩法最直接、可靠的材料。赋中说：

枰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缘以绘绣，紩以绮文。杯则榣木之干，出自昆山。矢则蓝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润，不细不洪。马则玄犀象牙，是磋是砻。……

《樗蒲赋》告诉我们樗蒲的用具有枰、杯、矢、马四种。枰是白、紫等颜色毛织品，边缘饰以彩绘。杯则取材于很远的昆山榣木。矢用蓝田玉石加工而成。马则用犀牛之角或大象之牙磨制而成。多么讲究的一套棋具啊！唐代李翱的《五木经》载，樗蒲需"矢百十二"和"五木"。矢的功能就像棋盘上的格子一样，用来数行棋的步数。"五木"是类似骰子的东西。杯用来投骰子，马就是棋子。玩时，人们手执"五木"，掷在杯中，按所掷采数，执棋子在铺有博席的枰上行棋，相互追逐，也可吃掉对方之棋，谁先走到尽头便是胜利者。

五木的形制，据《五木经》和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五木初为木制，后世改用玉石、象牙、兽骨制成。五木的

形状，两头尖锐，中间平广，一面涂黑，黑之上画牛犊；一面涂白，白之上画雉；五子皆黑，名叫“卢”，是最高的采。所以掷骰子时往往叱喝喊叫希望得到卢，即所谓“呼卢”。李白《少年行》诗曰：“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包括娱乐游戏在内。樗蒲是从西方民族传来的，所以《北史·突厥传》说：突厥“男子好樗蒲”。大约在隋唐时，樗蒲又从中国传往印度、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北史·倭传》及《隋书·东夷传》载日本“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7 世纪末，日本持统天皇曾颁禁令，禁止百姓以樗蒲聚徒赌博。樗蒲之戏传入朝鲜，似应早于日本。《北史·百济传》云：“百济之国……有投壶、樗蒲、弄球、握槊等杂戏，尤尚弈棋。”朝鲜金时习《金鳌新话》中记有一段《万福寺樗蒲记》的故事：书生梁生，早丧父母，未有妻室，独居万福寺。他为追求仙女，袖装樗蒲，掷于佛前曰：“吾今日与佛欲斗蒲戏，若我负则设法筵以赛，若佛负则得美女，以遂我愿耳，祝讫遂掷之，生果胜。”这个故事说明樗蒲在朝鲜民间十分流行。朝鲜民间流行一种掷柶游戏，用赤荆条剖作四支，名叫柶，长三寸多，掷而决胜负。四俯曰牟，四仰曰流，三俯一仰曰徒，二俯二仰曰开，一俯三仰曰杰。棋盘画 29 圈，两个人玩，各用四枚马形棋子，以掷的采数决定行棋多少，最快到达终点者胜。这与樗蒲的玩法十分相似，柶如同樗蒲所用的“五木”。朝鲜学者李睟光在《艺峰类说》

中认为："栖戏者便是樗蒲之戏。"[1] 樗蒲可能也被传入印度。后秦释道郎《大般涅槃经现名》第 6 载："樗蒲、围棋、波罗塞戏、狮子象斗、弹棋、六博。"随着中印佛教的往来，两国传统的娱乐游艺活动也相互交流，丰富了双方国家人民的娱乐生活。这说明，樗蒲传到国外，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三 弹棋名家谱

弹棋几经起伏，到魏晋南北朝时，又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因弹棋号雅戏，有"消愁、释愦（消除昏睡）"的作用，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产生了魏文帝、杜道鞠等弹棋名家，而且弹棋成为文人骚客的吟咏对象，流传下多篇《弹棋赋》和《弹棋歌》。

魏文帝曹丕在文章中说：我自幼喜好游戏，特别擅长于弹棋，听说京城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是弹棋名家，恨不得与他们较量一番。可见，魏文帝的弹棋技艺是很高超的。《世说新语》说他能"用手巾拂之，无不中者。"其实，曹丕以手巾角拂棋还不算绝技，有人能不用手，以头巾拂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2] 手巾、头巾拂棋，都

① 洪锡谟：《东国岁时记》。

② 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巧艺》。

是一种绝技表演，弹棋的基本方法是用手指弹棋。

南北朝时，刘宋人杜道鞠是弹棋名手，世人以其弹棋与范悦的诗、褚欣远的楷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的医术称为“天下五绝”。《宋书》上记载，宋孝武帝与平刺王休祐为争夺一个善下弹棋的名手范景达，相互争斗，闹得天下皆知。这些弹棋名家的产生说明弹棋技艺的提高，同时推动了弹棋的向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辞赋、散文在继承两汉遗风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文赋多以短篇居多，以抒情适性见长。弹棋是一种奇巧的娱乐，为士大夫阶级所喜欢，写下了许多篇脍炙人口的弹棋文赋。如魏文帝曹丕的《弹棋赋》、魏丁廙的《弹棋赋》、西晋夏侯惇的《弹棋赋》、徐广《弹棋经》、梁简文帝萧纲的《弹棋论》等。这些文赋论弹棋的作用、棋具的构造、游戏的方法，是今天了解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弹棋状况的宝贵史料。

当时，人们认为弹棋是一种高雅的棋戏，是“君子之所欢”的游戏。魏文帝《弹棋赋》中说：弹棋是一种美妙的游戏，其他游戏无法与它匹敌。晋人夏侯惇《弹棋赋》也赞扬弹棋，认为是消愁解忧的最好娱乐活动。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则认为弹棋可以修养品道。正因为弹棋具有这些积极的作用，才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他们休闲时的娱乐。

这时期，弹棋盘一般是用石头制成，形制也是外方内圆，中间隆起。丁廙《弹棋赋》说：“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致理肌平。”采用有美丽花纹的石头制成棋

盘，绘以彩色图案，中间隆起四外平坦，棋盘表面坚硬光滑。还有更名贵的弹棋盘，魏文帝说：弹棋盘用荆山美玉制成。夏侯惇说：弹棋“局则昆山之宝，华阳之石，”上面绘有复杂美丽的图案，需要像鲁班那样的工匠才能雕刻成。宋朝人吕颐浩曾在河北大名隆兴寺佛殿簷下，见到刻有魏文帝黄初年号的玉石弹棋局，与魏晋人吟咏的弹棋盘一样。

弹棋的棋子有用木做的。魏文帝《弹棋赋》：“棋则元木北幹，素树西枝。”考究的棋子则是用象牙做成。丁廙《弹棋赋》说：“棋则象齿，选乎南藩。”魏晋时，弹棋棋子由汉代时的双方各 6 枚，增至 8 枚，到唐代又所以丁廙说：“列数二八”。到唐代弹棋子又增至 12 枚。

这些文赋对弹棋的玩法描绘得最详细、精彩。丁廙《弹棋赋》中把玩弹棋当作两军对垒，将棋子排开，如同誓师，号令即下，方可出击。弹击棋子要“运若廻飙，疾似脱兔，”迅速打掉对方防守要冲的棋子。可以“中路为擒”，采取中路突破；也可以远程冷射，“挥纤指以长斜”。长斜就是远程冷射。唐代诗人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诗云：“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弹棋盘中间隆起，要从一方斜角弹击对方棋子，确需很高超的技巧。可见，弹棋具有多样战术和技巧，是一项极富变化的游戏。

弹棋虽然活动量不大，但也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常使“胜者含和，负者丧颜。”激烈的游戏使观者为之心惊。魏文帝《弹棋赋》说：“于时观者莫不虚心竦踊，咸侧息而延伫，或雷抃以大噱，或战悸而不能语。”可见，弹棋的魅力

是很大的。

在唐代，弹棋仍然相当流行。唐代的许多文人，如杜甫、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等都写过有关弹棋的诗文，也产生出吉逵、高越等弹棋名手。经过五代的动乱之后，弹棋在北宋时已衰落消亡了。

弹棋衰落失传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弹棋盘、棋子的制作要求较高，玩法亦较复杂，只在上层社会流行，难于普及，所以极易衰落。二是弹棋源于宫廷，盛行于魏晋门阀等级观念浓厚的时代，因而弹棋棋子被分为两类，“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下者二乃敌一。”[①] 这一陈腐观念遭到唐宋士人的反对。宋人刘攽在《弹棋局歌》中说：“谁令朱墨异贵贱，百世纷纷无已时。”认为划分贵贱等级，是导致动乱的根源。由于魏晋时代门阀等级思想不符合唐宋士族地主的思想，所以，在新的棋戏不断创新之下，弹棋便被淘汰了。

四　六面骰子的传入

现今流行的骰子是六面体，而中国传统的骰子都是14或18面体的，这可以从历代墓葬出土的骰子得到证明。14或18面体的骰子究竟在什么时代，完成向六面体骰子的嬗

① 柳宗元：《弹棋序》。

变呢？又是何种原因引起这种转变的呢？

到目前为止，所知道最早的六面体骰子实物，是东晋时代（317～420）的。著名艺术家和学者常任侠先生专门研究过中外骰子的交流史，据他讲：

东晋时遗存的古磁中，曾见一颗方寸大的骰子，与古代埃及、罗马和印度的古迹中所发掘的骰子，以及现代中国和印度的骰子完全相同。这骰子出自浙江余姚的晋墓中（余姚晋墓所出的古磁骰子，原为艺专教授李超士所藏，1943 年在重庆售与卫聚贤，解放后不知所在），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发现与古埃及同型的骰子最早的一个。[①]

魏晋以后，各朝出土文物中所见的骰子，以及人们游戏中使用的骰子，都是六面体的，再无 14 或 18 面体的骰子了。骰子游戏的繁盛在唐代。西安东郊唐墓曾出土骨骰三枚，均为 2 厘米见方的六面体，除四点一面涂红外，余皆涂黑。关于四点涂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朝人潘远在《西墅记谈》中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玩骰子戏，玄宗眼看就要大败，只有掷出两个四点，即重四，才能转败为胜。玄宗手捏着骰子，连连呼叱着四点，掷出两个骰子，骰子在盘中旋转不停，良久才停下，果然成了重四。玄宗大喜，特命赐为红色。后来人们因骰子有红黑两色，又称其为色子。

---

① 常任侠：《从游戏玩具上看中印古代文化的关系》，载《东方艺术丛谈》第 129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魏晋时代，六面体的骰子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些学者认为：它源于中国固有的“五木”和“琼”。可是，“五木”是五枚刻有采的竹木条，而“琼”便是14或18面体的骰子，两者距后世六面体骰子，形制相差很远，认为六面体骰子源于“五木”和“琼”，缺乏说服力。

从中外骰子的发展历史上考察，中国与印度、古罗马、古希腊等国家的骰子分属两个不同系统，中国早期骰子的形制是14或18面体的，而印度等国一开始出现的骰子便是与当今一样的六面体骰子。中国魏晋以后，六面体骰子取代14或18面体骰子，显然受到印度等国的影响。

根据常任侠先生的研究，掷骰子的游戏，起源于亚洲。在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曾发现一个陶土制的骰子，是公元前2750年（相当于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的遗物。在印度王舍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之南）也发现一个红陶烧的骰子。王舍城在公元前六七百年，便是摩揭陀王国的都城。这枚骰子大约是2600多年前的东西。此外，在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的遗址中也曾发现多枚骰子。这些骰子与现代流行的六面体骰子完全相同。

从文献记载上看，印度很古的颂神诗集《黎俱吠陀》中就讲到骰子。这是一本公元前2000年的书。古罗马人非常嗜好骰子游戏，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克雷狄斯写过一本关于掷骰子游戏的书。在古希腊，骰子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娱乐玩具。古希腊称骰子为Tesserae，

拉丁文作 Tessera，其原意为“四”，表示这是四方体的东西。[①] 英文称 dice，也是四方形的意思。

从常任侠先生的论述来看，印度等国的六面体骰子远远早于中国，因而，中国六面体骰子的产生，显然受到外国的影响。那么，外国骰子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虽然尚无直接的史料证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国历代采用骰子的棋戏上来考查。

秦汉时期流行的六博，采用的是“箸”，或者是 14 面体及 18 面体的“琼”；魏晋时盛行的樗蒲则使用“五木”，以起骰子的功能。就在魏晋之后，六博已失传，樗蒲也逐渐衰落，而一种新型的棋戏——双陆，自印度传入中国，双陆所用的投掷用具，便是中国未曾有过的六面体骰子。所以，14 面或 18 面体骰子的消失是与六博的消亡同步的，而六面体骰子是随着双陆传入中国而出现的。

双陆是在魏晋时传入中国的。宋朝人洪遵《谱双》中记载：“双陆出天竺，名为波罗塞戏，则外国有此戏久矣，其流入中州，则曹植始之也。”书中讲到外国的骰子，“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真腊（今柬埔寨）、大食（阿拉伯帝国），以木为骰子，六面。”[②] 由此可见，六面体骰子是从外国传入的，时间在魏晋时期，因而余姚晋墓中才会发现六面体的骰子。

---

① 常任侠：《从游戏玩具上看中印古代文化的关系》。

② 宋洪遵：《谱双》序、卷五《骰子》，《重订欣赏编》本。

同时，曹植创制骰子的旧说，也可作较为合理的解释。五代后蜀马鑑《续事始》记载："魏陈思王曹子建制双陆局，置骰子二。"这说明曹植确对双陆和骰子的传入或改造做过贡献，讲他创制骰子，不如说他改进了双陆棋的骰子，更为确切。

骰子，这个小小的玩具虽然平凡，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以及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响。古代的人们，在游戏上有所创造，常常相互交流、学习，以丰富各自的娱乐生活。骰子不过是这种文化交流浪潮中一滴浪花。

五　周武帝制象戏

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盛行，樗蒲、弹棋等博戏发展迅速，但久而久之，人们对博戏的着法简单、趣味性不强感到不满；而围棋虽是高雅的游艺，但又太费时间，所以，弈棋也遭到不少的诽议。正如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说：博戏"数术浅短，不足可翫。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棋类游艺——象戏便应运而生。

象戏之称，始见于北周。《周书·武帝本纪》说："天和四年（570）五月乙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寮讲解。"历来许多学者都据此认为象戏为周武帝所创，而且为中国

象棋的雏形。如《太平御览》说："周武帝造象戏"。明罗颀《物原》说："周武帝作象棋"。

关于周武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的真实情形，由于史书语焉不详，无法了解具体的情形。《象经》一书，在唐代还存在。《隋书·经籍志》收有周武帝《象经》一卷。隋文帝和唐太宗也读过《象经》。《北史·郎茂传》说：建德（572～577）年间，隋文帝杨坚任亳州总管掌书记，他读了周武帝的《象经》，表示不满。他对郎茂说："君主的所作所为，应该是那些'感天地动鬼神'的大事，而不是玩什么象戏。《象经》中多有乱法度的内容，显露着亡国的征兆。"杨坚的尖锐批评是有见地的。据《旧唐书·吕才传》记载：

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元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而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元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

唐太宗看不懂周武帝的《象经》。太子洗马蔡元恭少年时玩过象戏，却忘记了玩法。博学多才的吕才用图解释了象戏的玩法。这说明唐朝初年，象戏已经极少有人会玩，甚至像唐太宗这样学识渊博的人竟看不懂《象经》。同时也说明，象棋决非是现在这种平民百姓都会玩的象棋。

那么，象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棋类游戏呢？由于唐以后《象经》在我国失传了，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只能从现存的王褒《象经序》和庾信《象戏赋》、《进

象戏赋表》三篇文赋来了解象戏的内容。

这三篇文赋属于骈文、辞赋作品，文字、音律之类颇见功夫，但虚言浮词太多，很少说及象戏的具体内容，使人读后往往不知所云。但综合诸家观点，潜心分析，还是能够从中看出一些基本内容。

庾信《象戏赋》说：象戏“丹局直正”，说明棋局是正方形的。王褒《象经序》说：象戏是“八卦以定其”，这可能表明棋局是由 8×8 的小方格组成。庾信《象戏赋》说：“局取诸乾，坤以为舆”。乾、坤是我国古代的八卦之一，分指阳、阴，由此推断象戏棋局上含有阴阳之义，也许是一种类似现今国际象棋黑白相间棋盘的棋局。赋中又说：“符明六甲之符”，这是讲象棋的棋子，似应每方 6 枚棋子，共 12 枚，而且棋子有贵贱之分。如果以博塞中一枭五散的情况来推论，象戏可能也是贵一贱五。棋子的行棋规则，可以进，可以退，没有被吃的规则。

通过以上三篇文赋中关键词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周象戏源于以往的博戏，完全不同于今天以车、马、炮、九宫、楚河汉界等为内容的中国象棋，所以，不能认为象戏是中国象棋的雏形。这一观点，前人也曾有所论述。明代杨慎《丹铅杂录》认为：象戏“决非今之象戏车马之类也。”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明确指出：“《太平御览》又谓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复与今之象戏不同。”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现行象棋在宋代定型后，“象戏”之称仍然流行，成为“象棋”的别称。

六　投壶的新气象

投壶是渊源于古代射礼、寓礼教于娱乐之中的一项活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宴饮成风，使投壶继续得到发展，对酒设乐，高歌投壶，成为一时风气。早期的投壶，礼仪繁琐，而投法简单。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随着清谈玄学的盛行以及对传统礼教的冲击，人们逐渐摈弃了投壶的礼教目的，而孜孜于追求投壶本身具有的情趣。这导致了投壶的改革和创新，使两晋南北朝的投壶呈现一派新气象。

两晋南北朝的投壶，以纯娱乐为目的。所以魏邯郸淳在《投壶赋》中说：投壶“悦举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当时，统治者和文人饮宴欢聚，无不以投壶为乐。《南史·柳恽传》记载：南齐竟陵王肖子良与柳恽夜宴，柳恽善投壶，两人玩到天明。因而肖子良和柳恽朝见齐武帝都晚到了。齐武帝询明情况后，不仅未加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可见当时对此戏的爱好。在北朝，投壶同样流行。《颜氏家训》中讲：颜之推从南梁逃到北齐，见北齐广宁王高孝珩，兰陵王高长恭等人的家里都有投壶用具，但技艺稍逊于南朝。

两汉三国时期的投壶，在壶口两旁，还没有两个小耳，从晋代开始才出现有耳投壶。随着壶耳的出现，投壶的难

度增大了，花样增多了，技巧也随之提高。晋朝左光禄大夫虞潭在《投壶变》中记载了许多新鲜的投法。例如：投入左或右耳的箭，箭身斜倚在耳口形同腰间佩剑那样的，称为“带剑”。箭身斜倚在壶口的称为“倚竿”。投的箭“圆转于壶口”，停时成为“倚竿”的，称为“狼壶”。箭尾投入壶口的称“倒中”等等。当时一些人的投壶技巧十分纯熟。晋朝丹阳县尹王胡之“善于投壶”，竟能闭目投矢入壶，石崇的家伎也能“隔屏风投之”。

南北朝时，“骁”的投法盛行。柳恽就因“骁不绝”，而延误朝见皇帝的时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说：汝南的周璝和会稽的贺征，能一箭四十余骁，称为“莲花骁”。而北齐“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表明北朝“骁”投不如南朝。

当时不仅男子投壶，女子也好此戏。石崇家“有伎，善投壶，隔屏风投之。”梁无名氏作《华山畿》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娇时。”描写了女子相思丈夫，以投壶消愁解闷的情景。

投壶可以使人从娱乐中解除疲倦，而且可以起到健身的功效。三国王粲《棋赋》说：“夫注心锐志，自求诸身，投壶是也。”他认为投壶可以磨炼意志，培养注意力的集中。晋朝傅玄在《投壶赋序》中说：“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说投壶可以矫正怠惰的习惯。这都说明，古代讲究礼仪的投壶之戏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成为愉悦身心、矫正怠惰的游艺活动。

七 “海陵斗鹅”的传说

宋朝徐铉在《稽神录》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古时候，海陵郡（今江苏泰州）西村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人看见两只大鹅在空中相互争斗，直斗得天昏地暗，最后两只鹅筋疲力竭，一齐坠落下来，被村民抓住，只见大鹅有五六尺长，双足形似驴蹄。村民把鹅杀了，分而食之，结果，吃鹅肉的人都中毒死了。第二年，海陵郡就被后周军队攻占了。徐铉记录这件奇异之事，是把它看作海陵被攻占的征兆。这虽然是个民间传说，但却告诉我们，古代有一种善于相互争斗的鹅。此外，古书上讲，那时还有一种善斗的鸭。

鹅和鸭一向被人们视作两种温驯的动物，它们真的能像鸡、牛那样善于争斗，供人赏玩吗？这要从我国悠久的养鹅、鸭历史讲起。我国是将野鸭、野鹅驯化饲养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西汉时编成的《尔雅》中就有关于家鸭、家鹅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书《吴地志》中有：“吴王筑城以养鸭，周围数十里”的记载，说明长江流域很早就有了大规模的养鸭业。长期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根据不同用途对鸭、鹅进行培育和选择，形成许多优良品种，到汉代时，长江下游一带饲养的鸭、鹅，除供食用的肉鸭、肉鹅外，还培育出一种专门

用来争斗的"斗鸭"和"斗鹅"。

这种"斗鸭"、"斗鹅"体质强健，生性好斗。晋朝人崔豹在《古今注》中记载了一种善斗的鹅，说它形似天鹅，脖颈长八尺，善于争斗，尤好吃蛇。可见，斗鸭、斗鹅不同一般的鸭、鹅。

斗鸭、斗鹅，既指善于争斗的鸭、鹅品种，也指古代以鸭、鹅争斗取乐的娱乐活动。这种娱乐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西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不学无术，贪于玩乐，不是营建宫室苑囿，就是驰马走犬，整日寻欢作乐。他还"好斗鸡、鸭及鹅雁"，每年花费2 000石谷子。[①] 这说明，斗鸭、斗鹅的活动最迟在西汉时已经产生，同时，鲁恭王的行径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耽于享乐和生活上的奢侈淫靡。

斗鸭、斗鹅的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盛产鸭、鹅的江南地区，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三国时，斗鸭、斗鹅受到统治者的喜爱。魏文帝曹丕因当时中原地区没有优良的斗鸭，便派使节到江南，向东吴孙权索要斗鸭。孙权惧怕力量强大的魏国，只好于黄初三年（222）向曹丕进献斗鸭、孔雀、长鸣鸡以及各种珠宝。当时江南地区的斗鸭之风远较北方为盛。

吴王孙权的儿子建昌侯孙虑十分喜好斗鸭游戏，在房前修建了一个精巧的斗鸭栏，也就是斗鸭场。他有时玩鸭

---

①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二。

而忘记了读书。大将军陆逊知道了，正颜厉色地对他说："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① 你应该勤奋读书，增长才能，不可玩物丧志。孙虑感到很惭愧，马上就把斗鸭栏拆掉了。在今天湖北临湘县有一处名叫"鸭栏矶"的地方，相传就是因孙虑在此斗鸭而得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绘画也有一些有关"斗鸭"的史料。西晋文学家蔡洪曾作《斗凫赋》，认为鸭类中，"惟斗鸭之最精"。此赋对斗鸭争斗的场面作了精彩的描绘："……尔乃振劲羽，竦六翮，抗严趾，望雄敌，忽雷起而电发，赴洪波以奋击。"② 斗鸭拍动着羽毛，耸起羽翅，抬起厉害的趾蹼，望着敌方，忽然双方如惊雷乍响，闪电横空，冲向场中相互厮杀。此外，从唐代裴孝源撰写的《贞观公私画史》得知，唐朝初年，宫廷还收藏两幅斗鸭图。一幅是东晋画家顾宝先画的《高丽斗鸭图》，说明高丽（今朝鲜）也有斗鸭游戏。另一幅是南朝画家陆探微画的《斗鸭图》。可惜，这两幅画都未能流传到今天。

这一时期，斗鹅活动同样流行。南朝人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将领桓玄小时候，与兄弟们各养了许多鹅，相互进行斗鹅比赛，可是，桓玄的鹅不如兄弟们养的鹅善斗，常常被打败。他心里很是生气。于是在一天夜里，偷偷来到兄弟们的鹅栏，把鹅都杀了。第二天，家

---

①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

②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1。"凫"（fú）野鸭。

里人发现了死鹅，都以为是什么妖魔在作怪，赶忙告诉了桓玄的叔叔大将军桓冲。桓冲想了想，便笑道："这是桓玄搞的把戏。"大伙一问，果然如此。[①]

斗鸭、斗鹅的游艺活动经两晋南北朝的盛行，到唐代仍然流行于上层社会中，此后便逐渐失传了。

八　庐山赤鳞鱼

金鱼是我国特产的名贵观赏鱼，它优美丰盈，色彩艳丽的体态，给人以美的享受，自古以来，金鱼的饲养和观赏就是人们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

在中国古代，人们崇尚红、黄两色，认为红色和黄色象征着吉祥和尊严，因此，在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红色的金鱼被视为神物，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金鱼的美妙传说。南朝人任昉（460～508）的《述异记》中讲了一个金鱼神的故事：相传周平王二年（前769），陕西等地三个多月滴雨未下，池塘干涸，庄稼眼看就要颗粒无收。百姓纷纷设祭祈求神灵，忽然，干裂的土地上涌出滚滚清泉，一条色彩斑斓的金鱼随着清泉跃出，接着天上降下了阵阵秋雨。此后，百姓们建庙宇，祭祀神奇的金鱼神。[②]

---

①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② 任昉：《述异记》卷下："关中有金鱼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鱼跃出而雨降。"

这里的“金鱼神”是应求感报、济人于危难的神鱼，它是南北朝时期存在金鱼的一种曲折反映，表现了人们对这种稀有鱼类所寄托的美好愿望。

在道教、佛教的经典中，金鱼也常常被描绘成赋予神奇色彩的动物。道教神话中，有位神仙名叫琴高，相传他是春秋时赵国人，善于弹琴，曾在宋康王手下做官。他有很高超的法术，曾下涿水取龙子。回来时，乘着两条金色的鲤鱼。[①] 在佛经中也有“赤鲤化龙”、“龙女金鲫”转世做人的故事。

虽然，这些金鱼的传说大都是出于宗教宣传的目的而编造的，但是，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金鱼的起源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

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中国后，佛经中戒杀生、放生、普度众生等主张很快在民众中传播，佛教寺院中纷纷修建放生池，僧人和信徒把野生、稀罕的龟、鱼供养池中，并给它们披上各种神秘的外衣。和尚们宣扬池中的龟、鱼都是灵物，听经得道，便会变成神龙。天旱时，寺院做法事，还要观察池中龟鱼的游态，来解释法事后的结果。由于放生池中的鱼类，受到寺院的竭力守护，很少受到侵害，所以，野生鲫鱼经过长期培养与自然选择、驯化，最终变异成身体呈红黄色的金鲫，当时人称作“金鲫”、“赤鳞鱼”等。

---

① 《列仙传》卷上。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金鱼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的晋代，起源于庐山西林寺。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北靠长江，南临鄱阳湖，山峰峻秀，沟谷纵横，森林密布，雨水充沛，终年云雾缭绕，千姿百态。秀丽的风貌吸引着僧人们来此建立寺院，在晋代时，庐山已有佛寺300多座。寺院本着戒杀生、劝放生的教义，对庐山的花鸟鱼虫都给予得力保护，使金鱼在这里有了良好的繁衍、变异条件。

《述异记》记载：东晋大将桓冲（328～384）一次游庐山，见湖池中有一种奇异的赤鳞鱼。① 此后，南朝梁慧皎（497～554）在《高僧传·释昙霁传》中也记载了这种赤鳞鱼，而且点明了地点："庐山……西林院秀池中赤鲋，龙也。"文中的西林院即西林寺，赤鲋即赤色的鲫鱼，古人称鲫曰鲋（fù）。

西林寺位于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是东晋太和二年（367）兴建的著名古刹。西林寺外有一大池塘，名叫"秀斗"，是晋朝高僧师秀用三年工夫凿成的。池中饲养的便是当时罕见的赤鳞鱼。梁武帝大通三年（529）编写的《丛林纪拾》记载："朱鲋，庐山西林秀斗池中，世间罕有。"这说明，在距今一千六七百年前，庐山西林寺确有一种罕见的金鲫鱼。

金鲫鱼是金鱼的祖先，这是现代科学早已论证过的，

---

① 任昉：《述异记》："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

但是在古代，人们是如何认识金鱼的起源呢？一般人总是认为金鱼是神物，任昉等人的记载，仍然把金鱼视为“龙”的化身。到了明代，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首先揭开了披在金鱼身上的神秘面纱。

李时珍曾亲往西林寺，对秀斗池中的赤鳞鱼做了研究。他通过在庐山实地考察并对照历史文献，推断他所见的金鱼的祖先，就是晋桓冲在庐山发现的赤鳞鱼。他在所著《本草纲目》报道了他的研究结果说：“金鱼有鲤、鲫、鳅、鰲（cān）数种，鳅、鰲尤难得，独金鲫耐久，前古罕知。”“《述异记》载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①

李时珍的论断，与现代生物学者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即金鱼的祖先是鲫鱼。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金鱼最早的饲养，起源于庐山西林寺的放生池和其他一些放生池中，距今已有一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

九 《璇玑图》、高末和踢毽子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游艺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大的游艺项目十分盛行外，一些小项目也显示出勃勃生气，对后世

---

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四《鳞部·金鱼》。

游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像回文诗、跳绳和踢毽子三项游艺的产生都要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

回文诗属于一种文字游戏。回文诗既可顺读，又可倒读，左右逢源，颇有巧思，独具一格，别有情趣。

回文诗，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相传汉代苏伯玉的妻子怀念远方的丈夫，在盘中婉转回环地写了著名的《盘中诗》，这是回文诗的肇端。如今人们能够见到最早的回文诗，是十六国时前秦妇女苏蕙所作的《璇玑图》诗。苏惠，字若兰，陕西武功人，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若兰知识广博，仪容秀丽，谦默自守，不求显耀，深得丈夫窦滔敬重。后来，窦滔到襄阳做官，若兰未随他前去。两人相隔千山万水，音信不通。苏蕙十分惦念丈夫，于是费尽心机，在一块五色织锦上，用回文体写了《璇玑图》诗。苏蕙派人把织好的《璇玑图》诗送到襄阳，窦滔读后十分惭愧，深感对不起爱妻苏蕙，便当即派人用隆重的礼仪，把苏蕙接到襄阳，从此，夫妻更加恩爱。

《璇玑图》诗排列纵横都可成为29字的方图，共有841字。无论反读，横读，斜读，交互读，退一字读，叠一字读，均可成诗。《晋书·列女传》上称它“宛转循环，读之词意凄绝”。语言学家陈望道在《修辞发凡》一书中说，它“回环反复读起来，可得诗3 752首。”可谓是回文诗中的巨著。今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翻阅一下古典小说《镜花缘》第四十一回，就可欣赏此诗的全貌。

两晋南北朝时，文人墨客常有回文的遣兴之作。如晋

代傅咸写过《回文反复诗》、南齐王融写有《春游回文诗》，梁简文帝萧纲曾撰《回文纱扇铭》，刘宋贺道庆也有《回文诗》之作。

跳绳，是一种深受儿童喜爱的游戏。它一般分为单人跳和多人跳两种。追溯其历史，单人跳绳早在南北朝已出现，多人跳要到明代才见于文献中。《北齐书》卷八《幼主记》记载：

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

所谓"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即今日的单人跳绳。北齐幼主名高恒，公元577年即位，他骄奢淫逸，搞得政治黑暗，百姓怨声载道。最后被北周所灭。后人附会北齐灭亡的史事，认为儿童在跳绳时，边跳边唱"高末"，预兆北齐的高姓皇帝末日到了。童谣预兆祸事，是古人的风俗。此类童谣史不绝书。也因为此原因，最早跳绳的史事才得以记载下来。

踢毽子和跳绳，常常密不可分，是两种普及广泛的民间游艺活动。踢毽子大约起源于汉代，但缺乏十分确切的史料证明。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有关踢毽子的记载，见于唐人释道宣著《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书中记载：南北朝时，"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栏上，反踢蹀镝，一连五百，众人喧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怪曰：'此小儿世戏有工。'"蹀镝就是毽子，反踢就是用脚外侧踢，也叫"拐"，慧光反踢能踢500个，足见其技艺

的精熟。也说明，踢毽子的源头应比两晋南北朝要早。佛陀称踢毽子为“世戏”，可见在南北朝时，踢毽子是社会上普遍开展的游艺活动。

第五章

隋唐五代游艺

隋唐（581～907）是中国古代游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为游艺的繁荣奠定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隋书》上说：当时“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①]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两代人民，以生为乐，以生为贵，具有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因此，隋唐两代人们的游乐之风十分盛行。隋朝初年“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②] 这种娱乐性的“狂欢”是前所未有的。宫廷游艺呈现兴旺景象，帝王贵戚或“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③] 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帝王都积极提倡并参与各种游艺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围棋、马球、蹴鞠、拔河等都有很大的发展。民间的游艺活动也非常活跃。史籍上说：当时，“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连春入夏，自旦达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④] 这使得隋唐时期民间的节令娱乐、棋戏以及童戏等有很大的发展。

---

① 《隋书·高祖纪下》。
② 《隋书·柳彧传》。
③ 《东观奏记》。
④ 《旧小说》乙集三。

隋唐两代都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这给游艺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马球、步打球、蹴鞠、竞渡、拔河、斗鸡，无不充满对抗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讲究陶冶性情、培养德行礼仪的游艺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隋唐游艺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游艺活动丰富多彩，项目多，规模大，可谓空前。大凡前代相传下来的各种游艺，无论是节日游艺、益智游艺、宴饮游艺，还是棋戏、博戏和童戏，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游艺项目初步定型，技艺更加高超，产生出一大批精通某种游艺的高手；游艺活动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的游戏活动亦较前代有显著发展，如围棋、秋千、步打球、击鞠等，无不有妇女参加；隋唐时代，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国与邻近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发展。围棋、投壶、秋千、马球、蹴鞠等游艺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为丰富世界游艺宝库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代时期，出现了分裂、战乱局面，但为时较短，对游艺的发展影响不大。

总之，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游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游艺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通化诸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为后代游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酒食罢无事，棋槊以自娱”

隋唐两代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围棋最终成为真正的游艺项目。这从围棋著作的归类上可以看出这一变化。《隋书·经籍志》收录南北朝围棋谱有八部52卷之多，全部归入“子部·兵书”类，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著作同列一类，反映了围棋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到五代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围棋著作已归入“子部·杂艺术”类。这说明围棋的军事性因素减少，而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娱乐性成为围棋主要价值。正是在隋唐时期，琴、棋、书、画开始相提并论，被人们视为高尚典雅、多才多艺的一种表现。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的风气。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论书》中说：现在许多人，你如果说他的书法水平不高，他必然坦然一笑，不屑一顾；你如果说他握槊、弈棋水平不高，他必然羞愧得脸红起来，拂袖而退。[①] 社会上崇尚弈棋的风气，使唐代围棋十分普及，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闲暇时间里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所以，唐代大学者韩愈说：当时“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他作诗云：“酒食

---

① 《全唐文》卷607，第6 134 页。

罢无事，棋槊以自娱。”

隋朝承袭南北朝的围棋之风，围棋仍然在民间流行。《隋书·皇甫绩传》记载：皇甫绩三岁就死去父母，从小由外祖父韦孝宽抚养。他最好围棋，常“与诸外兄博弈”，因荒废学业，遭到外祖父的训斥。后来，皇甫绩精心好学，成为一位有名的学者。

唐高祖李渊，曾担任过隋朝太原留守，他嗜好围棋，经常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弈棋，甚至“通宵连日，情忘厌倦。”他的儿子李世民和李智云（楚哀王）也以好围棋而闻名。唐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记述一段唐太宗与虬髯客“棋决雌雄”的故事。相传有位虬髯客欲与李世民角逐中原，争夺天下。在晋阳令刘文静的引见下，两人以棋会友，决起雌雄来。据说，虬髯客拿起棋子，在棋盘的星位上连摆四子，并说：“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则沉静、果断，不慌不忙地将棋摆在“天元”上，若无其事地说：“小生一子定乾坤！”仅此一子便使虬髯客感到一种排山倒海的压力，他望得李世民“精彩惊人，神气清朗”神态，不禁惨然一笑，说到：“此局全输矣”。打消了与李世民争夺天下的主意，“罢弈而去”。

唐太宗有两首咏棋诗流传于世，其中一首云：

手谈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舍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

唐玄宗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平生喜欢斗鸡、打球等戏，特别好下围棋。《清异录》记载：一天，玄宗问宁王

李成器："你最近围棋下得怎样?"宁王回答道："托陛下的神威，较前稍有点进步。"玄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命宫人把名贵的玉棋盘捧来，与宁王对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元年间，有一次，玄宗与亲王对弈，双方厮杀十分激烈，杨贵妃在旁观战，乐工贺怀智一边弹琵琶。后来玄宗处于败势，眼看就要输棋了。杨贵妃为了解脱玄宗的尴尬处境，突然把手上的"康国猧"放到棋盘上，把棋子搅乱了。玄宗见了，开心大笑。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是画家喜爱的题材。唐代名画家张萱画有《明皇会棋图》，宋朝人和元朝画家王若水都画有《明皇太真对弈会》。

在民间，弈棋之风也很盛行，而且有水平很高的棋手。唐玄宗时的王积薪是唐代第一国手。唐冯贽《云仙杂记》说："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所谓"匹夫"就是指擅长围棋的平民百姓。

唐代女子也喜欢弈棋，而且不乏高手。唐薛用弱《集异记》记载了一段女子棋坛高手的逸事。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往四川，王积薪也跟随同行。一天，王积薪投宿客店，灭烛之后听见隔壁有婆媳两人在说话。婆婆招呼儿媳说："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儿媳同意。王积薪心里非常奇怪，暗想："室内既无灯光，况且婆媳各住东西房，怎能下围棋呢?"他细心听着两人的对话。原来婆

媳两人在黑暗中各自以口诀对弈，几十回合后，婆婆说："尔败矣。"王积薪暗自记住棋局，第二天复盘，自愧不如。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说明唐代民间已有棋艺高超的女棋手。

1972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一幅《围棋仕女图》，绢本设色，高 63 厘米，宽 54.3 厘米。画面上一位弈棋贵妇，头束高髻，簪花耀顶，额间贴花钿，面部健硕丰润，上穿绯地蓝花襦，下着绿色花罗裙。她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形象惟妙惟肖。这是唐代女子喜好弈棋的珍贵形象资料。

二　唐诗与围棋

唐朝是中国围棋十分兴盛的时代，又是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不仅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围棋高手，而且不少诗人都擅长围棋，写下了大量以围棋为题材的诗篇。

在唐代众多诗人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风流绝代，可惜对围棋却不甚了了，而诗圣杜甫则十分喜好围棋。他常与几个朋友在一起，"将棋陪谢传，把酒忆徐君。"酣战数局，顾不得光阴似箭，"玉子频敲忘画冷，灯花落尽觉宵深。"安史之乱后，他回到长安，无所事事，"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他的妻子杨氏，出身名门，也喜好围棋，所以，杜甫作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

钩。”记述了他与妻子画纸为棋盘，对弈娱乐，让小儿弯针为钩，去池边钓鱼的琐事，写出了家庭生活中的无限乐趣。杜甫的咏棋诗甚多，其中在《题终明府水楼》诗中有两句写得最为优美，“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将山、水与弈棋，融会成画。后人据此两句诗画成一幅有名的《楚江云雨图》。



唐代仕女弈棋图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唐代中期的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他们不仅以诗齐名，而且都酷好围棋。长庆元年（821），元稹请许多朋友到自己府中举行棋会，并写下了《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全诗 48 句，是我国吟咏围棋

的长诗之一。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次棋赛，将围棋的搏杀斗智的特性及弈棋乐而忘忧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诗中写围棋的布局、打劫、征子和攻杀，“堂堂排直阵，滚滚逼羸师。悬劫偏深猛，回征特险巇。旁攻百道进，死战万般为。”棋会整整进行了一夜，“通夕共忘疲”，一直下到“晓雉风传角”，月残星稀。吃了早点后，才“公私牵去住，车马各支离”，依依惜别地散去。有人问元稹：“围棋有什么乐趣?”元稹作诗回答道：“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围棋的无穷乐趣是凡夫俗子所无法知道的。

元稹还有一位棋友叫李杓直。据《棋天洞览》说：“元稹与李杓直棋，稹已败，乃窃杓直数子咽之。”但《云仙杂记》的说法恰恰相反，说李杓直窃数子咽之。不管是谁偷了对方的棋，咽到肚子里，都说明两人是地道的棋迷。

白居易的棋艺颇高，自以诗酒琴棋为四友，他认为棋是最好的消闲娱乐。诗云：“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他的棋瘾很大，经常“围棋赌酒到天明”，而且不缠战到底，决不罢休。他说：“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白居易晚年常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李元爽、如满、卢贞八位德高望厚的老人聚会香山，称为“香山九老”。明代画家黄彪作《九老图》，描绘了白居易与其他老人对弈的情景。

唐代的僧人中亦不乏能棋善弈之人。和尚儇，长沙人，棋艺颇高。刘禹锡作《观棋歌》相送，“长沙男子东林师，间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谁能知。”诗

中还说他落子如天星落地，攻杀似敌阵夺帅，行棋布阵众人还未明白，虎穴得子已使人们大吃一惊。和尚齐己，自号衡岳沙门。他与晓唐诗人郑谷是棋友。他们常以山果为赌，弈棋至深夜。郑谷棋高一着，经常得胜取山果而去。分手时，郑谷作《寄棋客》诗赠与齐己。诗云：

松窗楸局隐，相顾思皆凝。

几局赌山果，一先饶海僧。

覆图闻秋雨，下子对秋灯。

何日无羁束，期君向杜陵。

僧人也喜与文人墨客结成诗棋之友。白居易有诗曰："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寥寥数笔，把与僧人对弈的情景勾画得有声有色。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棋。

中国的围棋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唐代许多朝鲜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棋。晚唐诗人张乔有一首《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诗："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吴图。""棋待诏"是专门陪帝王下棋的官。朴球是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人，他能在唐朝担任"棋待诏"，可见其棋艺高超。他回国时带着三国时孙策的"吴图"和刚得到的围棋新招式。随着中朝两国佛教的交往，一些擅长围棋的朝鲜和尚也来到中国。诗人雍陶在《送友人罢举归东海》诗中，有"沧沧天堑外，何处是新罗？舶主辞蕃远，棋僧入汉多"的诗句。

在唐代，棋以诗传，诗以棋显，诗歌与围棋这中国两

大传统文化艺术可谓相映成辉。

三　中国围棋传日本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开展围棋活动最广泛的国家，而日本的围棋是在隋、唐时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也可能是经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的。日本平山菊次郎就持这种观点，他在《简明日本围棋史》中说："围棋经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约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大和朝初期。"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有根据的，因为围棋传入日本并不是只有一条传播路线。

将围棋直接传入日本的使臣是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和遣唐使。这些留学生成批来到长安学习，少则住上数日，多的要住上二三十年。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吸取着其中的精华，回国后，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我国文化带回日本，其中包括围棋。唐朝时，日本先后派出19批遣唐使来到中国，到894年日本停止派遣唐使时，曾将1 579部、16 790卷的中国书籍带回日本，其中有许多围棋著作，使中国围棋大规模地输入日本。

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应该在隋、唐时期。因为，我国在汉魏时与日本已有交往，但围棋还不甚盛行，主要集中在宫廷，所以，围棋还未传入日本。到隋、唐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为围棋传入日本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围棋，在日本写作“碁”（“碁”是“石”的象形，似乎比中国今日用“木”字旁的“棋”字更古老而逼真）。“碁”这个古字最早出现在公元712年编成的日本文献《古事记》中。而在此前的701年（相当于唐武则天大足元年），日本文武天皇公布的法令《大宝律令》中规定，禁止僧尼玩博戏，而不限制围棋。需要用法令来规定，本身就说明有不少僧尼喜欢下围棋。《北史·倭传》和《隋书·东夷传》都记载“倭国……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这两部书都是奉唐太宗李世民的命令编修的史书，反映了隋唐时期围棋已经传入日本的史实。

在日中两国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围棋传入日本的有趣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吉备真备从“鬼”学棋的故事。

吉备真备是日本片假名的创始人，有名的历史人物。日本养老元年（相当唐玄宗开元五年，717）10月，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随日本第七次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阿倍仲麻吕入国子监读书，结识了不少唐代的文人墨客，如王维、李白、储光羲、颜真卿等，相互赋诗答唱。后来，阿倍仲麻吕取汉名“晁衡”，中了进士，留在唐朝做官，直到770年死在中国。而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数年后，返回日本，并于晁衡死后出使唐朝。日本《江谈抄·吉备入唐轶事》说：吉备真备入唐后，唐人要难他，杀他的锐气。于是先由30位学者出题，考《文选》，吉备博达聪慧，顺利通过。唐人再考围棋。吉备不会下围

棋，正在为难之际，阿倍仲麻吕的鬼魂忽然出现，以楼上的窗格作棋盘格，经过一个晚上的观察、思考、体会，终于学得高超的棋艺，战胜了唐朝的国手，维护了日本民族的尊严。由于这一传说流传很广，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把围棋传入日本的功劳归到吉备真备的头上。19 世纪以来，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论证，已经肯定早在吉备以前围棋已传到日本。“围棋由吉备公传来”的说法仅可视为一种传说。

四　宝应象戏

北周武帝所创的“象戏”，到唐代仍处在演变过程中。虽然《旧唐书·吕才传》说：“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之局《象经》，不晓其旨。”但是象戏并非已经失传，在有关文献中还可见到一些唐代象戏的情况。

唐代牛僧儒撰写有一部著名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其中有两篇故事涉及到了象戏，其事虽怪异无稽，但却是现存唯一能考证唐代象戏形制的珍贵文献。《玄怪录·岑顺》篇中讲：唐宝应元年（762），汝南人岑顺旅居陕州吕氏凶宅，夜深闻鼓鼙之声，数夜都是如何。一夜，他梦见鼠穴化为城门，战鼓齐鸣，旌旗万数，两支军队在激烈厮杀。听见军师发布命令。“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并命令“各有一

步卒横行一尺”。结果一方大败奔溃。后来掘地发现一座古墓，“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

这是一篇有关唐代象戏的传说故事，因故事中有“时宝应元年也”的话，所以人们习惯称唐代象戏为“宝应象戏”。从《岑顺》传奇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象戏的一些基本情况。唐代象戏的棋盘是金属的，棋子为立体象形，起码包含有马、车、将、卒四种，已与周武帝所创“象戏”不同，具备现代象棋的雏形。棋子的布阵采用两军对垒式，开局方式是先进马，再进卒，后进车，这与今之国际象棋的开局相似。“天马斜飞度三止”，与今日象棋的马着法相同。“将”则可以前后左右四方应敌。“车”直行前进。“卒”只能一步步前进。表明宝应象戏与现代象棋的下法有相似之处。

《玄怪录》中，还有一篇《巴邛人》，讲述了另一个神奇美妙的故事。大意说，有个巴邛（即巴郡、邛州，在今四川）人，家有桔园，因霜后，桔子已收，只余下两个大桔，摘下剖开一看，“每桔有二老叟，鬓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这个故事的起源十分久远，“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来如此，似在陈隋之间，但不知指的年号耳。”这个故事为后人津津乐道，并因此称象棋为桔中戏。明代的著名象棋谱《桔中秘》、《桔中乐》等书名就来源于此。

除《玄怪录》外，有关唐代象戏的材料实在不多。诗

人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诗中，讲到当时的“博弈家”设置的各种游艺项目，其中就有“象戏”。今人王端编集的《古锦图案集》收有一幅宋代织制的琴棋书画锦，令人感到兴奋的是，锦上“棋”的图案是一种黑白相间、纵横各为八道的象棋盘，与现代的国际象棋盘一模一样。从中国象棋发展史上看，这种八八象棋是最为古老的，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所以，古锦八八象棋盘为我们提供了唯一了解唐代象戏的形象资料。同时，也说明中国象棋对国际象棋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

五　博戏的盛行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大和三年（829）作有《和春深二十首》，其中一首诗云：

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

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

兵冲象戏车，鼓应投壶马。

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

诗中的“博弈家”是专门供人娱乐游戏的场所，里面设有围棋、象戏、投壶、弹棋、双陆等游艺项目。博弈之家的出现，必然有众多嗜好博弈的人参加，这反映了唐代博弈之风的盛行。

唐代是中国博戏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各种博戏风行，

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且出现握槊、长行、采选、叶子、双陆等博戏。这对后世博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握槊又称长行，始于北魏，相传是西域少数民族所创。《魏书·术艺传》记载：握槊“盖胡戏，近入中国”，相传胡王有位弟弟，因犯了罪将要被处死。他在牢狱里发明了握槊，送给胡王。胡王受到感动而赦免了他。握槊在北朝流行一时，进入隋唐后，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风靡全国，位居诸类博戏之首。所以，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

握槊用骰子行棋，偶然性很大，下法简单，人人都可参与，所以，握槊赢得上至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当时人很看重握槊，以善握槊为荣，以不善握槊为耻。李肇甚至认为“围棋次于长行”。唐代诗人温庭筠喜好围棋，经常与和尚对弈，“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但他的妻子喜欢玩长行，总是劝他不要下棋，早些回家玩长行。为此，温庭筠作《南歌子词》一首：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韩愈不仅好围棋，也喜欢玩握槊。他说自己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总是以围棋或握槊来消遣娱乐。他在《示儿》诗中吟道：“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

关于握槊的棋型和下棋的方法、步骤，如今都已失传。目前唯一可供研究的文献是唐代邢宁的《握槊赋》和刘禹

锡的《观博》两篇文赋。

从两篇文赋的内容来看，握槊的用具有棋局、棋子和骰子。棋局是方形的，中间相对有两个圆形图案，可能代表着行棋中的某一站。棋局不饰丹漆，贵重的用琅玕美石镶砌成局道。所以邢宁《握槊赋》说："张四维则地理攸载，背两目则天文可观。不可饰于丹漆，宁假贵于琅玕。"棋子共有 30 枚，分黄黑两色，各 15 枚。《唐国史补》说：长行"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握槊赋》中"故元黄而不杂"指的也是棋子。"元"通"玄"字，就是黑色。

握槊所用的骰子，文赋中称其为"双头"和"博齿"，共两枚，骨制。骰子的形状既不同于以前五面体的"琼"，也不同于后世六面体方形的骰子，而是觚稜形。所谓"觚稜"原指宫阙上屋角瓦背成方角棱瓣的形状，这里形容骰子有棱角。刘禹锡《观博》对握槊所用的骰子，论述文字较多。他说："博齿二，异乎古之齿。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期月。"骰子上分别刻有不同的数值，一枚是红色数字，一枚为黑色数字。这种骰子是从琼向现代通行骰子的过渡形式。

握槊的玩法大体是：将棋局放在屋庑下，主客相让，分出先后。将骰子掷出，视其数值的多少而依"棋道"行棋，即所谓"视其转止，依以争道。"最后大约以占据对方棋道争胜负。由于文赋辞藻的玄妙难懂，缺乏实物资料，握槊的具体走法，还无法考证。

博戏的特征就是以掷骰子为主要游戏手段。中国古代，除了六博、樗蒲、握槊等以骰子为辅助用具的博戏外，到唐代还产生了单独以骰子为主的骰子戏，这就是“采选”。

采选，又叫“骰子选格”，后世称为“升官图”。宋代徐度《却扫编》云：“彩选格，起于唐李郃”。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上说：唐贺州刺史李郃感到当时任命官员的程序十分混乱，便采用掷骰子的游戏方法，发明了“采选”游戏。玩法是在画有百官进退的图上，用骰子掷采，依采大小，进选官职。很快这种游戏便风靡社会，特别是受到想升官发财之人的喜爱。唐文宗时，国子博士房千里在他编写的《骰子选格》一书的序中说：开元三年（838）春天，他乘舟经过洞庭湖，忽然遇到暴风雨，难以前行，便系船于湖旁。他上岸避雨，遇到几位号称进士的人，正在悠然自得地玩骰子戏。玩法是将唐朝68个官职按品级排列在一张正方形盘面上，中部排列的是最高级官职，官卑职小的在外围边沿。一人先将骰子掷于盘上，然后按其定格位置，在棋盘上前进或后退，先到最高位的人为优胜。

升官图发展明清时代，达到极盛，并繁衍出“选仙图”、“消夜图”、“揽胜图”、“群仙庆寿图”等许多品。

升官图是封建科举制的产物，升官图曾使那些想做官的人忽而欢喜，忽而恐惧，忽而好像真做了大官，忽而又懊丧不堪，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

叶子戏，是古博戏中较为晚起的一种游戏。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最后发展成为纸牌，是现今麻将牌的肇端。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引《杂录》说："唐太宗间，一行世数禅师制葉（'叶'字的繁体）子格进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说叶子戏是唐代著名的天文、数学家僧一行制作，又说"葉子"二字拆开为"二十世李"，预示唐朝李家天下可传二十世。清代人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一则认为："世传叶子，晚唐时妇人也，撰此戏。"实际上，在古代，书籍原来都是卷轴式的，到隋唐时，才有折叶式的书。最初的纸牌是用一张张的单纸片制成，所以人们叫它"叶子戏"。叶子戏最初在宫廷内流行，后流传到民间。

唐代，叶子戏受到皇室和文人墨客的喜爱，他们把这种游戏视为高雅时髦的活动。如唐代诗人李洞爱好叶子戏，曾写有一首给龙州郎中的打叶子诗：

红烛香烟扑画楹，梅花落尽庾楼清，

光辉圆魄衔山冷，彩镂方牙着腕轻。

宝帖牵来狮子镇，金盈引出凤凰倾，

微黄喜兆庄周梦，六赤重新掷印成。[①]

从诗中看出：这时的叶子戏还必须有骰子相辅助。叶子上绘有宝帖、金盆、狮子、凤凰等各色图案。最终以是否占据最高位置，来决胜负。说明最初的叶子戏与采选或"骰子采选"有关。唐人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说："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南唐时，李后主的妃子冉氏又在唐代

---

① 李洞：《龙州韦郎中先梦六赤后因打叶子以诗上》，《全唐诗》卷723，第8 299页。

叶子戏的基础上编制了“金格王子叶子格”，使叶子戏更加完善和有趣。

后来，叶子戏经水浒叶子、马掉牌两个变种，到清朝演变成现在流行的麻将牌。

双陆，是握槊的同类博戏，两者的规则和玩法都差不多，所以后人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宋人洪遵说：双陆“以传记考之获四名，曰握槊，曰长行，曰波罗塞戏，曰双陆。”[①]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中说：“双陆一名握槊，本胡戏也。”实际上，两者多少还是存在差异的，否则握槊、长行和双陆不会同时流行于唐代，唐人李肇也不会说长行之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②]



仕女双陆图

---

① 洪遵：《谱双·序》。

② 李肇：《国史补》下。

双陆在唐代宫廷中十分流行。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武则天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先后把皇位继承人李弘、李贤、李显或杀或逐，准备立武家的人。群臣纷纷上谏，却毫无效果。一次，武后对大臣狄仁杰说："我昨夜梦见与人双陆，一直不胜，这是什么缘故？"狄仁杰乘机上言道："双陆不胜，说明宫中无子，这是上天的警告啊！"武后才醒悟过来，立李显为太子。

狄仁杰不仅巧妙地利用双陆解决了重大政治问题，而且自己也会下双陆。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道：有一次，狄仁杰奉武后之命与她的男宠张昌宗赌双陆。对方以南海郡进奉的集翠裘作赌注，狄仁杰却以普通朝服下注。武后以为价值不等，狄仁杰说："翠裘再贵重，只是私物，怎能比过公服！"结果狄仁杰胜，但刚一出门就把集翠裘付与家奴了，表示了对张昌宗的鄙视。元朝人谢宗可《双陆》诗中有"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在民间，双陆同样盛行，而且不乏癖嗜之徒。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高宗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酷爱双陆，整日局不离身。有一次泛海遇到暴风，船破落水，他右手抓住一块破木板，左手紧抱着双陆局，嘴里含着骰子，经过两天一夜的漂流，上岸时双手都见了骨头，而双陆局仍在怀里，骰子也还在口中。可见他痴迷双陆的程度。

双陆是一种博戏，一般的平民百姓对其赌博的消极面

是反对的，所以民间流传着孔子与小儿辩论双陆的传说。敦煌变文《孔子项托相问书》云：“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失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诗书；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在这个传说故事中，最讲礼仪的孔子竟不如小儿明白“嗜赌亡身”、“玩物丧志”的古训，这表达了唐代民间对双陆这种博戏的看法。同时也说明双陆在民间相当流行，否则不会编入传说故事中。

双陆的用具包括棋局、棋子和骰子。双陆局的样子像带栏边的方桌，上画 12 条棋道，因双方左、右各 6 条棋道，故名“双陆”。双方各持 15 枚杵椎形棋子，分黑白二色，称作“马”。也有 12 枚或 16 枚的。行棋时，先用 2 颗骰子在棋局上掷彩，根据彩数行棋，白方以右行到左，黑方从左到右，一方的棋子全部进入终点的 6 条棋道内，便获胜。1973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中出土一件嵌螺钿木双陆局。长方形盘面四周围起短栏，长边中间有月牙形“城”，左右各有两个螺钿镶嵌的花眼，盘下开壶门形光洞，绘有云头、花朵、飞鸟等图案，制作异常精美。此外，在长沙牛角镇、湘阴桐子山和四川万县唐墓中，均出土过双陆棋局。

唐代打双陆的情景从绘画作品可以看到。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屏风式壁画，在第二条的画面上，有一位坐在双

陆盘旁边的贵族，手握棋子，正在指画陈说。后面立着二个宫廷侍者。常任侠先生认为："就画面看起来，表情和人物与狄梁公握槊进谏武后的故事相合。"[①] 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曾画有《唐宫双陆图》，现存大英博物馆。这幅图中的双陆局是双层的，棒槌状的黑白双陆子错落地摆在盘上，两个贵妇正聚精会神地对局，另一个贵妇由侍女搀扶着站在旁边观局，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仕女打双陆的情况。

在唐代，中国的双陆已经传到日本。《日本书纪》记载：持统女帝三年（相当于唐中宗嗣圣六年，689）禁止百姓打双陆。日本正仓院珍藏有多件年代相当于唐代的双陆用具，有双陆局、棋子、骰子和双陆筒等。其形制与中国的基本一致。这反映了中日两国息息相通的文化渊源。

六　龟背戏与宫棋

唐代还流行两种鲜为人知的棋戏，名叫龟背戏和宫棋。由于有关的文献资料甚少，我们只能知其大概。唐代诗人柳宗元写有一首《龟背戏》诗：

长安新技出宫掖，喧喧初遍王侯宅。

玉盘滴沥黄金钱，皎如文龟丽秋天。

①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第5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八方定位开神卦，六甲离离齐上下。

投变转动玄机卑，星流霞破相参差。

四分五裂势未已，出无入有谁能知？

乍惊散漫无处所，须臾罗列已如故。

徒言万事有盈虚，终朝一掷知胜负。

修门象綦不复贵，魏宫妆奁世所弃。

岂知瑞质耀奇文，愿持千岁寿吾君。

庙堂巾笥非余慕，钱刀儿女徒纷纷。①

历代学者都不太清楚龟背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明朝蒋之翘注解《龟背戏》诗说："按龟背戏，其制不可详。观诗意，乃亦博棋之类尔。状如龟背，因以为名云。"从《龟背戏》诗这唯一的史料中，可以粗略了解它的形制。这种新的博戏最早出于宫内，很快在王侯贵族中间盛行。玉质的棋局，形状如龟背。棋子是用黄金钱代替，共有六枚。行棋方式是先将棋子布于棋盘上，以掷骰子决定行棋步数。"魏宫妆奁"是指类似弹棋的游戏。《弹棋经序》中说：曹操执政，禁止宫中玩弹棋，宫人就用金钗、玉梳等在妆奁（女子梳妆所用的镜匣）上，互相弹射，玩类似弹棋的游戏。由此推断，龟背戏是唐代宫廷的人，在弹棋基础上新创的一种棋戏，玩法与弹棋相似。

宫棋也是因为起于宫廷内而得名。现今见到有关宫棋的材料是唐代张籍、王建和白居易的诗歌。张籍《看美人

---

① 《柳河东集》卷四三，《四部备要》本。

宫棋》云：

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

趁行移于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

王建《夜看美人宫棋》云：

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

巡拾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

白居易也有“双声联律句，八面数宫棋”的诗句。

宫棋没有专用的棋具，而是借用围棋的棋盘和棋子。玩法是将黑白棋子杂乱地布在棋盘上，两人各认一色棋子，然后按照一定规则拾取各自的棋子，最后以所得多寡决胜负。由于材料缺乏，宫棋的具体规则还不清楚。清人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一，说：宫棋，也称“逼棋”，有“挨三、顶四、擦七、驮八罚例。”由此推断，宫棋的玩法有点类似现今民间流传的蒸笼棋，规定遇到某一数额，可拾取，而有遇到三、四、七、八等相连棋子时，则要受罚。

可见，龟背戏和宫棋是唐代人创制的两种玩法简单但有趣的棋类游戏，它流传于宫闱和贵戚之家，尤其受到内宫嫔妃宫女们的喜爱。

七 《马球图》与击鞠

马球是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娱乐活动，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无不“以此为乐”。因它是一项骑

在马上挥杖击球的活动，所以，又叫击鞠、击球。

1972 年，在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了一幅极其珍贵的《马球图》。画面上绘有 20 多个骑马击球的人物形象。他们都穿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巾。其中，五名骑手正在奋力夺球，最前面一人，手执偃月形球杖作返身击球动作，身手矫健，姿态优美。后面的骑者，有的持杖紧追不舍，有的则策马行进在树木山石之间。整个画面气势宏伟，再现了唐代马球活动的精彩场面。

中国的马球始于何时？说法不一，大多数人认为，马球起源于西藏，唐朝初年传到了中原地区。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侍臣说："我听说西蕃（今西藏）人爱好马球，曾派人去学习，也看过一次。前两天升仙楼有些蕃人在街里打球，大概以为我爱好这种游戏，故意在马上奔驰表演。"以此可以证明，马球在唐朝初年，已由西藏传入唐都长安城。

唐朝中期以后，作为供人休闲娱乐的马球活动逐渐盛行起来。首先受到了唐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的喜欢。唐代皇帝中几乎没有不爱好打马球的，有的球技还很高超。唐宣宗李忱每月和皇室贵戚在专建的雍和殿打两三次球。他能在飞奔的马上，用球杖连续击球数百次。唐僖宗李儇爱好蹴鞠、斗鸡、马球。他曾对近臣优人石野猪说："假如朝廷设立打球进士科，我可以获得状元。"石野猪幽默地回答道："如果遇到尧、舜、禹当礼部尚书，陛下不免

要落第的。”[①] 在唐代的皇帝中，如推举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够格。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吐蕃使者到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请他们到梨园亭子里观看马球。使者禀奏中宗，说他手下有会打马球的，希望与唐朝的宫人较量一下。于是，两队赛马球，结果唐宫人连输了几场，中宗让儿子李隆基上场，李隆基往来奔跑，左右击球，速度如疾风闪电，几乎没有人能够赶得上，终于战胜了吐蕃人。

唐玄宗登基后，马球之风更盛。玄宗经常携杨贵妃去球场打马球。宋人李公麟绘了一幅《明皇击球图》。晁无咎题诗道：“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批评唐玄宗耽于宴乐、不问政事的做法。

皇帝的喜好带动了社会上打马球的盛行。例如，唐代文人中进士后，照例要到月灯阁下打球。文人们把打马球当作很时髦的事。唐人王定保《唐摭言》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僖宗乾符四年（877），一批新进士在月灯阁下打球，忽然几个神策军军官执着球杖，闯进了球场，要与新进士比试。当众人不知所措时，一名叫刘覃的新进士跨马执杖跑进球场，表示应战。高傲的军官根本不把这位书生放在眼里。不料开球后，刘覃动作极其敏捷，“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几个回合之后，他挥杖用力一击，球疾

① 宋孔光宪：《北梦琐言》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飞而去，不知落到何处去了。军官们想不到一个文弱书生竟然有如此高超的球技，一个个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跑掉了。

唐代，不仅须眉男子喜欢马球，一些窈窕淑女也爱玩马球。1975 年，江苏邗江出土了一枚唐代击球图铜镜，上面雕刻着四个驱马击球的女子形象，奔跃的马，挥舞的球杖，英武的姿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玩马球的史实。由于骑马打球，动作十分的激烈，为了适宜更多女子参加击鞠活动，唐后期出现了驴鞠，即骑驴打球。《旧唐书·郭英乂传》记载：唐代宗时，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乂"聚女人骑驴击球"。唐敬宗和僖宗都喜欢驴鞠，于宝历二年、乾符二年在宫中观看了驴鞠，僖宗则进而亲自下场，"乘驴击球。"后来前蜀的花蕊夫人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描写了女子击鞠的优美姿态。

唐朝时，马球东传日本。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东北臣属于唐朝的渤海国曾派使节王文矩出使日本，受到嵯峨天皇的宴请款待。宴前，王文矩及使团中一些会打马球的人表演了马球，深受嵯峨天皇和日本百官的喜爱。嵯峨天皇即兴作《早春观打球》诗一首：

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廷。

回杖飞空凝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

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飞行乱雷声。

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

这首诗反映了打马球的赛场、用具和观众的热烈情绪。

以鼓助威，以筹计分的方法，都与唐朝相同。这说明，日本马球是由唐代外传的。

八 《气球赋》与白打

唐代是蹴鞠发生变革的时期，较之前代，不论风靡程度，还是在球、球门、玩法等方面都有变化和发展。

这首先表现在球体的制作上。唐以前的“鞠”，是实心的，用皮革制成，中间用毛发等物充填起来，所以《汉书》注说：“鞠，以皮为之，实以毛。”到了唐代，由实心球发展为充气球。唐代人仲无颜《气球赋》说：“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① 意思是说，球是靠充气才由方变圆的，为了不让气球漏气，球皮是用手缝制的。有首戏嘲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诗，也谈到了气球。诗中说：

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

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②

这首诗说明了唐代气球的制作过程：挑选上好皮张，经过“泡”、“燂（tān）”，去毛去脂，使之成为柔软结实的

①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第371页，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52。

皮子。然后裁成全等的三角，一般为8块。接着是缝合、充气，“气既充满，鞠遂圆实。”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是最早发明的，比西方早三四百年。

球的变革，带来了踢球方法和球场等方面的改变。唐以前，球是实心的，不能踢得太高，所以球门是很矮的，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变成空心充气的，弹性很好，所以，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这种球门一直传到宋元时期。

唐代蹴鞠的发展还表现在“白打”踢法的出现。由于球体变轻，弹性增强，就要求踢法更加讲究技艺。于是不用球门，专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法产生了，称为“白打”。白打可以两人对踢，也可以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对踢。这种踢法活动量小，主要在女子中流行。唐代诗人王建在一首《宫词》中写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说的就是唐代寒食节宫女玩“白打”的情景。五代诗人韦庄也有类似的诗句“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说明白打已经在唐代皇宫内流行，参加的人大都是女子。

在唐代蹴鞠游戏多在寒食节进行。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古代人都要玩蹴鞠和秋千，以消除寒食的积滞。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诗说：“蹴球尘不起，泼水两新晴。”这些都是描写寒

食蹴鞠的诗歌。

九　拔河兆丰年

唐代的节日游艺活动丰富多彩，仅在寒食节中就要进行蹴鞠、秋千和拔河等活动。拔河是我国古老的民间游艺活动。在六朝时期，它被称作“施钩”，隋朝时则称之为“牵钩”，到了唐代才改称为“拔河”。人们把这种娱乐活动当作祈求丰年的一种美好祝愿。

拔河在唐代达到最兴盛的时期。唐代人封演在所著《封氏闻见记》中描写了当时拔河活动的情景。他说：当时的老百姓，在拔河时，用一种长四五十丈的大绳，两头还拴着几百条小麻绳。人们把麻绳挂在胸前，分成两队相互拉好。在大麻绳的中间，立一面大旗作为界限。每次拔河都有几百人参加，加上几千名观众，擂鼓呐喊助威，震惊远近，最后被牵动者为输。那时的拔河形式与今天的拔河不太一样，今天拔河是单独一根绳子，而古代所用的绳子是在一条大绳的两头分系数百条小绳。所以，古代的拔河人数要比现代多得多，场面更大，更热闹。如今在甘肃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和日本的某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拔河形式。

拔河不仅盛行于民间，而且宫廷中也甚好此戏。《封氏闻见记》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

拔河之戏。"《新唐书》等文献记载：中宗李显爱看拔河，常让宫女进行拔河比赛。而民间拔河，都是男子参加。景龙三年（709），李显让几百名宫女在玄武门外拔河。之后，又准她们去游宫市，结果几十名宫女乘机跑掉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唐中宗又下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加上诸学士等，都到梨园球场拔河。当时韦皇后指定：中书、门下省的三位大臣和五位将军为一队，尚书省七位大臣和两位驸马是一队。中书令萧元忠见自己这一队不但少一人，而且老头子居多，便跪下启奏道："小臣这一队，力量太差了！"站在唐中宗身旁的安乐公主，因自己的丈夫也参加拔河，自然护着附马一边，便插嘴说："你们这边有五个将军，都练过武，力气更大哩！"唐中宗连忙点头说："人虽少一个，力量并不弱。"萧元忠无奈，只好遵旨与驸马一队比试。太监们早摆好了绳子、旗鼓，宫女和太监分成两队呐喊助威。一声鼓响，两边齐用力，绳子拉得很紧，双方坚持了一会儿，怎奈驸马一队年轻力壮，一下子把绳子拉了过去。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都是60多岁的人，手脚很不灵活，随着绳子向前一下子扑倒在地，很久都没爬起来，引得唐中宗和周围的人大笑不止。

唐玄宗李隆基也喜欢拔河，他把拔河的场地由宫内梨园搬到了宫外广场，规模愈来愈大。《唐语林》等史籍上生动地记述了唐玄宗所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拔河。当时参加拔河的人有1 000多人，场面壮观，气势宏伟，使得当时在长安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李隆基命大臣薛胜作《拔河

赋》、张说作《奉和圣制观拔河》诗，自己也作《观拔河俗戏并序》，生动地描绘了拔河的情景。诗和序云：

俗传此戏，必致丰年。故命北军，以求岁稔（rěn）

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

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

噪齐山岌嶪，气作水腾波。

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

意思是说：传说玩拔河之戏，可以求得农业丰收，所以命令北军举行拔河，祈求丰年。勇敢有余的武士们分成两组拔河，人与长绳像一条长河一样。拔河可以锻炼意志，争出胜负。人们齐声鼓噪，给双方加油鼓劲。拔河的双方相互敌住，整个队伍像山一样巍然屹立，毫不动摇。争取有一个丰收的年岁，在年丰之前，大家快乐快乐。

十 "斗鸡走马胜读书"

唐代是斗鸡之戏的盛行时期，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在当时，斗鸡除了以娱乐为目的外，还具有激发勇敢斗志的作用，所以，不仅社会上盛行斗鸡，唐朝统治者在军队中也推行斗鸡之戏。唐玄宗因为爱好斗鸡戏，在宫中专门修建了皇家鸡坊，从军队中选拔500名少年兵士专门饲养、培育、训练斗鸡。据陈弘祖《东城老父传》记载："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立鸡坊于两宫间，

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

皇帝喜欢斗鸡，那些会斗鸡的人自然得到皇帝的宠幸。一次，唐玄宗出宫游玩，看到一个名叫贾昌的小孩正在玩木制的鸡，灵巧异常，还听说他能听懂禽鸟的语言。玄宗非常高兴，当即召贾昌入宫作鸡坊小儿。贾昌能识别斗鸡的壮弱和勇怯，熟悉鸡的饮食、疾病和驯习的方法，受到玄宗的格外信任。不久玄宗又升贾昌任鸡坊的头目，还经常赐给他金帛财物。因此当时有民谣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辛辣地讽刺了唐朝宫廷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每年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唐玄宗都要看斗鸡。据《东城老父传》记载：贾昌在斗鸡时，头戴雕翠金花的帽子，身穿绸缎绣花的衣裤，手中拿着大铃率领鸡队入场，整齐地排列在斗鸡殿中，等候比赛。斗鸡们个个鼓动翅膀，竖起羽毛，磨嘴擦足，跃跃欲试，准备一场厮杀。贾昌一挥手中的鞭子，斗鸡正式开始。一对对斗鸡挥动着翅膀，睁着发红的眼睛，扑向对方，利嘴一起一落，鸡毛飞扬，很快胜者引颈长鸣，向主人表示胜负已定。贾昌再挥鞭子，胜者走到鸡队前面，败者走到鸡队后面，有顺序地跟贾昌回到鸡坊。这种斗鸡场面，组织缜密，驯导有方；尤其是大集团式的斗鸡活动，水平和技艺之高，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时称贾昌为“神鸡童”，而唐玄宗也不愧是一位“斗鸡皇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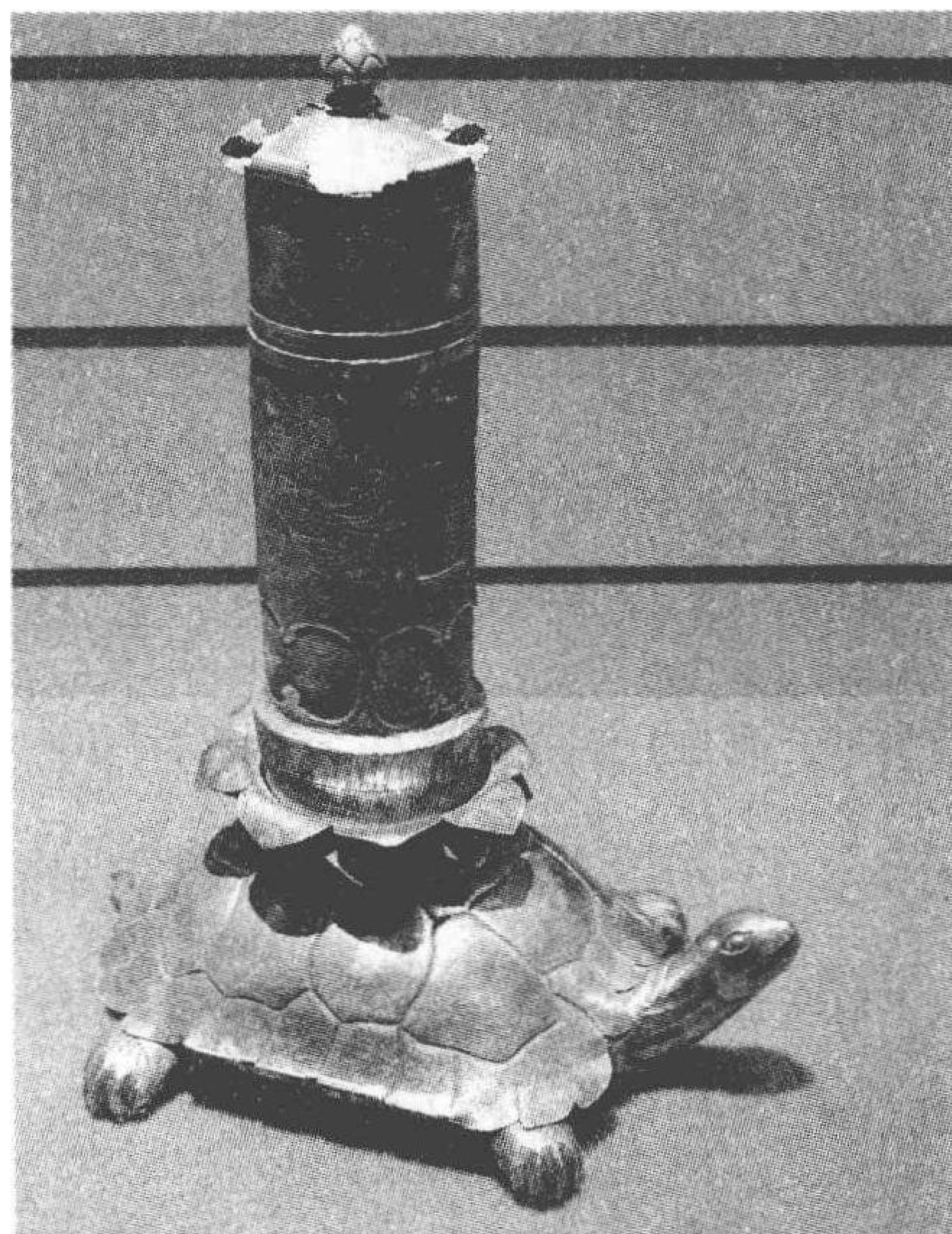
斗鸡图

皇帝的爱好带动了社会上斗鸡之风的盛行。宗室贵族，达官富豪竞相仿效，有的因一只鸡而不惜倾家荡产，重金购之。有的因斗鸡而引起皇室内部的矛盾。在唐高宗时，诸王好斗鸡，诗人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英王的斗鸡，引起诸王的不和。高宗看后也非常生气，下旨罢免了王勃的官，放所有斗鸡回山中。在平民百姓当中，斗鸡也很盛行。“洛中老幼皆爱斗鸡，家家养三五十羽，甚至于有的以一亩田换一只斗鸡。”一些贫穷的人，养不起鸡，便

玩弄木鸡。贾昌当年就是因玩木鸡而被唐玄宗看中的。

斗鸡游戏传到了日本。当时日本派遣使者来唐朝，见到唐朝朝野风靡的斗鸡游戏，便将其带回日本，并很快在日本宫廷盛行起来。日本《三代实录》中就有元庆三年（879）二月二十八日，天皇在弘徽殿观看斗鸡的记载。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成书的《荣华物语》中也有宫廷斗鸡的描写。此后，斗鸡游戏流入民间，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在许多传世的日本古代绘画中经常可以见到斗鸡的场面。

十一　繁富多彩的酒令



唐代涂金银“论语玉烛”酒令具
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

在中国游艺史上，有唐一代，“酒令最盛”。蔡宽夫《诗话》云：“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唐代酒令，无论从形式、组织、体制还是从内容上看皆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据现今所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唐代酒令已由前代简易式样演进为繁难格局，其体制已臻完备。唐代酒令纷繁多彩，约有20

余种，如藏阄、藏钩、手势令、指巡胡、卷白波、抛打令、筹令、骰子令等等。并产生出现存最早的一部酒令专著《醉乡日月》。

藏钩、藏阄属于酒令中的猜枚类。藏钩起于汉代，到唐代仍然盛行。这时藏钩游戏已不是用玉钩来做游戏，而是行酒令的人取些小物件，如棋子、瓜子、钱币、莲子等握于手中，让人猜测，一猜单双，二猜数目，三猜颜色，中者胜，负者则罚饮酒。藏钩的猜法，主要是要善于心理分析，察对方之言，观对方之色，以断定物件所藏处。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他曾在荆州宴请朋友，宴间行藏钩酒令。有位名叫高映的举人擅长藏钩，每猜必中。段成式向他请教其中的奥秘，高映说：藏钩要察言观色，如同察访盗贼一样。藏钩在民间很流行，通常在每年的正月进行。《艺经》上说："义阳腊日饮祭之后，叟妪儿童为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较胜负。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描绘民间玩藏钩的情景，"几度亲情命看花，数遍藏钩夜欢笑。"

藏钩在宫廷中仍然盛行。李白《宫中行乐词》中有"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的诗句。不过藏钩游戏到了宫廷中，便成了一种博戏，有赌注，可以赌到 3 000 疋彩罗。参加藏钩的人多达几百人，每方以 100 人为限。敦煌写本中的《宫廷诗》云：

欲得藏钩语多少，嫔妃宫女任相和。

每朋一百人为定，遣赌三千匹彩罗。

又云：

口雷高语任争筹，夜半君王与打钩。

恐欲天明催促漏，赢用先起舞缠头。

藏阄起源于“藏钩”，是藏钩的一种衍化形式，两者相似但有所区别。“藏阄”法令已失传，从“阄”的字义来推测，“藏阄”应是猜握在手中写在纸片上的阄。唐代彦谦在《游南明山》中称“阄令促传觞，投壶更联句。”诗人顾瑛也有“分曹赌酒诗为令，狎坐猜花手为阄。”可见，“阄令”，就是用阄来行酒令，如用酒筹之类。

手势令，就是现在所称的“猜拳”、“划拳”。其方法是两人相对同时出手，各猜所伸出手指之合计数，猜对者为胜。手势令最迟到唐代已经产生。晚唐人皇甫松著有《醉乡日月》，对唐代的酒令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酒令专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皇甫松记载道，当时人在宴饮时行手势令。五指与手掌指节各有名称，称手掌为虎膺，指节为松根，大指为蹲鸱，食指为钩戟，中指为玉柱，无名指为潜虬，小指为奇兵，腕为三洛，五指通称为五峰。规定后者胜过前者。饮酒时，两人同时出指，视所出的是哪一指，以定输赢。可见，至迟到唐代晚期，手势令已产生。到五代时，手势令已流行。《五代史·史宏肇传》记载：“（史宏肇）会饮三司使王章第，酒醉为手势令。”后来的“猜拳”、“划拳”，即由“手势令”演化而来。由于“手势令”明快简捷，通俗易行，逐渐成为一种最流行的酒令游戏。

酒令中，除了用手行令外，还有多种利用某种游戏用

具行令的酒令。其中最主要的“骰子令”、“抛打令”和“指巡胡”都产生于唐代。虽然，早在汉代，中国传统的12面体“骰子”已经用于饮酒游戏，但作为酒令之一的“骰子令”则产生于唐代。皇甫松《醉乡日月》卷三的“骰子令”，原文已佚。但在其他卷中，也有不少有关“骰子令”的记载。他说：“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逦入令。”可见，骰子令是当时以掷采决定饮酒次序的基本形式，往往为其他酒令的开锣戏，起着活跃酒筵欢乐气氛的作用，诚如白居易有诗云：“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元稹诗：“叫噪掷骰盘，生狞摄觥使”描绘的那样，行令的人是多么激昂亢进，欢快异常。

抛打令是一种歌舞化的酒令，它比骰子令出现得晚，到盛唐之时才诞生。唐及五代人诗中常有“抛打令”的句子。白居易诗云：“香球趁拍回环匝，花盏抛巡取次飞。”徐铉诗云：“歌舞送飞球，金觥碧玉筹。”《太平广记》也记载崔氏女弟“每宴饮，即飞球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行抛打令时，伴以乐曲，先以香球或花盏回环巡传，待到乐曲停止时，中球或花盏者应起舞歌唱。

指巡胡，一名“酒胡子”，是唐代宴饮时的一种行令工具，模样像个小人，上头细，下头粗，底部尖。饮酒时，把它放在盘子里，用手转动便成旋转舞蹈之状。当它停下来时，它的手指向谁，谁就饮酒。唐代诗人元稹有《指巡胡》诗说：“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身惟直指，无意独欺愚。”吟咏的就是“酒胡子”。

筹令是中国酒令体系中重要的一类。筹，就是酒筹，既可用来记数，又可在酒筹上注明行令的具体内容，依筹行令。唐代元稹《何满子歌》有："牙筹记令红螺杯"之句中，"牙筹记令"就是指作为筹令之用的酒筹，其上刻有令辞，人们依令辞而定饮酒数量。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云："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用花枝作酒筹则是用来记数的筹。

筹令兴起于唐代，这不仅见于诗文记载，而且还出土了珍贵的酒筹实物足资佐证。1982 年，在江苏省丹徒县发现了一套盛唐时期的"论语玉烛"银涂金酒令用具，包括：令筹 50 枚，令旗一面，龟负筹筒一件。令筹呈韭菜叶形云头脚，每根酒令筹上，上段刻《论语》一句，中段是附会其义指出在座应饮酒的人，下段则是有关罚则的具体内容。比如，"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来迟处五分。"赴会不准的人，要罚五分（十分为一杯）酒。又如："出门如见大宾，劝主人五分"。意思是说主人盛情接待宾客，所以要劝主人饮酒。从令筹上的令辞知道，其玩法有四种：劝酒、罚酒、自饮、放过。参照历史文献上的记载，这套筹令的玩法是这样的：令官先饮令酒一杯，然后从筹筒中掣取筹令一枚，当众宣读令辞，依令辞规定让某位饮酒，某位饮酒后再掣筹，依令行酒，四座纷飞，轮流劝酒。

唐代酒令盛极一时，水平很高，难度很大，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这和唐代个人才智得到充分发展和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第六章

宋辽金元游艺

宋辽金元（960～1368）是我国古代游艺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古城市的厢坊制度，在宋代被冲垮了，代之出现了市、镇等多样的商贸场所。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东京梦华录》称北宋都城汴京“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因此，“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兴起了。市民阶层除物质生活的需求外，他们对娱乐文化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和提高。这有力地促进了市民游艺的空前繁荣，使游艺活动更加大众化、社会化。

宋元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勃兴，使游艺之风一改以往俭朴的习惯，而为一股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气所代替。宋代东京，人们“滥赏叠游，莫知厌足”，“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空前的游乐盛况，反映出重游玩的社会风貌和人们重娱乐的观念。元代的市民游艺仍然如旧。关汉卿在《女校尉》中介绍了市井闲人的消闲娱乐，“茶余饱饭邀故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这些被称为“市井帮闲”的人物，如《都城纪胜》中所说：“凡擎鹰、养鹌鹑、斗鸡、落生（射鸟）之类，并是本色。”这里的“并是本色”正表明市民阶层对游艺娱乐的发展曾作出过贡献。

市民游艺的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第一，游艺娱乐社团的普及发展。北宋汴京城里，就有踢蹴鞠的“圆社”，又称“齐云社”。南宋杭州则有“蹴鞠打球社”、“斗草社”、“棋会”等等。大凡是当时城市里流行的娱乐活动项目，都有相应的社团组织。这些游艺娱乐社团使游艺活动更加规范化，有利于游艺的发展和提高。第二，娱乐场所的大量出现。宋元时期，出现了以“瓦舍”为代表的娱乐场所。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舍内有以供人们观赏娱乐的艺术表演，如说唱、杂剧、讲史、杂技等。瓦舍外面则有各种娱乐设施，游人可以在“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又有斗鸡、蹴鞠等游艺活动。



元代钱选《宋太祖蹴鞠图》
上海博物馆藏

据文献记载：北宋汴京有瓦舍 50 余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杭州的瓦舍，城内外合计 17 处。

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迅速发展的又一高峰，以契丹、女真和蒙古族为主的民族游戏得到发展并传入中原，一部分民族游戏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游艺活动，如打髀骨、蒙古象棋等。与此同时，汉族的围棋、马球、蹴鞠等则很早就传入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深受少数民族的喜爱。

宋代在游艺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创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不少对古代游艺的总结之作，像《忘忧清乐集》、《打马图经》、《投壶新格》、《谱双》、《丸经》和《促织经》等。

宋辽金元时期游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马球、蹴鞠、棋类、玩具、禽戏等都有长足的进步，并产生出一些新的游艺项目，如：打马、七国象棋、蒙古象棋、鹿棋、打髀骨、捶丸等。

总之，宋辽金元时期，中国游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古代游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宋元文人弈趣

宋元时期的围棋，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表现在围棋活动更加大众化及围棋经验的整理和撰述上。在这两方面，宋元文人作出了许多的贡献。

宋元两朝的文人名士大多喜好下围棋。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朋友问他："为什么号六一呢?"欧阳修说："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朋友说："这是五一啊?"欧阳修说："加上我这一老翁，不正是六一吗!"六一之中有棋一局，表明欧阳修对围棋的喜爱。

《潜确类书》记载，一次，欧阳修与客人下棋，浮山高僧法远来访。欧阳修请法远以围棋为例，论讲佛法的道理。高僧用隐语说了一大堆，什么“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敌手知音，当机不让。”“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的话，欧阳修细细琢磨，深表佩服。

王安石的棋瘾也很大，但公事繁忙，不能下慢棋，所以爱下快棋，有“随手疾应”的习惯。北宋僧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老年闲居南京时，常与薛昂对弈。一次两人议定输者罚作梅花诗一首。第一局王安石输了，即吟《梅花》诗云：

华发寻香始见梅，一枝临路雪培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第二局薛昂输，却作不出诗，由王安石代作一首。其诗云：

野水荒山寂莫滨，芳条弄色最关春。

欲将明艳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后来有人作诗嘲讽薛昂道：

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座上赌新诗。

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

王安石有个门徒叫陈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平生酷爱下棋，当没有对手时，便一手拿黑棋，一手拿白棋，进行对弈。左手胜就以右手敬酒，右手胜就以左手敬酒，反正酒都是他一个人吃的，真所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宋代大画家黄庭坚也着迷围棋，他曾写信给侄儿说：

“时光宝贵，应该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处理公事，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书，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下棋饮酒，这样安排可谓是一寸光阴不虚度，满盘输赢是闲时”。

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位围棋爱好者，常与朋友在一起弈棋、吟诗和喝酒。他的诗篇中咏围棋者甚多。天刚亮，棋客就来了，“时拂楸枰约客棋”；棋下到黄昏，“暮窗留客算残棋”；读书累了，以围棋调剂精神，“对弈两奁飞黑白，雠书千卷杂朱黄”；吃酒要下棋，“扫空百局无棋敌，倒尽千钟是酒仙”；喝茶要下棋，“茶炉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陆游可谓是宋代文人中酷好围棋的代表。

南宋时，临安市民中弈棋极为普遍，并出现不少围棋高手。南宋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少年时，经常到临安街市上的棋摊看棋，向民间棋手请教，后来连胜当时临安第一棋手。

围棋在元代文人中仍然盛行不衰。关汉卿不仅是伟大的剧作家，也是个围棋迷，他在《不伏老》散曲中自我表白说：“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寥寥数语，把关汉卿对围棋等的酷好，写得淋漓尽致。无独有偶，元杂剧《百花亭》中的王焕，也矜夸自己的种种技艺：“围棋递相，打马投壶，撇兰攧竹，写字吟诗，蹴鞠打诨，作画分茶……”可见元代文人的习尚中，围棋无疑是当时最风流的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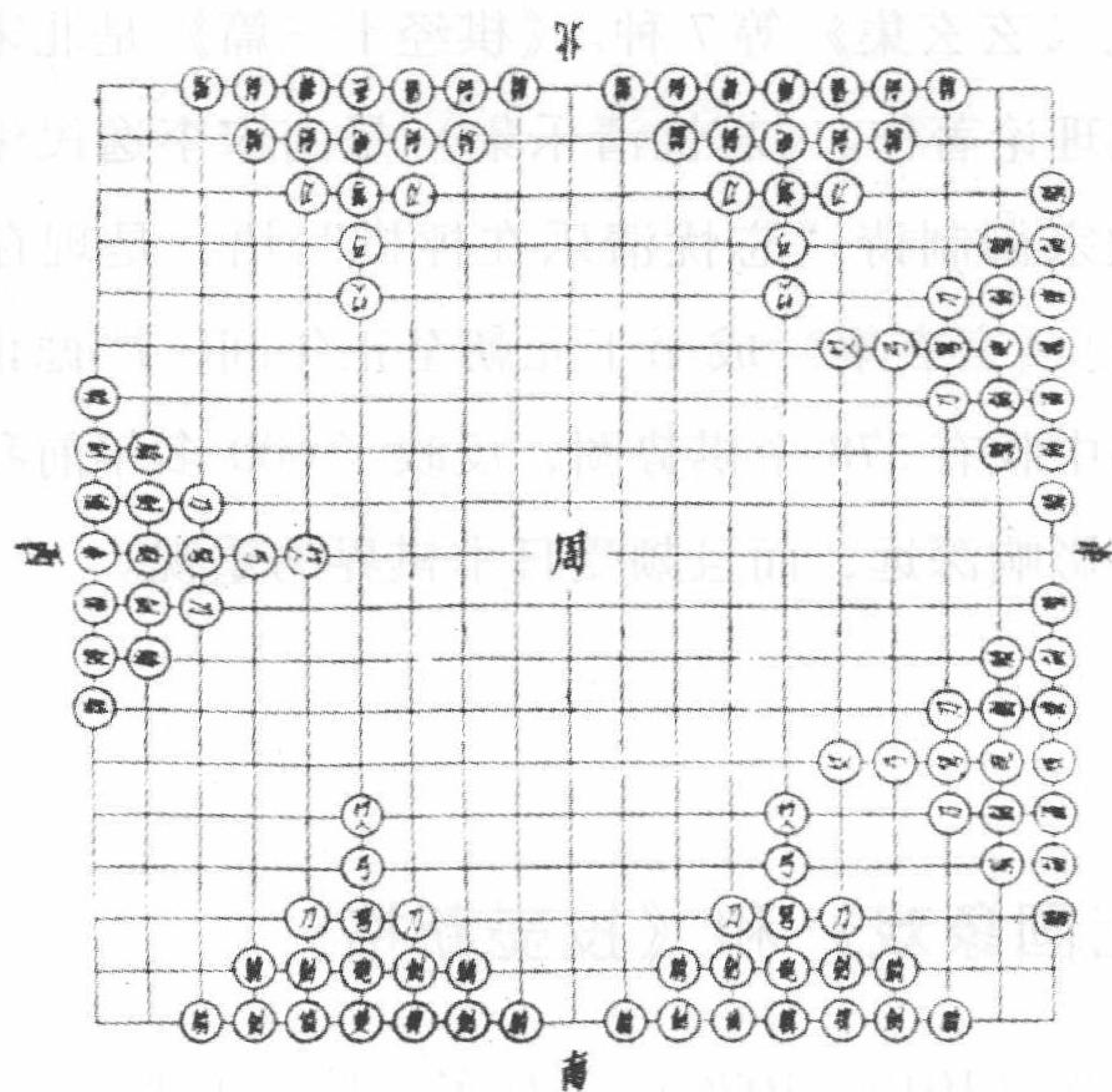
宋元两代是中国围棋著作大量出现的时代，这与当时文人学者的努力分不开。据史书记载，宋元时的棋书有20余种，然而，流传至今的棋书仅有《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玄玄集》等7种。《棋经十三篇》是北宋张靖撰写的围棋理论著作。《忘忧清乐集》是南宋李逸民编，书名出自宋徽宗御制诗“忘忧清乐在枰棋”语，是现存唯一的宋本棋谱。《玄玄集》成书于元朝至正年间，严德甫、晏天章辑。书中收有378个棋势图，反映了600多年前我国的棋艺水平，影响深远，而且颇受日本棋界的重视。

二 《七国象戏》和《投壶新格》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热心于对当时游艺的改革，先后著有《投壶新格》和《七国象戏》两部著作，促进了当时对游艺的改革。

所谓“七国象戏”是司马光根据民间流行的两人对局的象戏设计而成的。他自幼喜爱象戏，但是他又觉得两人对局的象戏不过瘾，于是异想天开，把棋盘扩大到纵横十九路，实际上就是利用围棋盘，制成7人一齐下棋的“七国象戏”。“七国象戏”每方各有17枚棋子，除齐、楚、燕、韩、赵、魏、秦7枚将棋外，每方还有一偏、一裨、一炮、二刀、四剑、四骑、一弓、一弩、一行人。七国象戏完全是模仿战国七雄争霸的形势进行交锋的游戏。7人下

棋，可相互联合，如历史所记载的，秦与一国联合叫“连横”；除秦以外的其他国家联合称“合纵”。七国象戏以吃掉对方将棋或俘获敌子 10 枚者作为胜利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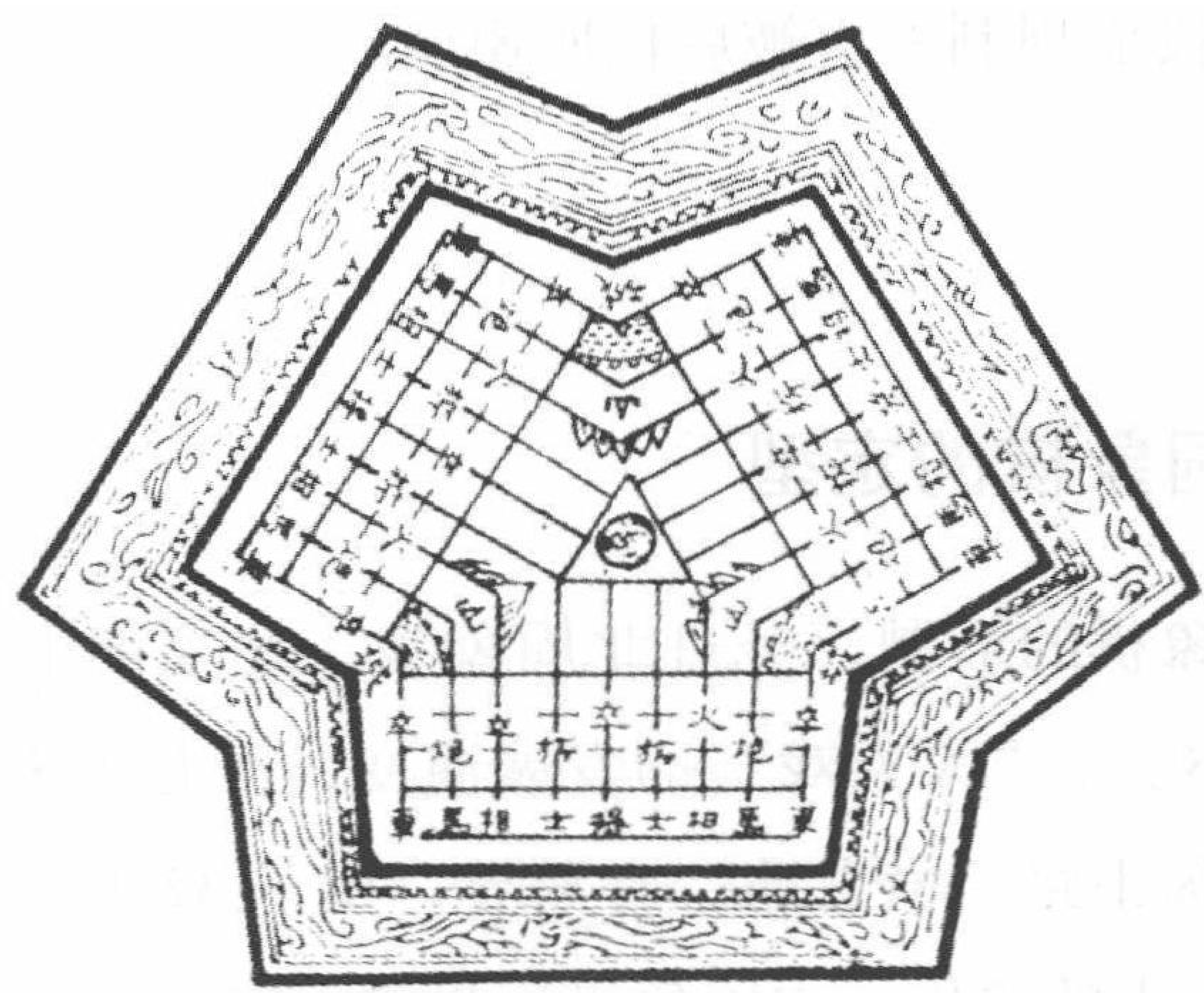


七国象棋图

这种七国象戏由于参加人数众多，往往会出现混战局面，然而又因为兵力互相牵制，下起来变幻无穷，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常在宴会中玩，作为劝酒助兴的玩意儿。

后来，这种被称为“司马温公七国象棋”的游戏传到朝鲜，随后又从朝鲜传到日本。日本古书上记载，在十一代将军德川家治时，朝鲜向江户幕府送去了七国象棋。德川家治非常感兴趣，随后在贵族富商间流行，成为一种供人游乐的玩意儿，并影响了日本的将棋。

宋代还有一种“三国象戏”。《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著作中，都注录了《三国图格》、《三象戏图》两部著作。由于原书已佚，详细玩法无法知道。清康熙年间，安徽有位学者郑晋德，人称破水先生，创制了一种同时可供三人相弈的“三友象棋”，并撰写了一部《三友棋谱》。三友象棋的棋盘由三张半幅的象棋盘围成一个三角形，棋子基本上同象棋子一样，只是“将”、“帅”分别换成了“魏”、“蜀”、“吴”，共48枚棋子，分成黑、白、红三色，每方认定一色。由于棋盘鼎足三分的局面，所以一国的棋子每走一步，会影响其他两国，棋局变化多彩，弈者乐趣倍增。如有一方的主棋——魏、蜀、吴被吃掉，就算输棋。很可能，“三友象棋”就是宋代的“三国象戏”。



三国象棋图

“七国象戏”和“三国象戏”对现行象棋的定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司马光对当时流行的投壶意见很大，认为当时的投壶玩法不合礼制，多为奇巧侥倖的投法。于是他对投壶进行符合封建礼教的改革，撰写了《投壶新格》，用以宣传封建道德，巩固封建秩序。此书对古代的投壶活动作了总结，对投壶的意义和规则作了详细的阐述。司马光认为投壶虽是一种游戏，但亦是圣人用来教育人们修身治心的礼，它可以“养志游神”，解决疲劳，并且可以“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此书对投壶的礼节、用具和规则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比如，第一箭投入壶中，名“有初”，作十算（计算每人投中数目的小棍）；最初投入壶耳，名叫“贯耳”，作十算；投箭倒入壶中者，名“倒中”，旧为一百二十筹，司马光认为不合礼议，改为无筹。……《投壶新格》中所载的投壶规制一直被后代所遵循。

三　中国象棋的定型

中国象棋的形制，经过北周象戏、北宋的七国象戏以及“广象戏”、“大象戏”的发展演变，至北宋末年逐步出现了棋盘纵十路，横九路，有河界，棋子32只，“将”在“九宫”之中的象棋，中国象棋逐步趋于定型。

宋人曹勋在记述北宋徽、钦二帝被金朝掳去情况的《北狩见闻录》中说：赵构的生母韦妃，曾用象棋子，外面包着黄罗，把康王（赵构当时是康王，后为宋高宗）字贴于将子

上，并焚香祈祷说："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主上必得天位。一掷，其将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可见，北宋末年象棋的形制，与现代象棋没有太大差别了。它不但有"将"，有"九宫"，而且一共有32枚棋子。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曾出土多批北宋时的象棋遗物。1972年江西安义县出土了一副宋代铜象棋，共32枚，有将、士、相、车、马、炮、卒。棋子正面铸有楷书阳文，背面铸有与阳文相应的各种象形图案，如："士"的背面是一名全身戎装的甲士，"卒"的背面是一名肩扛大斧的士兵。"炮"的背面则是一幅圆形石砲。从其同出的北宋"崇宁通宝"铜钱等判断，这副铜象棋的时间可能在北宋末年。

河南开封也出土过铜质象棋子，亦是北宋崇宁年间遗物。棋子大小不一，可能属于不同套的象棋残存。棋子有将、士、象、车、马、炮、卒等七种，也是有正反两面，一面为汉字，一面为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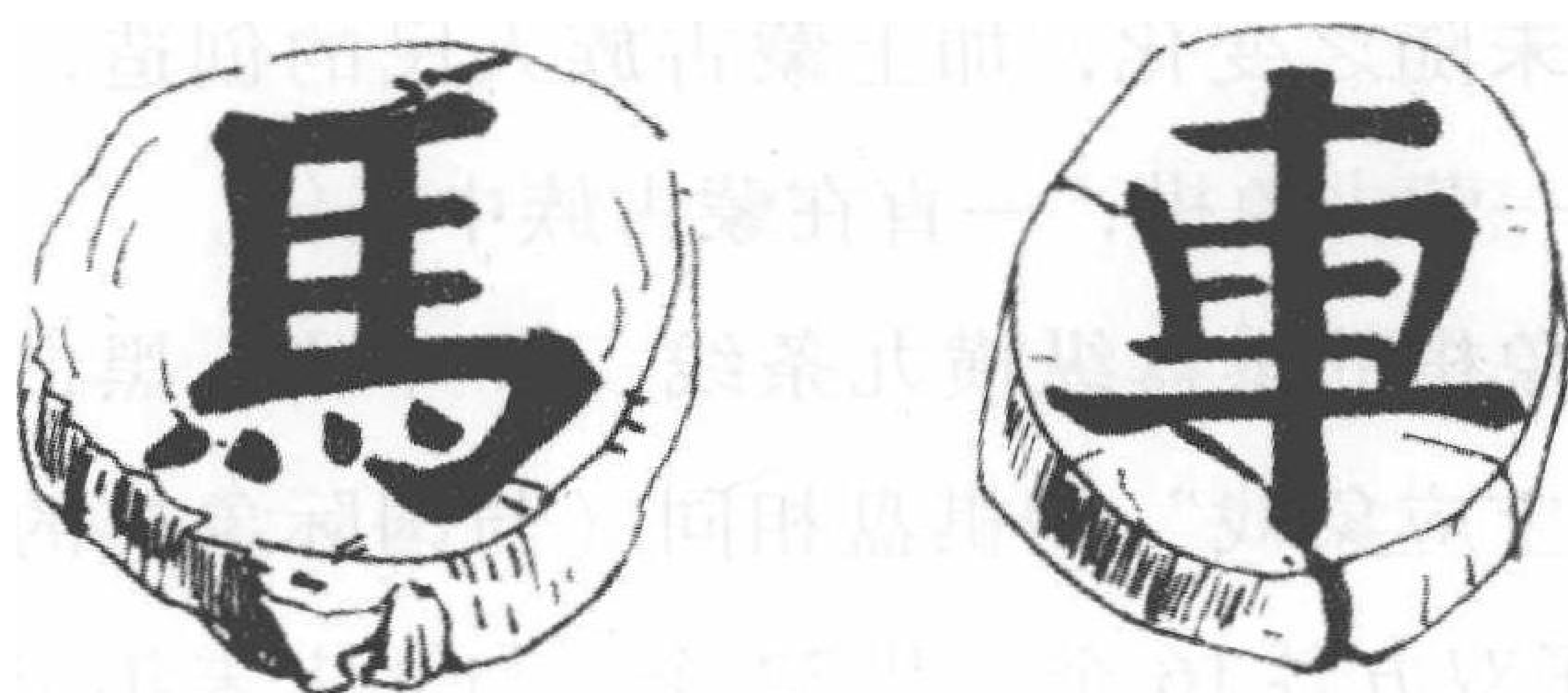
到南宋和元代，中国象棋进一步定型和发展，其艺术性和娱乐性都大大地加强，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欢。南宋的都城杭州出现专门制作象棋的手工业者。从《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中得知，当时杭州的商铺中都出售象棋子和象棋盘。象棋用具的普及说明象棋活动已经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元代象棋活动的普及程度绝不逊于前代。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有一幅象棋图：二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下象棋，二人旁立观看，另外有二人正趋求前来，形象极为生动。元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有一段话云："人人说道

好女婿，有财有宝又豪贵，又聪明，又伶俐，双六象棋通六艺。”说明元代市民喜好象棋的鲜明态度。

南宋及元代的象棋形制，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也有所反映。南宋诗人刘克庄对象棋颇为爱好，曾作一首有名的《象弈一首呈叶潜仲》长诗，为象棋史上难得的历史资料。诗中说道：“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戏，妙不出局外。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连营秉中权，四壁设坚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变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棋制与今已别无二致，如棋盘有界河、九宫（即“中权”），有棋子共32枚，各种棋子有不同的着法。宋人陈元靓编的《事林广记》中记载有“象棋子法”和“象棋十诀”等象棋理论，以及两个象棋局谱，这是现存最古的象棋口诀和棋谱。

南宋抗元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分喜欢下象棋。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文丞相嗜象弈，……暑日喜溪浴，与周子善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愈久愈乐，忘日早暮。”文天祥与周子善在水中不用棋盘口弈象棋，是我国象棋史上下盲棋的创始者。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后囚禁北京牢狱中，除了读书写诗外，仍然下象棋，可以说，象棋伴他一生。所以，他在《吟啸集》中说自己是嗜棋成癖的“棋淫”。

近年来，南宋及元代的象棋文物时有发现。1973年，在泉州湾的后渚港，发现一艘沉没的南宋古船。船中发现木制圆形象棋子20枚，有马、将、士、象、车、炮、兵等



木制南宋象棋子

11 枚，字迹不清者 9 枚。这些棋子分散在各舱中，说明当时船员和乘客普遍爱好象棋。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吉州窑等宋代窑址中，也发现过南宋瓷质象棋子和象棋印模。1985 年在吉林省农安县发现的金代窑藏中，出土一枚铜制象棋子，面铸楷书“卒”字。1956 年，在元大宁路故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出土铜质象棋子，共将、士、象、车、马、炮、卒七种，一面是图像，一面是文字。这说明定型后的中国象棋已在元初就传到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在蒙汉两族中流行，反映了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总之，中国象棋在北宋末年基本定型，到南宋和元代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　蒙古族的棋戏

在宋元之际，中国自唐代兴起的八八象棋经过一番变革，定型为现行的中国象棋，而在蒙古及我国边疆一带的

古象棋却未随之变化，加上蒙古族人民的创造，一种古老的象棋——蒙古象棋，一直在蒙古族中流传。

蒙古象棋的棋盘纵横九条线，64 个格，黑白相间，与唐代的“宝应象戏”的棋盘相同（与国际象棋的棋盘也相同）。棋子双方各 16 个，共 32 个，与北宋末年定型的中国象棋的棋子数相同。棋子名目是塔、车、马、炮、驼、卒。塔相当于汉族象棋的将帅，居中的右边，炮居中的左边。车、马、驼分列左右，卒横在最前面。棋子都放在方格之内，不在线上，而且都是立体的，雕刻成各种形状。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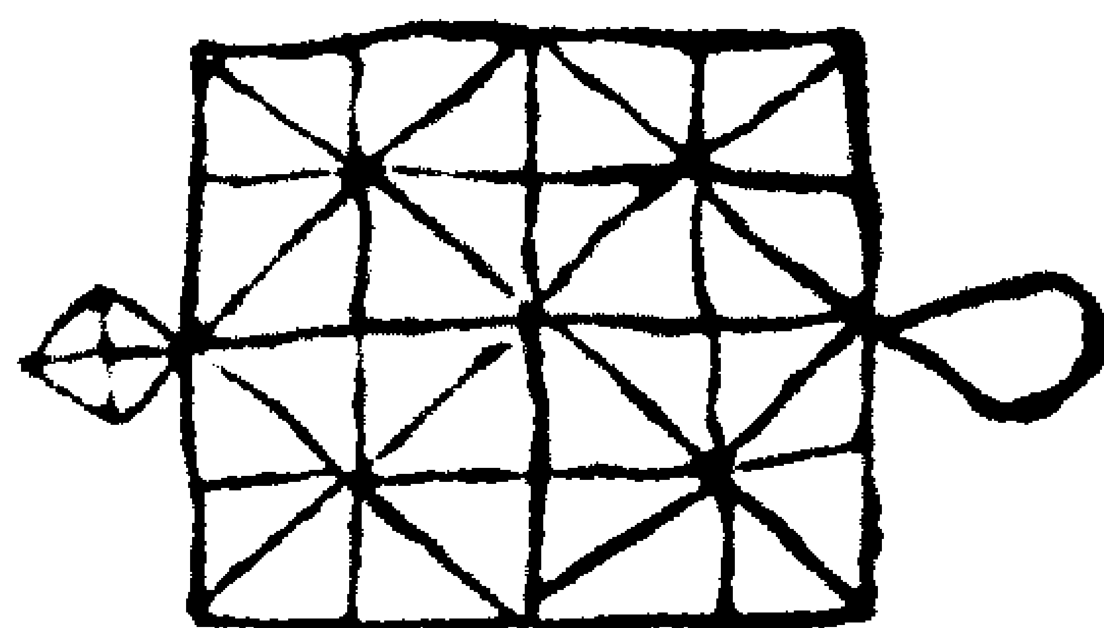
蒙古象棋

“塔”雕刻成蒙古王公形象，“车”为马拉棚车形，“卒”多刻成摔跤、奏乐、读书等侍从形象，“马”、“驼”则刻成各自的形象。我国的象棋子在唐代是立体的，到北宋中叶改变为平面。蒙古象棋则保持唐代象戏的旧制。

蒙古象棋的玩法也很有趣，马可以横行六格，驼可斜行，不限格，卒子直行，到底后可回头走，其作用相当于车。直到塔被吃，才算决出胜负。从蒙古象棋的形式上看，它是在汉族唐宋象棋基础上，蒙古族人民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它反映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蒙古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如今，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还可以看到牧民们围坐在一起进行对弈的场面。

在蒙古草原上，还广泛流传着一种叫做“鹿棋”的游艺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蒙古牧民称鹿棋为“鲍格因吉勒格”，而在杜尔伯特草原上，因其棋子用髀骨（嘎拉哈）做成，故又称其为“孛根吉拉嘎”。

鹿棋历史悠久。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阴山岩画中发现一幅鹿棋棋盘的凿刻画面，说明鹿棋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1948年至1949年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古都哈剌和林的窝阔台汗宫中，出土了一幅鹿棋棋盘，证明鹿棋是当时宫中的娱乐项目，距今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古鹿棋盘

目前流行的鹿棋棋盘呈方形，由6条经纬线和6条斜线交叉成25个点。在相对的两侧各有一座“山”（蒙古语称“乌拉”），一个成尖顶形，一个成平顶形，也有若干个点。棋子是两只“鹿”和24条“猎狗”。一方持鹿子，另一方持狗子。对弈之前，两枚鹿子分别置于棋盘的两端外线两山入口处，8枚狗子占据棋盘内线8处。

对弈开始，执鹿子的一方先走，跳过一只“狗”，这只“狗”就算被吃掉了。但遇到两只“狗”横在前面，“鹿”不能跳吃，只能向空白处移动。执“狗”子的一方每次可在棋盘上添放一子，设法造成两“狗”相连的局面，阻止“鹿”跳吃和移动。“鹿”尽量跳吃“狗”，“狗”尽量围困“鹿”。如果24枚“狗”子放完，“鹿”子仍然畅通无阻，

没有被困死，则鹿子方胜；如果狗子把鹿子赶到山上，不能再走，则狗子方为胜。

鹿棋充分体现了蒙古族草原围猎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鹿棋下法简捷，通俗易懂，又变化多端，饶有趣味，所以深受蒙古人民的喜爱。

五　李清照与《打马图经》

提到李清照，便会想起她那“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清丽凄凉的词句。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女作家。她多才多艺，不仅词、诗、文有很深的造诣，工书善画，精通音律，而且对博弈之类的游艺颇有研究。她在南宋绍兴四年（1134）写的《打马图经序》中说：“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她玩博戏着了迷，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她在序文中，对宋代博戏的发展状况做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游艺思想。她认为，游艺的最高境界，在于专心致志，只有贯通棋理，精心一艺，便可使自己的技艺达到极妙的地步。即所谓“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她举出一连串生动的事例来证明：庖丁解牛，莫不恰中节理，一会儿就把一只庞大的牛肢解完毕；郢人举起斧头，迅速把一个人鼻尖上的一抹白粉砍掉，而

鼻子毫无损伤；音乐家师旷辨音的能力特别强；离娄能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这些绝妙的技艺都是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结果。李清照认为，这一点上至学习圣人之道，下至博戏娱乐，莫不适用。正因为李清照具有对任何事情都专心致志的认真态度，所以她对中国古代博戏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

李清照对古代博戏下过一番整理工夫，搜集了许多博具，但“靖康之难”金军灭亡北宋，李清照随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逃到南方，“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李清照在《打马图经序》中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对宋代博戏的状况作了概述。她说：当时长行、叶子、博塞、弹棋等已失传，樗蒲、蹙融等已渐趋废绝，选仙图之类的游戏单纯靠运气，不能启发人的智慧。只有围棋、象戏最流行，但又仅供二人玩，也有缺陷。李清照认为，“打马”游戏简明有趣，可以几人一齐玩，是“博弈之上流，闺房之雅戏。”①

李清照十分推崇的“打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呢？据李清照根据民间打马活动整理编写的《打马图经》记载：宋代的打马游戏有三种，有一将十马的打马称作“关西马”；没有将，只有二十马的称作“依经马”。这两种打马游戏流行已经很久。到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有人把关西马和依经马相互结合，创制“宣和马”的玩法。“关西马”和“宣和马”因没有史料流传下来，现在我们已

① 李清照：《打马赋》，明陶宗仪《说郛》卷十九。

无法知道它的玩法，而“依经马”因为李清照的喜爱，将它的图谱、玩法记录下来，写成《打马图经》，才使我们可以了解依经马的玩法。李清照的《打马图经》实际上只是打马游戏中依经马的著作。

依经马所用的棋盘与象棋盘完全一样，四周绘有九个关隘，分别以地名和官署名来命名，如：“赤岸驿”（今陕西大荔县西南）、“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等都是地名，而“太仆寺”、“飞龙院”、“沙苑监”都是古代掌管养马的官署。关隘之间各有八站，分别以古代名马的名称来命名。玩的人用三枚骰子，按所掷点数之和行棋，行棋中可以走数步，可以倒退，还可以打掉别人的马。谁先将自己的20个棋子，闯过九道关隘，走到终点，便是胜利者。

打马所用的“马”，也就是棋子，十分奇特。富贵之家用犀角或象牙刻成，普通人家则用铜铸成。棋子大如铜钱，一面雕刻各种姿态的马图，一面刻有汗血、渥（wò）洼、赤骥、绿耳、渠黄等名马的名字，或刻有“千里之马”、“追风之马”等文字。史书上记载：西汉武帝时，从西域的大宛国得到一种良马——汗血马。相传它是天马的后代，可以一日千里。“渥洼”在今天的甘肃省安西县，是党河的支流。相传古时候，人们在这里得到一种神马，便称这种马为“渥洼”。“赤骥”、“绿耳”和“渠黄”，相传是周穆王的三匹良马，是有名的“八骏”之一。这些名马图所雕刻的骏马或奋蹄疾驰，或缓辔徐行，矫健骁悍，十分可爱，

宛如一幅幅精彩动人的骏马图。



打马钱图

打马游戏盛行于宋元两代。南宋诗人陆游曾有“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①] 的词句。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说当时杭州市井中有专卖“打马图”的商人。元代散曲中也提到这种游戏。《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第一折中，小二哥夸赞书生王焕：“此生世上聪明，今时独步，围棋、打马、投壶、蹴鞠，……九流三教事都通，八万四千门尽晓。”此外，在元代杨朝英编的《太平乐府》、明朝无名氏辑《盛世新声》等散曲集中也提到打马。

除了李清照的《打马图经》外，宋朝还有多种打马著作。如郑寅的《打马图式》、无名氏编的《打马格局》、谢景初的《打马格》和宋迪的《打马格》等。这说明在宋代，打马游戏十分流行，有不少人研究它并写成著作。可惜的是，除李清照的《打马图经》外，其他著作未能流传至今。

---

① 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九《乌夜啼》。

明朝以后，打马依然流行于南方。明末清初时的学者周亮工在《书影》一书中说：他的朋友杭州人陆骥武在福建重刻李清照的《打马图经》，并用犀象蜜蜡制作打马钱，一度在福建等地颇为流行。明朝皇宫中流行一种“走马”游戏，便是打马的变种。到清朝以后，打马便逐渐失传了。

六　宋徽宗的打球诗

公元1127年，金朝大将粘罕、斡离卜率兵攻陷汴梁，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灭亡了北宋。五月十九日，徽宗等人行到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后，金人邀徽宗入球场观打马球。粘罕让徽宗赋一首打球诗。徽宗勉强作诗云：“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诗句中隐约流露出一股哀怨之情。不久，金将斡离卜在途中打球为乐，岂料受寒生病而死。这个故事说明马球在金朝十分盛行。

金代的马球大多继承辽制，而辽代的马球又是由中原地区传去的。《辽史·穆宗本纪》记载：“汉遣使进球衣及马”。汉是指五代时建国在太原一带的北汉。景福二年(1032)，辽兴宗在延寿寺打马球，还诏宋朝的使者参观打球。

辽代统治者对马球活动非常喜好。在《辽史·游幸表》中记载打马球有15次之多，有时一年内多次。辽圣宗耶律

隆绪“击鞠无度”，屡次谏止，都无效果。谏议大夫马得臣，专门上奏章切谏，说：“今陛下以球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窃以为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一不宜。跃马挥杖，纵横驰骛，不顾上下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之礼，二不宜。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①] 这段话虽是反对打马球的言论，但从侧面说明马球在皇室及百官中的盛行程度。

《析津志》记载辽南京（今北京）的马球情况说：“击球者，今之典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雉尾缨络，萦缀镜铃，装饰如画，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②] 辽代马球所用的球是皮的，杖用藤的，与中原地区木制的球和球杖不同。1990 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辽墓中发现一幅《马球图》壁图。图上共有五位契丹人，正在手执球杖，骑马争夺飞起的红色马球，五人中有三个戴白帽，一个戴绿帽，另一个把头发盘系在头上，球门摆在两端。这幅打马球图弥补了辽代马球活动形象资料的空白，十分珍贵。

金代继承辽俗。《金史》上说：“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1983 年，在山西襄汾县曲里村一座金代墓葬

① 《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
② 《析津志》，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发现了四块马球雕砖，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金人头扎软巾，身著短袍，足蹬马靴，执杖击球的真实形象。这种马球雕砖为研究金代马球活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马球雕砖

到了元朝，马球仍然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活动。王结《文忠集》中说：当时“颇闻人家子弟，多有不遵先业，游荡好闲，或蹴鞠、击球；或射弹、粘雀。”可见，踢球、打球是民间的一种消闲娱乐。元大都是辽、金故都之地，也流行马球活动。《元宫词》中云“王孙公子值三春，火赤相随出内阖。射柳击球东苑里，流星骏马蹴红尘。”就是说王子公孙也参加马球活动。元初大将张弘范在《淮阳集》中有《击球》诗，“锦绣衣分上下明，画门双柱耸亭亭。半空彩杖翻残月，一点绯球并落星。”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打马球的情景。中国的马球活动，经辽、金、元三朝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发展，其风俗传至明朝，到清

初，马球就基本绝迹了。

七　中国古代的“高尔夫球”

在欧洲，人们认为高尔夫球最早起源于荷兰。在保存至今的一幅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荷兰古画中，画有二人持球，一人持杖击球的情景，这被认为是欧洲高尔夫球的最原始资料。然而，有趣的是在欧洲出现高尔夫球的二三百年前，中国也有一种用球杖击球，以将球击入球穴多少定胜负的捶丸之戏，可谓是中国古代的“高尔夫球”。

捶丸之戏盛行于宋金元明四朝，但它最早源于唐代的“步打球”。唐代帝王、贵族爱好马球，由于马的奔腾迅猛，往往发生摔伤事故，因而为了适应贵族妇女不善骑马的需要，出现了一种徒步持球杖打球的游戏方法，名叫“步打”。唐代诗人王建《宫词》诗中有：“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的诗句，说明这种用球杖击球的步打，在1000多年前的宫廷妇女中已经十分流行。

宋元之际，步打逐渐发展为捶丸之戏。宋代宫廷中常专门为皇室贵族举行捶丸活动，供他们游乐。捶丸活动也受到儿童的喜爱。宋代无名氏所绘《蕉阴击球图》绘有两个儿童各持小杖击球的生动形象。元代宁志斋老人所著《丸经》叙中也说：宋徽宗和金章宗都喜好捶丸。在山西洪

洞县水神庙明应王殿的壁画中，有一幅绘于元朝泰定元年（1324）的《捶丸图》。图上，在云气和树石之间的平地上，两位身穿红袍的男子，手持球杖，各据一方。左一人俯身作击球姿势，右一人侧蹲注视前方地上的球穴。稍远处有两个侍者各持球棒，全神贯注地观看双方捶丸。这幅壁画生动地反映出元代捶丸的真实情况。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一位以“宁志斋”为书斋名字的老人，总结过去和当时捶丸活动的方式和规则，著成了《丸经》一书。这本书共二卷，三十二章，详细记述了捶丸的场地、用具、活动人数、方式、裁判规则等。宁志斋老人认为捶丸有益健康，尤其是对终日坐读、筋骨不舒的知识分子，可以“养其血脉，以畅四肢”。从事捶丸活动，先要选择有凸、凹、坡、坎等地形富于变化的场地，掘好一定数目的球穴，然后按分班对抗、多人对抗或二人单打三种形式，确定活动方式。活动开始，在离球穴60至100步的地方，用鹰嘴状或橘瓣状球杖将球击入球穴。三杖内击入者得一筹，如有犯规者，则少计一筹或倒扣一筹，最后以得筹多少定胜负。《丸经》是中国捶丸活动的唯一专著，因此显得十分珍贵。

捶丸之戏，在明代的较大城市中仍很常见。明朝人周履靖在重印《丸经》跋中说：他年轻时游历全国城镇，看见许多人都玩捶丸。明宣宗朱瞻基亦爱好捶丸之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明宣宗行乐图》长卷，其中一段，描绘朱瞻基亲自下场捶丸的情景，为明代的捶丸活动留下

了直观性的记载。明人杜堇所绘《仕女图》中亦有描绘几个妇女在林中玩捶丸的画面，说明在明代不仅皇帝参加捶丸活动，而且一般妇女也喜好捶丸之戏。

及至清代，捶丸之戏在中国急剧衰落，甚至绝迹。这恐怕与清初严禁百姓进行各种习武健身活动有关。

中国的捶丸与近世欧洲所流行的高尔夫球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有球穴，都用带有弯头的球杖，以击入球穴多少定胜负等。但是，欧洲高尔夫球的出现要比中国的捶丸晚二三百年左右，其间的因缘关系一直是个谜。近世的汉学家们，根据大量史料认为由于蒙古帝国军队的大举西侵，使欧亚交通洞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捶丸之戏便被来往东西方之间的人带到了欧洲，逐渐在荷兰、英格兰等国传开，并对以后出现的高尔夫球产生影响。这不仅表明中国的捶丸是现代高尔夫球的始祖之一，而且也说明世界文化是世界人民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共同产物。

八　婴戏图中的童戏

儿童题材的绘画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直到如今，各大博物馆中收藏着许多被人们称之为“婴戏图”的儿童题材绘画。婴戏图，顾名思义，就是表现儿童游戏活动的绘画作品。婴戏图，用图画的形式清晰地展示了古代盛行的各种游戏，释清了不少文字叙述上的疑惑，成为研究古代

儿童游戏的珍贵资料。

宋代是“婴戏图”的鼎盛时期，画家之多，作品之多，取材之广，技巧之高，都为历代所不能比拟。如善画人物的画家田景绘有《童子弈棋图》，画二个童子下围棋，“一则乘胜而矜夸，一则败北而悔沮”，形象栩栩如生。宋代佚名画家的《斗蟋蟀图》流传至今。画面上三个孩子在作斗蟋蟀前的准备，一个提着蟋蟀笼子在察看蟋蟀的动静；一个侧着耳朵在继续寻找草丛中蟋蟀鸣叫的方位；另一个伏在地上等候着，似乎是斗蟋蟀的评判者。南宋大画家马远所画《蟋蟀图》既不描绘捉蟋蟀，也不画斗蟋蟀，而只画一堵高墙和一个孩童，孩童手提笼子，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墙壁上，认真地寻找着，这可谓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小庭戏婴图》也是宋代佚名作品中的精彩之作。画中有四个男孩在花园里游戏，两个孩子为一件玩具争执起来，另一个孩子为他们劝解，刻画了孩子们的“童心”。

当时民间的家用器物，如屏风、瓷枕等上也多画有婴戏图。《邵氏闻见录》记载：张升在朋友家，见一个枕屏上绘有一幅小儿迷藏图，于是题诗于上云：“遂令高卧人，敧枕看儿戏。”目前传世的宋代彩绘瓷枕上，有不少图案画的儿童游戏。陈万里先生著《陶枕》一书中，收录宋磁州窑蹴鞠图陶枕，枕面中心描绘了一位少女倒背双手，聚精会神，步态轻盈地在玩蹴鞠。1954 年，河北邢台也出土一件相类似的孩儿蹴鞠图白瓷枕。《陶枕》一书中还收录一件宋板球图陶枕，枕上画一个小儿，手持一带柄板的东西，在

作击球游戏。球板的形状很特别，如同一把张开的扇股，下部连结在柄上，可以一仰一俯地打球。这种球戏在文献中还未见到任何记载，人们习惯上称它为“板球”。



宋代孩儿蹴鞠图瓷枕



宋代板球图陶枕

在宋代众多的画家中，苏汉臣是最擅长画儿童的画家之一。苏汉臣是河南开封人，生卒年不详，曾任北宋宣和与南宋绍兴画院中的待诏。他所画的婴戏图多达近百幅，其中《长春百子图》、《秋庭婴戏图》、《冬日婴戏图》、《婴

儿斗蟋蟀图》、《水戏图》、《货郎担图》等堪称是婴戏图中的精品。台湾故宫博物馆藏苏汉臣《长春百子图》，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100个儿童陶醉于荡秋千、骑木马、下棋、捉鸟、钓鱼、划船、采荷、扑蝶、斗蟋蟀、踢球、捉迷藏、耍刀枪、玩傀儡、歌舞等游戏的情景。画面上户外庭院，四季景色分明，孩童尽兴玩耍，呈现欢欣祥和气氛。

《秋庭婴戏图》和《冬日婴戏图》是苏汉臣婴戏图中的代表作。前者画两个儿童在花园内桌上，全神贯注地玩“推枣磨”游戏。背景有芙蓉和雏菊争艳，暗示秋季。另有一圆凳上摆满了刚刚玩过的许多玩具。“推枣磨”是指用竹签穿挂枣子，平衡、旋转的游戏。《冬日婴戏图》则画两个儿童，在花园里逗着一只小猫玩耍。男孩拿着一根美丽的孔雀毛拖在地上，女孩手持一面绣花的小锦旗来回摇摆，小花猫则随着他们手中小旗、羽毛的摆动左右跳跃，孩子们和小猫其乐融融，毫无寒意。

苏汉臣的作品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婴儿斗蟋蟀图》表现了四个小男孩聚精会神地蹲着斗蟋蟀的神态。后人说：“桂树菊花，石栏外婴孺四，蹲踞斗蟋蟀，天机烂漫。”《水戏图》再现了宫廷教坊中女童演出的情景，易恒题诗曰：“水戏新番小妓精，教坊初进未知名。立机倒运飞丸起，绝胜银盘弄化生。”《捕鱼图》描绘的是儿童戏水捕鱼的活动，陈弈禧有诗云：“十岁婴儿妙入神，水边游戏任天真。翻嫌点尔童心减，冠者何须五六人。”苏汉臣还擅长画货郎图。

货郎是宋代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产品，货郎所卖的东西多是妇女用品和儿童玩具，故每到一处他们都深受那里妇女和儿童们的欢迎。明代著名书画收藏家汪砢玉曾藏有苏汉臣的一幅《货郎担图》。《珊瑚网》一书记述道：图中除货郎外，还有“二婴儿斗促织，三孺子放风筝。”虽然这些作品今天有的已经看不到了，但凭借这些记载，我们仍可窥见这些婴戏图中所反映的丰富多彩的宋代儿童游戏。

九　闲时节打髀殖

在元代，中原地区的汉族儿童通常喜欢玩秋千、斗蟋蟀、踢球和下棋，而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儿童在玩什么游戏呢？由于史料的缺乏，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我们从元代杂剧中发现了元代流行的一种儿童游戏，名叫“打髀（bì）殖”。

关汉卿《哭存孝》杂剧第一折《后庭花》曲说：“他饿时节挝肉吃，渴时节喝酪水，闲时节打髀殖，醉时节歪唱起。”意思是说：饿的时候就抓肉吃，渴的时候就喝酪水，空闲的时候就玩打髀殖，醉的时候就胡乱唱歌。

李寿卿《伍员吹箫》杂剧第一折也说：“他也是个好汉，常在教场中和小的们打髀殖要子。”

郑德辉《三战吕布》杂剧第一折说：“某正在某处与小厮每打髀殖。”

从这些元杂剧中看出，“打髀殖”是人们闲暇时所进行的一种游戏，而且参加的人大多是儿童。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游戏呢？

打髀殖，又叫“击髀石”。《元史·太祖本纪》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出行路过一座山下，看见几个牧童放着几百匹马。他们正在“击髀石为戏”。可见，“打髀殖”的游戏起源很早，是蒙古草原上流行的习俗。元人撰写的《契丹国志》上说：宋真宗时，晁迥出使契丹回来对真宗说，契丹国人喜欢用铜或石打野兔，髀骨就是打兔所用的工具，是“以狍鹿之骨角或灌铜而成也”。这说明打髀殖在辽代已经存在，起源于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狩猎活动。

髀石既是一种狩猎用具，又是儿童们的游戏用具。一枚好的髀石是很珍贵的，可以作为礼物互相馈赠。《元朝秘史》中记载：铁木真 11 岁时与结义兄弟札木合，在斡难河冰上打髀石，札木合将一个狍子髀石送给铁木真，铁木真则将一个铜灌的髀石回赠给札木合，表示两人亲如兄弟。从这条材料来看，“髀殖”（或髀石）是用某些动物如狍、鹿、羊等的蹄腕骨制成的。《元秘史李注补正》卷三，解释道：“蹄腕之骨而莹泽如玉，故名曰髀石耳。”有时候要在髀殖里灌入铜锡，大约是为了增加它的重量。

髀殖或髀石是汉语，蒙古语称它们为“石阿”或“失阿”；称“打髀殖的”为“石阿勒札灰”，蒙古语的“髀石”即羊、獐、鹿等动物的蹄腕骨，有时叫“羊拐子”或“背式骨”。用髀石做游戏反映蒙古族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

打髀殖的玩法是如何进行呢？据清代杨宾《柳边纪略》四记载，是先把髀殖堆放在地上，再击之，击中者，尽取所堆。《蒙古吉林风土记》记载：“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为戏，视其偃仰横侧为胜负，小者以髀，大者如鹿，莹泽如玉。儿童妇女，围座摊掷以相乐，以薄圆击之，则曰‘怕格’。又有较远之戏，趋冰上，以中为胜，名曰‘撒罕’。”可见，打髀殖的玩法至少有三种：一是以髀石的伏仰横侧的变化来决定胜负；二是将髀石堆在一起，用薄圆形的物品来击打髀石，以击中多少来决定获得髀石多少，取得髀石最多的一方获胜。这种玩法用于短距离，名叫“怕格”；三是在冰上举行的击髀石，方法与“怕格”相近。这种游戏活动名叫“撒罕”。第一种玩法发展成为后世的“抓子儿”；而第二、三种玩法则类似中原地区流行的“击壤”游戏。

需要说明的是，在金朝的女真族中，同样盛行这种游戏，女真语称作“嘎拉哈”。“嘎拉哈”和辽元两代流行的“打髀殖”对后世的同类游戏产生了深刻影响。直到现在，玩羊拐子的儿童游戏依然流行不衰，受到少年儿童们的喜爱。

十 “我识南屏金鲫鱼”

自晋朝，红、黄色的金鲫鱼被人们发现之后，经过500多年，到宋朝时，鲫鱼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产生灰白、

赤、黄、白身红鳍等颜色的金鱼。佛教寺院放生池中的金鱼已经走向民间，从神奇之物变成供人玩赏的娱乐品。

六和塔，无人不晓，它几乎是杭州城的标志。不过你也许不知道，六和塔与金鱼还很有些缘分。

北宋初年，诗人苏舜钦（1008～1048）曾游访六和塔所在的开化寺，听僧人讲寺内的金鱼池中有数条色彩艳丽的五色金鱼。苏舜钦十分高兴，他伏在桥栏上等啊、等啊！足足等了一天，金鱼却深伏水底不肯露面，最后苏舜钦也未见到美丽的金鱼。他十分遗憾，临别前写下了“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的诗句。据说这是关于宋代杭州金鱼的最早记载。

几十年后，宋代学者孔平仲重游六和塔，十分幸运，观赏到了这些“害羞”的金鱼。他在《游六和寺》诗中写到：“金鱼在何处，演样戏平绿。鳞鬣老愈黄，点漆作双目。忆得儿童时，尝踞此池旁。闻人说金鱼，已谓百岁强。”金黄色的金鱼遨游在绿水之中，想起儿童时候，常蹲在池旁，听老人讲金鱼的故事，据说已经有100多年了。可见，六和塔下的金鱼已有悠久的历史了。

1121年（宣和三年），浙江方腊起义，在争夺杭州的战争中，六和塔被焚毁。民间传说，金鱼池里的金鱼并未遭此横祸，而是从池中流进钱塘江中，游到远方的大海里去了。所以，后人称六和塔下的小山叫“渡鱼山”。

开化寺内的金鲫鱼虽然惨遭战火之患，今天已看不到了，但是位于杭州仙姑山北的玉泉寺内，却还可以看到宋

代已享有盛名的金鱼。玉泉寺原名清涟寺，相传开创于南齐建元年间（479～482），因寺内有一股清碧如玉的泉水，又名玉泉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了金鱼生活的天堂。宋朝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讲到玉泉寺的金鱼："青芝坞玉泉池中盛有大者，且水清泉涌，巨鱼游泳堪爱。"游客坐在池上的亭廊间，品着寺僧待客的香茶，观赏着百余尾金鱼，衔尾而游，忽东忽西，上下纵跃，怡然自乐。难怪后人题有："鱼乐人亦乐，泉清心共清"的楹联。

宋熙宗时，大文学家苏轼任杭州通判。他来到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兴教寺，看到了金鱼池中遨游的金鱼，不禁写下"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① 的诗句。

南屏山兴教寺中的金鲫鱼，在苏轼题诗之前就已名闻杭州城。当时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池，有鲫鱼十余尾，皆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饵为戏。"苏东坡题诗后，兴教寺金鲫鱼更名噪一时，上至达官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慕名来观。

绍兴八年（1138）杭州成为南宋都城之后，民间追求奢侈玩乐风气的兴盛，使得金鱼更加成为人们玩赏的宠物。

宋高宗赵构，是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他置中原被金国占据而不顾，甘心做金国的侄皇帝，终日过着极为荒淫的生活。他是个玩家，琴、棋、书、画、踢球、放鸽子、养金鱼等等，几乎无所不玩。1162 年，他做了太上皇，住在

---

① 苏轼：《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德寿宫。他在德寿宫中修建了一个金鱼池，广十余亩，名叫“泻碧”。赵构命人从杭州以及离杭州200里外的德化县征求金鱼，充实到泻碧池中。红、白、黄、花斑等各色金鱼成群结队，在荷花丛中遨游，令人赏心悦目。赵构经常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下，站在泻碧池旁，投饵戏鱼，寻欢作乐。

在皇帝的影响下，南宋的达官贵人养金鱼成风，争先恐后地凿池蓄玩。有时，一尾名贵金鱼，相互抬价争购，花费白银百两。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前往四川上任，竟专门用三只大船装满西湖水，把家养的金鱼运往四川，为使金鱼在四川和路途中的平安无事，他还带去杭州的养鱼行家，随船照料。[①]可见当时官宦之家对养金鱼的嗜好。

为了适应人们玩赏金鱼的需要，民间的金鱼养殖业也应运而生。市场上有各色金鱼、鱼虫、养鱼用具出售。城西钱塘门外有专门饲养出售金鱼的人家，人称“鱼儿活”。[②]这时，金鱼已经作为商品，成为人们可以买卖的玩物。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将伯颜率军入杭州，封府库，收史馆、秘阁图书、宫中衮冕（皇帝礼服）、宝玩、辇乘等物，运往大都（今北京），并派人将德寿宫等处的金鱼连同池水，一齐运往大都，成为元朝统治者的玩物了。在

① 岳珂：《桯史》卷十二，第14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第1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此之前，金朝在灭北宋时，也曾将汴梁宫廷中的金鱼运往北京。至此，北京开始有了金鱼，到明清两代发展成为北方金鱼饲养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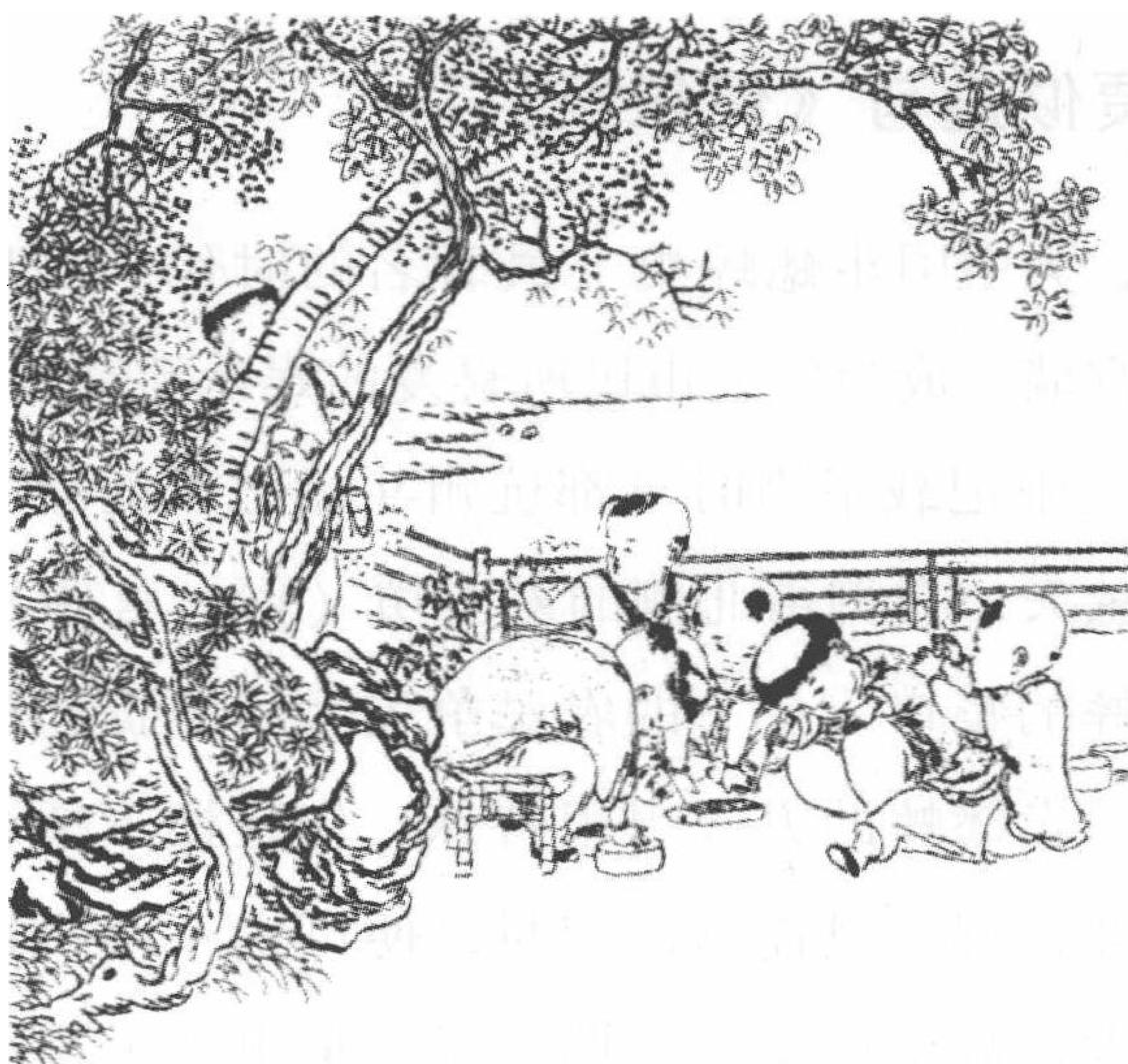
十一　贾似道与《促织经》

南宋，为中国斗蟋蟀史上最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经走出宫墙，成为广大市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了当时京都杭州斗蟋之风的盛况。书中说：每到秋天，在御街北侧的寿安坊（俗名官巷）就有专门买卖蟋蟀的集市。乡下的农民争先恐后地捉蟋蟀，拿到这里来卖。卖蟋蟀的方式也很特殊，先是摆下擂台，让蟋蟀相互争斗，哪一只连赢两三只，便可卖一两贯钱，如果蟋蟀个头大，甚至可卖到一两银子。集市天天都有，直到十月底，天寒才罢休。当时，杭州市民养蟋蟀成风。他们养斗蟋蟀的用具很讲究，有捉蟋蟀时用的过笼、罩子，养斗蟋蟀用的各式笼子、草秆等，光是笼子就有银丝笼、金漆笼、黑退光笼、瓦盆竹笼、板笼等许多品种。[①]

当时，斗蟋蟀尤其受到儿童们的喜爱。南宋诗人张镃（1153～?）有一首《满庭芳·促织儿》词，回忆自己少年时，提着灯笼，蹑脚轻声捉蟋蟀，在花堂之上斗蟋蟀的情

① 《南宋古迹考》（外四种），第10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景。词中写到："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携向华堂戏斗，亭台小，笼巧妆金。……"当时的画家也常以儿童斗蟋蟀为题，像马远画有《蟋蟀图》、苏汉臣有《婴儿斗蟋蟀图》，迄今，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还收藏一幅南宋时的作品《儿童斗蟋图》。



《儿童斗蟋图》

斗蟋蟀是人们喜爱的娱乐活动，可是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却超出了娱乐的范围，成了相互夸耀财富的工具。南宋词人姜夔（1163～1203）曾作有《咏蟋蟀调寄齐天乐》词，序中说，当时的富贵官宦之家，为了买一只能斗的蟋蟀，竟花钱二三十万，还要郑重其事地把它养在象牙镂刻成的楼观里。这真是富家一只蟋蟀，可抵百姓十年粮啊！

南宋时，不仅官宦百姓，甚至僧人亦好斗蟋。相传，

"鞋儿破，帽儿破"的活佛济公曾养过一头"一根须短，一根须长"的蟋蟀，因它勇猛善斗，便将它比做五代名将王彦章，称之为"王铁枪"。蟋蟀死后，济公非常伤心，专门写了一首《瘗促织·鹧鸪天》词。词中寓以禅理，幽默诙谐。词曰：

促织儿，王彦章，一根须短一根长；只因全胜三十六，人总呼为"王铁枪"。休烦恼，莫悲伤，世间万物有无常；昨夜忽值严霜降，恰似南柯梦一场。①

更有趣的是，传说，当济公把王铁枪葬入波光粼粼的西湖水中时，一阵清风吹过，现出一个青衣童子，合手当胸，说自己是王铁枪的化身，现已超升成仙，特来感谢师傅的点化。这美妙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蟋蟀归宿的良好祝愿。

蟋蟀死了，人们为它伤感，作文祭悼，爱好蟋蟀的人卒后，也抛不开蟋蟀，甚至把蟋蟀用具作为随葬品，大概是想在阴间继续玩蟋蟀吧。1966 年 5 月，镇江市一座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三个蟋蟀过笼，两个呈腰长形，长 7 厘米，两头有洞，是斗蟋蟀时用的。一个为长方形，上面有花纹，一头有洞，是捕捉蟋蟀时用的。这三个蟋蟀过笼正是当时养斗蟋蟀盛况的佐证。

葛坞旧为师相宅，半闲堂外断人行。

蟋蟀斗余军务了，不应更说救樊城。

① 贾似道：《促织经》卷上。

这是清代诗人沈德潜的《西湖嬉春绝句》诗，讽刺南宋贾似道在元兵入侵、襄樊危急的时候，不顾军务，不解襄樊之围，躲在半闲堂里斗蟋蟀的昏庸。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浙江台州天台县人。自小放荡不羁，爱好赌博。但因他的父亲是当时抗金名将贾涉，加上他的妹妹做了宋理宗的贵妃，所以，他靠着裙带关系，青云直上，到宋度宗时，竟被封为太师；当上掌管国家大权的平章军国重事。这位平章大人，酷爱斗蟋蟀。当宋元交兵之际，蒙古军大举南下，围困襄阳（今湖北襄樊）数年，形势十万火急，而这位平章大人却隐匿军报，成天在他私邸的"半闲堂"里，与姬妾踞地斗蟋蟀。他的幕僚戏之曰："这也是军国重事吗！"他听了竟毫无所动。朝廷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南宋王朝的覆灭。贾似道也因骄奢淫逸、玩物误国，落个千古骂名。后来，人们讽刺他，送他一个绰号叫"蟋蟀平章"。

贾似道虽然因斗蟋误国，为后人所不齿，但是他对养斗蟋蟀很有研究，又善于总结唐代以来民间斗蟋蟀的经验，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蟋蟀的专著《促织经》。这部著作对研究斗蟋史和中国昆虫学很有价值。

《促织经》的原本今已不传，我们见到的是经明朝人周履靖增补的本子。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6万字，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斗、论病、决胜七类，每类又分子目，体例完整，蔚为大观。他在书中介绍了数十种蟋蟀的形态、颜色，作了比喻性的命名，认为蟋蟀的优劣与栖息

地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出于荒山野地的蟋蟀最佳。好的蟋蟀要具备“四像”：“钳像蜈蚣钳，嘴像狮子嘴，头像蜻蜓头，脚像蚱蜢脚。”从颜色上也可鉴别蟋蟀的好坏，大体是“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他根据民间的经验，提出了优质蟋蟀的五种类型，称作“五绝”。比如：红头青颈，翅金色的蟋蟀为一绝。紫色，青项浓厚，紫翅又带皱纹的蟋蟀也是一绝。

贾似道还在书中论述了蟋蟀争斗时的规则、饲养方法和疾病的防治，总结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有关蟋蟀繁殖方法的论述，更是前无古人。《促织经》不仅首次系统科学地总结了有关蟋蟀的遴选、决斗、饲养等方面的经验，为研究古代昆虫学、游艺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而且开后代蟋蟀研究的先河。明清以后所编写的众多蟋蟀著作，在体例、内容上无不受到这部《促织经》的影响。

十二　分茶游戏

北宋宣和二年（1120）12月癸巳，自称“通百艺”的宋徽宗赵佶，在汴梁延福宫与亲王侍臣们饮宴游乐，时而观赏歌舞百戏，时而投壶对弈。一时，徽宗玩兴大发，命近侍取来茶具，亲自碾茶，用沸水注汤，经他用茶筅（xiǎn）慢慢地搅动，过了一会儿，茶碗中茶汤之上浮动着白色的乳沫，在碧绿清澈的茶汤衬托下，好似显现出疏

星朗月，群山起伏的图景。[1] 宋徽宗玩的这种游戏，名叫“分茶”，又叫“茶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饮茶游戏。它主要流行于宋代的文人、僧侣中，是当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消遣娱乐活动。

分茶游戏大约开始出现于北宋初年。北宋初年人陶谷在《荈茗录》中谈到当时的“茶百戏”，书中说：“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成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茶百戏确是十分神奇，简单的茶汤，经游戏者的搅动，汤面上竟会出现禽兽、虫鱼、花草之类的图像，而且细腻工巧，宛如精心描绘的花鸟画。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

原来，宋代时的饮茶方式与现在不同。当时，人们多把茶叶制成团茶、饼茶，称为“龙团”、“凤饼”。饮茶时，将团茶碾碎，添加一些香料，然后稍加一定量的水，调成浓膏状，最后提瓶将沸水注入茶盏内，同时用工具在盏中搅动，边注水边搅动，让水与茶彼此交融，泡沫泛起。所以，古代人饮茶很讲究茶汤的颜色，以纯白如乳为最好。这与现今用散茶冲泡的饮茶方式不一样。

由于宋朝时饮茶讲究注水、搅动的效果，所以，一些饮茶高手便可以令汤面上的汤花幻化成各种形象，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饮茶时的游戏活动。

---

① 蔡京：《延福宫曲宴记》。

《康熙金乡县志》记载：宋朝时，山东金乡县有位名叫福全的和尚，精通分茶之戏，人称有“通神之艺”。他能注汤于茶盏中，幻出一句诗，如果用四个碗，可成一首绝句。至于变幻花草鱼虫之类，唾手可得。因此常有施主上门求教。福全很是得意，曾自吟道：“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陆羽，字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夸耀自己的“分茶”技艺，可与茶神陆羽相比。

分茶在宋代玩得很普遍，宋人诗词中吟咏“分茶”的颇多。王之道有《西江月·和董令升燕宴分茶》词，陈与义也有《与周绍祖分茶》诗。大诗人杨万里（1127～1206）写有一首有名的《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诗，生动地描绘了他在澹庵先生（胡铨，字澹庵）家观看和尚显上人分茶的情景。诗中写到：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

……①

意思是说，分茶与煎茶一样的好，煎茶却没有分茶那样巧妙。显上人是精通茶艺的高手，在隆兴年间（1163～1164）的元旦为我们显示分茶技艺。茶水相遇，在名贵的兔毫盏中变幻出奇奇怪怪的形象来，有如碧空白云，或寒

① 《宋诗钞》第3册，第2 047页。

江倒影。……和尚显上人玩分茶的高超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南宋大诗人陆游嗜好饮茶，写过200余首茶诗，后人给予“续茶经”的美誉，他也常玩分茶自遣。他在《临安春雨初霁》诗中写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把“戏分茶”与“闲作草”，也就是与草书艺术相提并论。宋词人向子湮有《浣溪沙》一首，说有位赵总持“能著棋、写字、分茶、弹琴”。把分茶与琴、棋、书等技艺并列，说明分茶当时深受人们喜爱。

分茶是宋朝人创造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娱乐游戏，表明中国饮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惜的是，分茶这朵游艺奇葩在宋代以后就逐渐失传了。

第七章

明清游艺

明清两代（1368～1840，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古代游艺的定型和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的游艺，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代游艺仍然呈现繁盛的景象。明朝中期以后，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市民阶层日益壮大。这些都促进了明代娱乐游艺活动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打破了僵化凝固的封建社会秩序，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明代社会上享乐游艺之风盛行。当时“人无贵贱，多衣绮绣，意气相诡，华形相鲜。……若夫行乐公子，闲身少年，斗鸡走马，吹竹鸣丝，连手醉欢。”[1] 明人黄佐《泰泉乡礼》中说：当时人“嬉笑无度，及意在侵侮。或驰马击鞠，与虽不赌财者，而铺牌演戏，弈棋双陆，玩弄骨董，雅好弹唱，广收花石，猎养禽鸟，作诸无益者。”可见，蹴鞠、马球、纸牌、弈棋、双陆、养禽鸟等是明代人喜爱的游艺活动。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中国古代的游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二阶段，清代是中国古代游艺的衰落时期。清王朝是少数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入关后，注重本民族的

---

① 张燮：《清漳风俗考》。

游艺活动，提倡骑射、滑冰等活动，使这些活动出现了兴盛的景况。然而清政权对其他游艺活动则不重视，因而使中国许多传统游艺项目，如蹴鞠、马球、捶丸、投壶、双陆、打马等处于停滞和衰退的状态，有的甚至濒于湮没的境地，只有一些与人们日常娱乐生活较为密切的活动，如围棋、象棋、风筝、斗蟋蟀等还相承不衰。到1840年以后，西方的近代游艺开始传入中国，这又加速了古代游艺的衰落，中国游艺从此进入近代发展的阶段。

明清两代游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上承数千年中国古代游艺的传统，到明清时期呈现出“定型”的特点。第二，中国古代的许多游艺项目，如球类、博戏类已经衰落。第三，程朱理学的发展，限制了游艺的自由发展，束缚了妇女从事娱乐游艺的自由。第四，西方近代游艺活动开始传入我国。

一　从《宣宗行乐图》见明代宫廷游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宣宗行乐图》卷，描绘的是明代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在宫中行乐的情景。此图卷高36.8厘米，长688.5厘米。没有作者款印，应该是当时供奉内廷的不知名画家所作。全图细致而真实地描绘了明宫廷内，皇帝与近臣进行射箭、蹴鞠、马球、捶丸、投壶等游艺活动的情景，是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表现明代宫廷

游艺的形象资料。

全图共分六段。第一段描绘的是朱瞻基坐于亭内，观看射箭。数人持弓于亭前，一人正举箭欲射。

第二段描绘的是蹴鞠的场面。宣宗照例坐亭内，观看亭前数人蹴鞠为乐。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加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曾严令禁止军人踢球、下棋。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踢球）的卸脚。"但在宫廷中，踢球、下棋等仍然盛行。朱元璋的重孙宣宗朱瞻基就非常喜欢蹴鞠。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中记载："太监王敏，本汉府军余，善蹴鞠。宣庙爱之而阉之。"宣宗因喜欢善于蹴鞠的王敏，竟"阉为内侍"，可见宫廷盛行蹴鞠的程度。明武宗朱厚照也是一个喜欢踢球的皇帝，他建造了"豹房"，和亲信的宦官一道踢球娱乐，连"大盗"张茂也能"出入豹房，侍上蹴鞠"。踢球也是宫女的娱乐活动。明末诗人王誉昌所写的《崇祯宫词》中有："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便是描写宫女踢球的情景。

画面的第三段和第二段联系较为紧密，表现的是打马球的场面。朱瞻基双手扶膝坐在椅子上，神情专注。球场上，一人乘马举旗向前奔跑，后面一人挥舞球杖驰向球门，身后数骑持杖等待上阵。二骑间有一球门，长方形，下部有一椭圆形洞孔，如将球打入洞中，则获胜。最有趣的是球门上画有表现打球过程的图画，六骑奔驰，挥杖击球。

明成祖注重击球、射柳的活动，并纳入礼志中。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朱棣曾在永乐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分别三次亲临东苑观看群臣击球、射柳。

马球比赛的情景是很壮观的。“万马骞腾鼓吹喧，五云缭绕旌旗展。”“枞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乐人间无。”[①] 观看马球比赛是一种娱乐，而且是“人间无”的娱乐。明代的马球球门和规则与辽金旧制相近。球门为一立板，下开一孔为门。球门只有一尺直径大小。所以王绂诗中说：“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游戏方法是“分击球官为两朋”。规定第一个球必须由皇帝击进。

第四段描绘的是打捶丸的场面。朱瞻基亲自下场，手持球杆立于场中，挥杆击球。面前是两株树梢纽结的松树，架成一座球门。球门两侧有长方形球场，共有 10 个球窝，窝旁立有彩旗。宣宗及侍从手中所持的球杆，前部弯曲，类似现今高尔夫球杆。图中所绘的场地面貌，旗、窝及击丸的球杆，侍从的位置，都与元宁志老人的《丸经》相吻合，说明明代的捶丸活动是依照《丸经》规则进行的。捶丸在明代社会上也十分盛行。周履靖在《丸经》的题跋中说，他年轻时，走过许多大小城市，看到不少的青年在玩捶丸。周履靖认为捶丸是一种“收放心，怡神情，动荡血脉，畅其四肢”的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明代杜堇画的《仕女图》中，也有捶丸场面。图中三个仕女捶丸，两个女

① 王绂：《端午观骑射击球侍宴》诗。

侍捧杆，庭院幽静，亭台豪华，表明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家庭。



仕女捶丸图（局部）

第五段画的是投壶。朱瞻基坐于亭前，右手持矢欲投，前置一壶，三支贯入壶中，三支散落地上，数名太监侍奉左右。投壶在明宫廷中十分流行。明代皇帝经常到西苑的万春亭，与后妃诸臣投壶取乐。《明宫词》有诗云：“上苑春回草树芳，殿前玉女侍东王。骁壶博得天为笑，遮莫人间见电光。”在民间，投壶以花样难度的投法为上乘。《金瓶梅》小说中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投壶，就有过桥翎花、二乔观书、杨妃春睡、乌龙入洞等花样投法。沈榜在《宛署杂记》中写“投壶绝”，也是以投新花样而受人赞扬的。说明，作为娱乐活动的投壶，在明代社会中的主流是创新和加大难度。

第六段画的是朱瞻基乘六人肩舆在群侍的簇拥下，起驾回宫。

《宣宗行乐图》的画法严整工细，具有很强的装饰趣味。它真实地记录了明代宫廷游艺活动的情景，为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表现明代宫廷游艺活动的形象资料，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二　由盛至衰的蹴鞠活动

蹴鞠活动是明代各种球戏活动中最为流行的一种，除了宫廷内盛行外，在民间也是消闲娱乐的重要内容。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当时“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京城王昺、张懋忠等人“蹴鞠俱精绝。”嘉靖名士李开先，因为得罪了阁臣严嵩，被罢职回家，闲暇无事，便以作曲、下棋、蹴鞠消磨时光。明末人南生鲁在浙江当观察使，闲暇时“会两少年蹴鞠戏”。吴梅村曾写诗说：“我笑此翁何太奇，弹琴蹴鞠皆能为。”① 明王圻《三才图会》中有一幅



明板画《蹴鞠图》

① 《吴梅村诗集》。

三人踢球的蹴鞠图，蹴鞠者都是长袍阔袖、髯须飘拂的文人学士貌样，说明蹴鞠深受士大夫们的喜爱。

在下层社会，蹴鞠开展得更为广泛。沈榜在《宛署杂记》记载：显灵宫道士郭从敬“时以踢球自娱，久之惯熟，遂为一时绝技。或自弄一球，能使球沿身前后上下，经日飞动不坠；或兼应数球，能随诸敌人缓急轻重，应接不谬。”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明代画家杜堇的《仕女图》中，有妇女踢球的画面，画面上没有球门，是一种三人踢球的玩法。明末诗人李渔写有一首描写民间女子蹴鞠的七律诗颇为生动逼真。诗云：

蹴鞠当场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

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

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曳起露金莲。

几回踢去娇无语，恨煞长安美少年。

诗中把两位对踢的民间女子的装束、情态、动作，描写得栩栩如生，令人有呼之欲出之感，可以作为《仕女图》很好的补充和说明。

被誉为16世纪社会生活风俗画的小说《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与嫖客、妓女踢球的情景，以及当时专门侍奉别人踢球的“圆社”情况。这说明在当时的下层社会中，踢球是一种普通的娱乐活动。

明代还有儿童蹴鞠活动。明代瓷器上多绘有儿童蹴鞠图。一个明初的五彩靶碗上和一个明宣德青花瓷镇上画有三人场的儿童蹴鞠图，而一个正德青花瓷碗和一个崇祯年

的残碗上则画有二人场的儿童蹴鞠图。图画中的儿童动作活泼异常，栩栩如生。

从明代蹴鞠的整个发展情况看，内容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它是以不设球门的蹴鞠活动为主，无双球门竞赛的活动。因此蹴鞠的衰落到清代便显露出来。

满族入关后，清廷提倡满族的传统游艺，而对其他则不重视，因此清代球类活动进一步衰亡。宫廷中极少进行蹴鞠一类的娱乐活动，仅在民间偶有所见。

《聊斋志异》中描写善良的狐女小翠与王府公子玩耍时，只见小翠“刺步作圆，踢蹴为笑，着小皮靴，蹴去数十步，给公子奔拾之。”这里提到的“圆”即是球，乃是用皮革做成的，小翠踢球时专门换上“小皮靴”，说明清初女子蹴鞠时尚有专门的运动鞋。清康熙年间，北京白云观每逢燕九节（正月十九），都有蹴鞠会。清人袁启旭刻的《燕九雅集》中有：“笙歌队里击球社，球箱丛中走马场”“如蚁游人拦不住，纷纷挤过蹴球场”的诗句。在清代的瓷器上也多有儿童蹴鞠图。但到清中叶以后，这种蹴鞠史料便很少了，说明我国古代传统的蹴鞠已完全衰落了。

三　珍贵的明清游艺文物

明清两代距今仅700多年，故而当时丰富多彩的游艺实物得以流传至今。这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些游艺文物中了解

明清两代繁盛而多彩的游艺活动，因而是十分珍贵的。

（一）围棋

明代宫廷围棋相当盛行。明代的帝王从太祖朱元璋到崇祯帝朱由检大多会下围棋。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个明代的棋牌桌。该桌为长方形，通体黑漆，三连桌面用活榫衔接，可以折叠。中间桌面上有一活心板，板背绘有黄地黑线的围棋盘。棋盘对角旋有两个圆口棋盒，内装料制棋子一副。盘下壁内抽屉里又放有“麻将”及各种纸牌。此桌设计巧妙，做工精良，既是一件难得的珍贵明宫家具，又是当时宫中游艺活动的实用见证。

清代帝王、后妃也大都喜欢围棋，以示风雅。故宫博物院珍藏一套反映乾隆时代宫中嫔妃生活的牙雕组画——《月曼清游图》册。该册共 12 开，分别描绘嫔妃们一年 12 个月中的节令活动，其中第二开中绘有 6 个女子下围棋的场面。清高宗弘历题有这样的诗句：“胭脂匀缀小桃枝，别苑春和二月时。镜户团圞清画永，楸枰斜倚共敲棋。”这说明清代围棋活动在嫔妃中仍是盛行的。

晚清的慈禧太后也好下围棋。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慈禧对弈图》。图中慈禧端坐在雕花的绣凳之上；旁置华美的紫檀木方桌。其上摆有精致棋具：木胎朱髹漆棋盒，黑白两色晶莹润泽玉制棋子。慈禧右手拈着棋子，正准备落子。桌旁立一陪弈的太监，很像李莲英的长相。该图画得很精细，是慈禧下围棋的真实写照。

故宫中的一些殿堂庭院中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当年清宫围棋的实物。如养心殿后殿内炕桌上陈设着一副精致的棋具。木胎髹漆的棋盒，青、白玉石制成的围棋子，是当时帝王的常用之物。建福宫花园中还有刻有围棋盘的石桌。故宫图书馆内还保存着不少清宫收藏的围棋古谱。可以想见清代宫廷围棋盛行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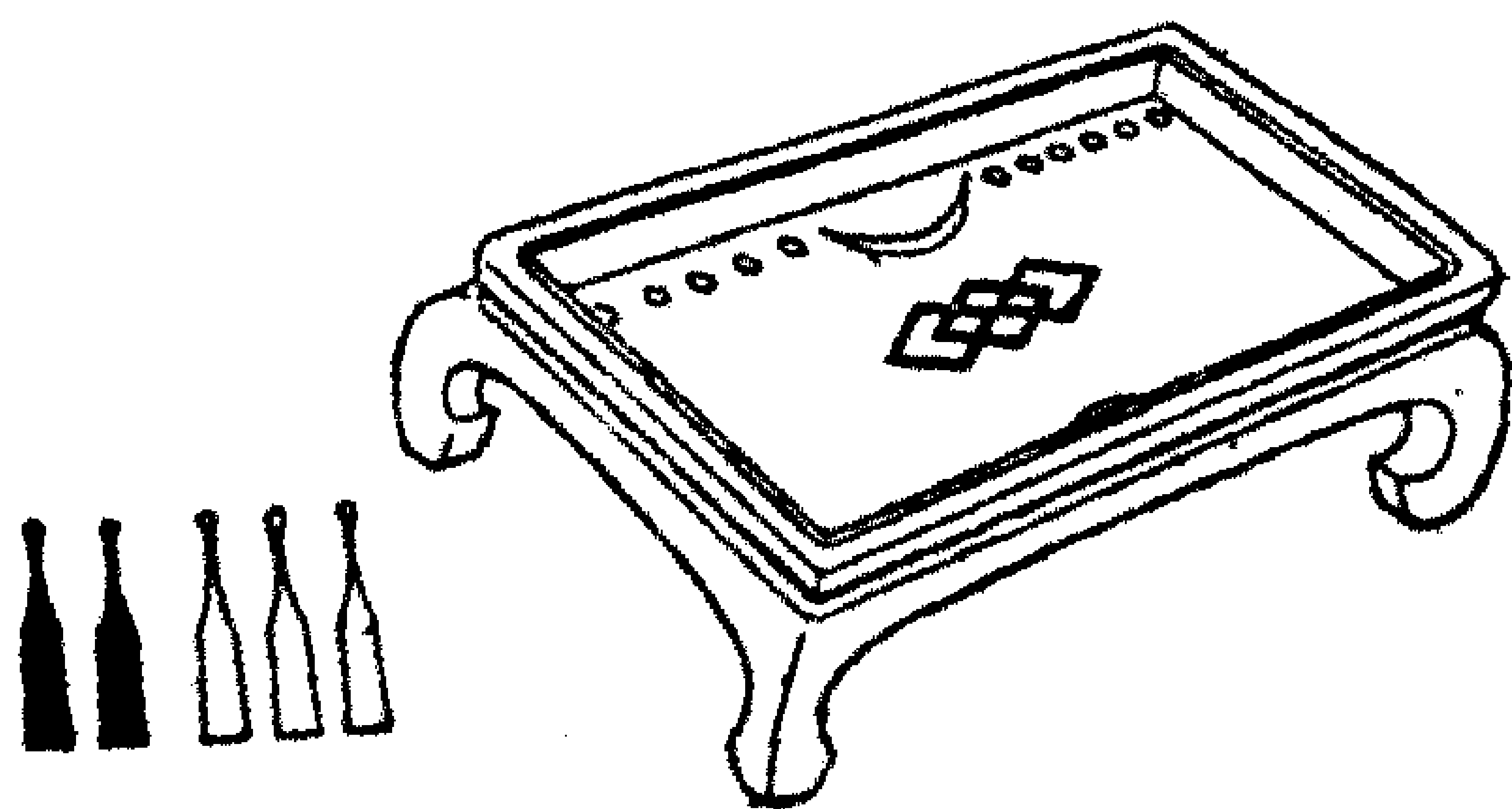
清代《慈禧对弈图》
故宫博物院藏

在明清墓葬中，也时常有围棋文物出土。1970 年，在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的墓葬中出土一副围棋。出土围棋子 356 枚，黑子 175 枚、白子 181 枚，为料制。棋子分别装在木胎黑漆的圆棋盒里，盒上画金色勾连雷纹。棋盘为四折硬纸，四周裱以纸边。这副围棋造价低廉，便于携带、存放，很可能是朱檀生前常用之物。

1985 年，在山西运城地区明代万历年间兵部尚书刘敏宽父母合葬墓中出土黑色围棋子三枚。棋子是涂釉陶瓷。现存河东博物馆。近几年，在江苏、浙江、北京、河北等的明清墓葬中也有围棋文物出土，棋子有料制的，有陶瓷制的，也有玉石制的。这反映了当时围棋活动的普及程度。

（二）双陆

在明代，双陆是与围棋并盛的棋类活动，清代则主要流行于宫廷中。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多套明清时期的双陆棋具。明代木制双陆局，用紫檀木制成小炕几式。盘面为长方形，四框两旁装楠木长方屉。双陆局面用螺钿镶嵌成局，正中为月牙城，两侧各 6 点，共 12 路（亦称梁）。双陆子共黑、黄两色，黑子用紫檀木制成，黄子用黄杨木制成；黑子 15 枚，黄子 12 枚（缺 3 枚）。双陆子形状相似捣衣槌。此外，故宫还藏有明代的素面象牙双陆子、染牙彩绘缠枝宝相花双陆子、珐瑯双陆子和青、白玉双陆子。



明清时期的双陆局和双陆子

清代的双陆文物保存最好，其中以乾隆年间制的双陆棋具最为精致。全套双陆棋具，由玉质双陆子 30 枚、骰子五粒、一套牛角质叶子牌、20 根乌木筹、8 根方形牙筹棍、12 根扁圆筹棍、39 根黄杨木筹棍、4 根牙牌、20 根细牙筹棍、镇纸、珐瑯小碗各一个组成。这些东西装在一个长 13 厘米、宽 10.4 厘米、高 2.5 厘米的紫檀木盒中。这套双陆

棋具堪称稀世之宝，只是可惜双陆棋盘不知何时丢失了，确是一件憾事。

这些双陆文物反映明清宫廷盛行双陆游戏的情况，也说明到清末，这种游戏已逐渐不被人重视了，许多棋具变得残缺不全了。

（三）投壶

1986年在四川绵阳市的一处明代窖藏中发现一件铜质投壶。直口，口旁置二贯耳，长颈呈六棱柱形，鼓腹也呈六棱形，壶高42厘米。这个窖藏文物十分丰富，有瓷制的罐、碗、杆、钵、盒、盘、瓶，以及紫砂壶、锡壶、酒壶、温酒灶等。据此推测这些遗物是茶馆酒肆的成套用具，说明当时酒肆茶馆中把投壶作为一种游戏的项目。

明清宫廷也盛行投壶，但其投壶方法则与民间的纯娱乐性质迥然不同，他们总是借投壶来提倡尊卑揖让的封建礼仪。今北京中山公园（明清时社稷坛）内有“投壶亭”，为明清两代帝王在此投壶演礼的地方。现今公园内还保存着6只明清时代的铜质投壶。故宫博物院也藏有4只投壶，都是清乾隆年间所制。其中有三只壶为双耳，一只壶带四个耳。其中一只壶中铸有乾隆帝御题投壶诗：“宾主雍容欢既洽，降升揖让节堪论。”反映了乾隆帝提倡投壶的目的。

投壶所用的矢，故宫博物院藏有彩漆竹矢和木矢两种。两种矢的矢柄都削成鸭嘴型，占全矢长度的五分之一。彩

漆竹矢做工最精细，式样也考究，柄上饰描金漆海棠花纹，矢头呈圆状，头上缠麻丝约1厘米高，防止矢头破裂。每副矢12支。这些精致的投壶和矢是研究明清投壶活动的珍贵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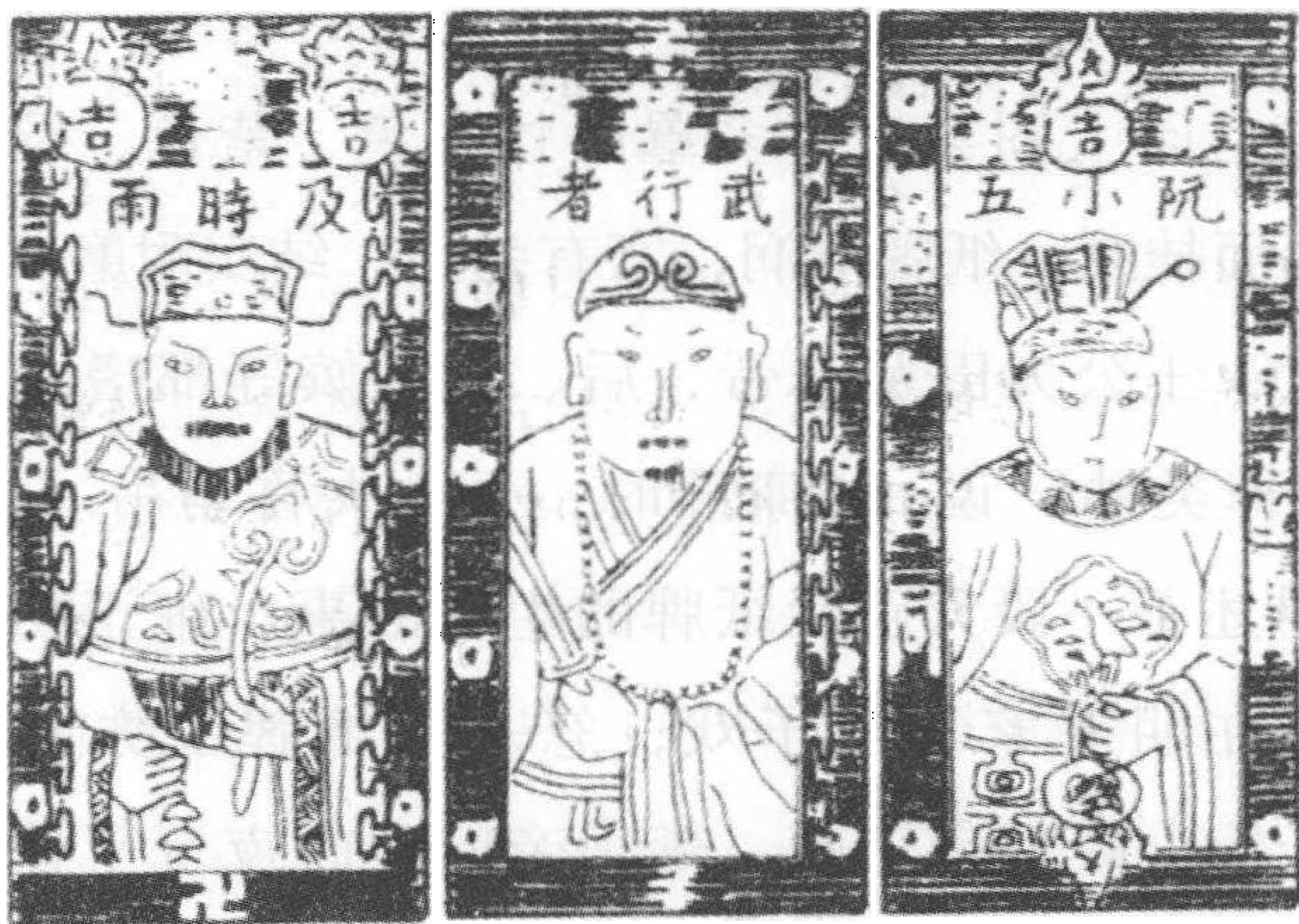
流传至今的明清游艺文物还有许多种类，比如纸牌、骰子、升官图、蒙古象棋、蟋蟀罐、风筝和儿童玩具等等，难于详尽，我们在下面讲到有关内容时还将有所涉及。

四　从马吊牌到扑克牌

纸牌是中国传统的游艺活动之一。玩纸牌是一种锻炼人体智能的游艺，可提高人的思维和判断力，是人们劳作之余及茶余饭后最好的消遣活动。所以纸牌自唐代产生之后，历千百年来久盛不衰，深得人们的青睐。

明代，在唐宋叶子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马吊戏。马吊，又写成“马掉”。据说是因为打马掉牌时，必须四人共玩，分为四垒，各自为战，若缺一人就像马失掉一足一样，不可行，所以又名之“马掉脚”。马掉牌与叶子戏二者有相似之处，均为纸制，玩法也大同小异。明人对此游戏的喜爱程度远胜过前代，他们不仅亲自参加，许多文人更写有著作加以总结研究，如潘之恒的《叶子谱》、冯梦龙的《马吊牌经》等。

清代斗纸牌的游戏愈演愈烈，玩纸牌成风，达到无以



明代的马吊牌

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纸牌的种类也愈加纷繁，除马吊牌外，又出现了斗虎、麻雀牌等新品种，其玩法也多种多样。后来“麻雀”牌与象牙制成的宣和牌相结合，衍变为盛行至今的“麻将牌”。麻雀戏最初为纸质，后才变为用木、骨、象牙等材料，纸制麻将现今仍有流行。

现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名目繁多、质地优良、形制精巧的纸牌，主要是清宫造辦所制作的。主要有两种。一种的图形为“老千”、“白花”、“红花”，以及“幺万”至“九万”，“幺饼”至“九饼”，“幺条”至“九条”。每种图形 4 张，共计 120 张。另一种为《三国》、《水浒》人物，30 个人物各有 4 张，亦是共 120 张。每张牌呈长方形，长 9.3 厘米、宽 2.3 厘米，黑边、白地，中绘人物像。这些人物神态各异，形象生动。纸牌上、下方绘有各种符号，分别代表万万贯、千万贯等各种纸牌术语。有的纸牌上还写

有宋江、武松、呼延灼、阮小五等人物的名字。这种纸牌用料极精，印上图案后，多罩以竹皮色、紫色、绿色、黄色等，两面挂胶。纸牌滑润，富有弹性，结实耐磨。

清代，王公大臣及其帝、后、妃、嫔等都嗜好纸牌游艺。《清稗类钞》说："康熙时，士大夫喜马吊。"《啸亭杂录》讲述了一段大臣玩纸牌的生动故事。雍正初年，大臣王云锦在朋友家玩叶子戏，忽一张纸牌丢失了。第二天，王云锦上殿见雍正帝。雍正帝问他昨夜玩了什么？王如实回答。雍正帝笑道："不欺圣上，真是状元出身的人呀！"从袖中取出丢失的那张牌。原来是雍正派人监视大臣活动，从王云锦处偷来的。从中可见雍正朝特务活动的厉害。清后期，"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善麻雀为自豪。"慈禧等后妃也颇好玩麻雀牌。奕劻常派两女入侍，带数千金与慈禧玩麻将，可是，奕劻只能输不能赢。

中国纸牌曾在元明之际流传到国外，对欧洲发明扑克牌产生了影响。到清代，54 张的扑克牌则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和喜爱。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数副从欧洲传入的扑克牌，十分珍贵。这些扑克和现行的扑克相差无几，只是尺寸略小，长 6.7 厘米、宽 3.5 厘米，也分红桃、方块、梅花、黑桃四种，每种 13 张。扑克上的主图案为西洋少女的半身彩色油画肖像、军人肖像、土著人肖像等三种。该扑克造型精美，做工考究，是难得的游艺佳品。

扑克的背面注有英文“德国印制”的字样。[①]

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纸牌和扑克牌清晰地显示了明清两代由盛行中国传统纸牌到出现近代西方扑克牌的发展过程，既使我们搞清了扑克牌的传播途径，又为我们提供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

五 “天花喷礴，烟焰蔽天”——烟火

用作标题的这两句话是明朝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述鲁王府燃放烟火的情景，形容烟火如喷薄而出的天上之花，五彩缤纷，烟雾弥漫，遮蔽了天日。在我国，燃放烟火是一种古老的习惯，是人们欢度重要节日必不可少的娱乐喜庆活动。

烟火，具体发明于何时，一下子很难说清楚，但起码在宋朝就已经有了。据《西湖志余》记载，宋孝宗淳熙十二年的元宵节，皇宫里共燃放了百余架烟火，孝宗乘小轿亲自到宣德门观看。淳熙十二年是公元1185年，即南宋初年。在距今800多年前，宫中一次放烟火就有百余架，可以想见当时放烟火已经相当普遍。元代大学者赵孟頫在一首赠给烟火艺人的诗中写道：“人间巧艺夺天工，炼药燃灯清昼间。柳絮飞残铺地白，桃花落尽满阶红。”描绘了燃放烟

① 曹连明：《闲话纸牌》，见《紫禁城》1990年第3期。

火时，亮如白昼，爆花满地，万紫千红的逼真情景。

明清两代，燃放烟火的风气更加盛行，烟火的花色品种更为繁多，其技艺也日益精巧。明朝皇宫里从年前腊月二十四起，至新年正月十七止，每天晚上都要在乾清宫前燃放烟火，供皇帝和后妃们观赏。明代的烟火种类很多。《帝京景物略》说：当时的烟火，“有声者，曰响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不响不起，旋转地上者，曰地老鼠。筑打有虚实，分量有多寡，因而有花草人物等形者，曰花儿。名几百种。其别以泥函者，曰砂碗子，以纸函者，曰花筒，以筐函者，曰花盆。总之曰烟火云。”明代的烟火大都制成盒子状，所以又称放烟火为“放盒子”。有的盒子多至五层，能旋放出绶带鸟、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美丽的图案。施放起烟火，硝烟弥漫，光影五色，甚至连星月也看不清了。明朝人瞿佑《烟火戏》诗中有“天花无数月中来，五色祥云绕绛台”之句，说的是无数烟花从天而降，好似从月亮中来的一样，五色的烟雾像云朵一样降落在台阶上。

清代，每逢元宵节，皇宫和圆明园等处都举行豪华的观赏烟火的活动。《檐曝杂记》等书记述了圆明园的烟火盛况。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楼前，数顷草坪宽阔平坦，几十架烟火按一定的设计布置。当下午申时，清朝皇帝入座后，先施放瓶花。顷刻间，火树银花，插入云霄。然后由宫女表演灯舞。歌舞完毕后，开始施放烟火，一时，万炮齐鸣，声震如雷，光如闪电，五彩缤纷，金蛇狂舞。施放的烟火

能够呈现出宫殿、亭台、宝塔、楼阁等各种形状。清人揆叙有《连夕观放烟火》诗，以生动的文字，描绘了瑰丽的烟火。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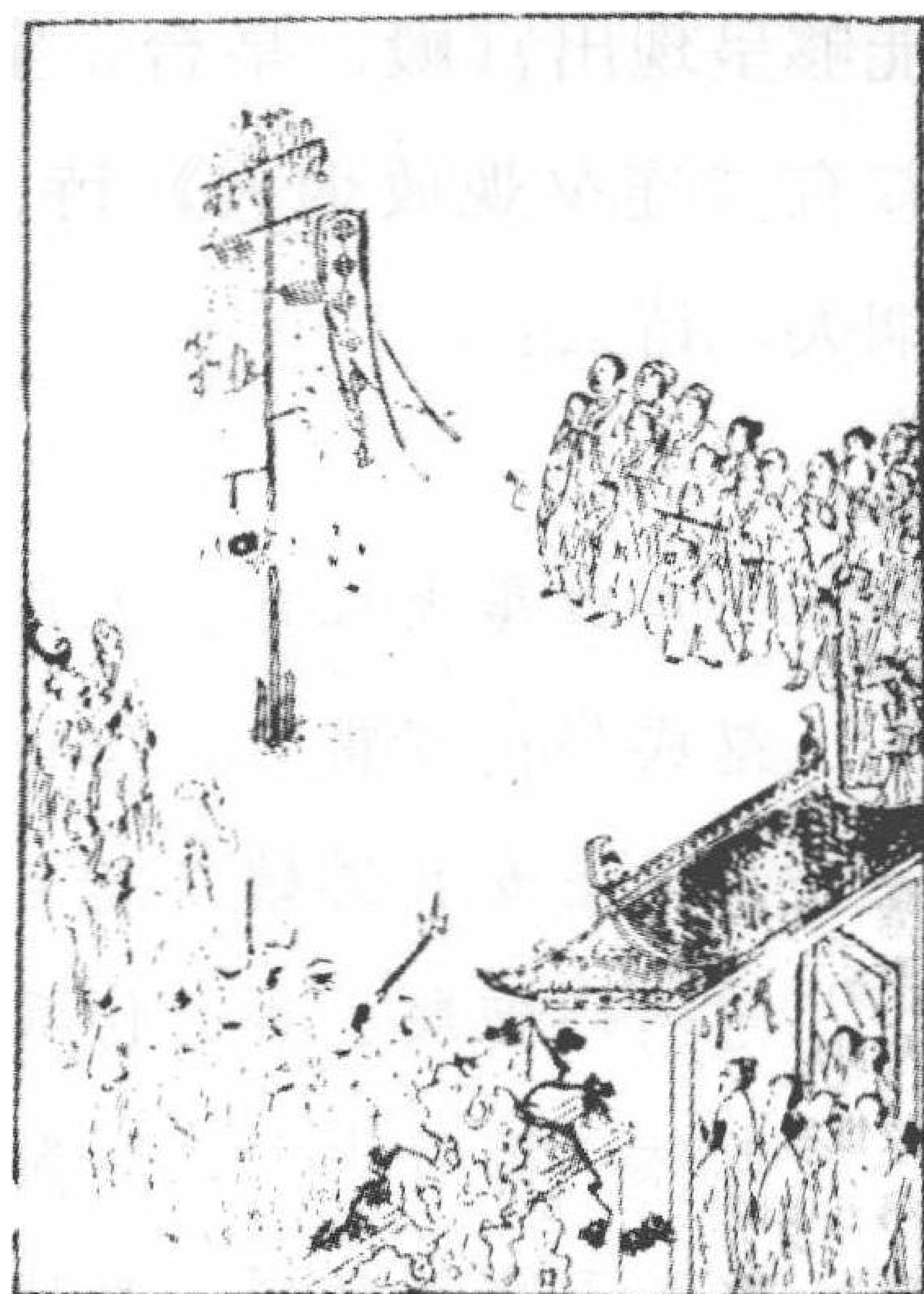
……

一声霹雳火城开，万象空中争涌现。
忽成华树忽雷台，忽作城垣忽宫殿。
忽如士女共游嬉，忽若鱼龙争曼衍。
忽然砰訇殷山谷，伏兵四起相攻战。
忽然一骑冒火入，乱掣长虹走飞电。
炮车下震地轴摇，星球上射天顶穿。
赏心未足翻欲惊，注目难穷不遑眩。
但惜变灭太迅速，未许奇观久眷恋。
……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燃烧的烟火盒子中竟飞出鸽子和喜鹊，可见清代烟火的精妙神奇。

民间的烟火虽然比不上宫廷的烟火，但也相当精致，各种花样的烟火皆全。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清代北京的烟火有一盒内装有几个故事花样的，不管是人物，还是翎毛花草，都非常逼真。勋戚富贵之家，在元宵节之夜都少不了放烟火取乐。《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写道："天上元宵，人间灯夕。……敬济与来兴儿，左右一边一个，随路放慢吐莲、金丝菊、一丈兰、赛月明。"《红楼梦》第五十四回描写荣、宁二府在正月十五燃放烟火的情形，所放烟火有满天星、九龙入云、飞来十响等各色花炮。

一般平民百姓过节玩弄的主要是“地老鼠”、“竹节花”、“霸王鞭”之类。当时街上有车推担挑卖烟花的小贩，边走边唱：“当面放，大梨花，千丈菊。”“滴滴金，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唱词所说的“大梨花”、“千丈菊”、“滴滴金”是几种价廉的烟花。



明版画《放烟火图》

五颜六色的烟火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所以人们说，“此乐人间岂易得”，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六　从《群婴斗草图》说起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一幅珍贵的图画——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画上临水坡岸上青草茂盛，绿柳垂荫，一群男孩在湖石间斗草。他们有的在找草，有的正在争斗，输了的垂头丧气，赢了的兴高采烈，拍手而笑。

斗草亦称斗百草，顾名思义，就是以各种花草来相斗来决胜负的游戏。斗草的起源与古代采草药治病有直接的

关系。相传，远古时，“神农尝百草”，用草药给人治病，从而逐渐形成了每年五月初五人们到郊外采药的习俗。在采药的过程中，人们互相比试，看谁采得多，谁的植物知识丰富，斗草游戏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斗百草出现的时间甚早。汉代学者申培在《诗说》中认为，《诗经》中的《芣苢》篇，就是古代儿童斗草嬉戏时所唱的歌谣。这个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芣苢（fóu yǐ）即车前子草。儿童们斗草时，常用此草来比试草的韧性。《群婴斗草图》中就绘有儿童们采集和比试车前子草的场面。到南北朝时，斗草一词最早出现。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上说：“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到了唐代，斗草游戏已很普遍，上至王公大臣、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幼无不乐于此道。唐朝诗人写下了不少有关斗草的诗句。贯休《春野》诗中写道：“牛儿小，牛女少，抛牛沙上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曰：“抚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陆龟蒙《自遣》诗也有：“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的诗句。此外，韩愈、李商隐、韩偓、司空图、花蕊夫人等都有诗句吟咏斗草游戏。

明清两代的斗草之风更盛。明代田汝成《熙朝乐事》说：“杭城春日，妇女喜好斗草之戏。”清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都是明证。

《群婴斗草图》也为我们提供了斗草游戏在采集、比斗等具体方法上的形象资料。斗草的方法，主要有“文斗”

和“武斗”两种。文斗是众人采到花草后聚在一起，一人报出自己的花草名，其他人各以手中的花草名来对答，还要求对仗，比如：“狗耳草”对“鸡冠花”之类。当一个人报出的花草名，其他人都对答不上时，这个人就赢了。《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对这种斗法有一段详细的描写：



清代金廷标《群婴斗草图》　故宫博物院藏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人，都满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

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我这一枝并头的，怎么不是？’豆官没的说了。”

这段文字，绘影绘声，口吻毕俏，把一群女孩子们斗草的情态笑貌，写得传神极了，显示了艺术大师的浑厚笔力。

当时也有以谁的花草最少见、名贵、吉祥来决胜负的。清人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有《斗草》诗云：“一带裙腰绣早春，踏花时节小园频。斗他远志还惆怅，惟有宜男最可人。”诗前李声振作序说：古代人很早就有斗草的游戏，是“以吉祥而少见者取胜”。诗中的“远志”、“宜男”都是草名。“远志”被古人引申为有远大的志向，但最终也比不过“宜男”，因为“宜男”又叫“忘忧草”。人生在世，谁无忧伤？如果人达到忘忧的境界是最可贵的。所以，斗草时，谁得了忘忧草，谁就稳操胜券了。

“武斗”的方法是两人持草相对，每人两手各持一草（或花）茎的一端，让双方的草茎相勾搭，然后用力一拉，谁的草茎被拉断就是输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表现的正是斗草游戏中这种“武斗”的情景。在文献中缺乏有关“武斗”记载的情况下，此图对此作了真实而细致的描

绘，显得很珍贵。

《群婴斗草图》共画有 10 个男孩，图的左下方有 3 个，一个蹲着身子在拔草，两个对面站着正在斗草。他们所拔的和用来斗的是车前草的花茎。图中部，五个男孩围成一圈儿，中间二人在斗，其他人在旁观看助兴。正在斗的男孩中，一人的竹篮中花草还满，另一个篮中则已经用完了，他们之间的空地上散落着一片残花败叶，表现他们已经斗了好久了。宋代诗人范成大诗中所写的“青枝满地花狼籍，知是儿孙斗草来”正是这种“武斗”之后的景况。还有两个男孩在远处找草，然后用衣襟兜着花草赶来参加。

《群婴斗草图》细致地描绘儿童斗草游戏中的“武斗”全过程，为我们了解古代斗草之戏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

一般说来，“文斗”较适合于上层社会特别是文人阶层；“武斗”则更多地流行于劳动群众特别是儿童之中。但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对于人们增长植物知识，认识自然，娱乐生活都是很有益处的。斗草是一项健康、有趣的游艺活动。

七　丰富多彩的儿童游戏

杨柳儿活，抽陀螺；

杨柳儿青，放空钟；

杨柳儿枯，踢毽子；

杨柳儿发芽，打拢儿。

这首明代童谣以杨柳在四季中不同的变化，说出了儿童们在各季节里所进行的各种游戏，展示出儿童们活泼可爱的童心。

明清两代的儿童游戏有很大的发展，游戏项目繁多，有跳百索、摸瞎鱼、抽陀螺、放空钟、踢毽子、踢石球、掷贝石、放风筝、打栊（lóng）栊等，以及各种玩具。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所以儿童游戏的生命力最强。明清时代的许多童戏一直流传至今，仍受到儿童们的喜爱。

跳百索，就是今天的跳绳。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中说：农历正月里，“儿以一绳长丈许，两儿对牵，飞摆不定，令难凝视，似乎百索，其实一也。群儿乘其动时，轮跳其上，以能过者为胜。否则为索所绊，听掌绳者绳击为罚。”古代人称绳子为“索”。沈榜所记的“跳百索”与现今的跳绳游戏中，多人玩的跳大绳完全相同。游戏时，两个儿童相隔一定距离对面站立，飞快地甩动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其他儿童轮流从绳子上跳过去，跳不过去则为失败。

到清代，跳百索的游戏仍然流行。清人彭蕴章为儿童玩跳百索写过一首歌谣：

太平鼓，声冬冬，

白光如轮舞索童。

一童舞索一童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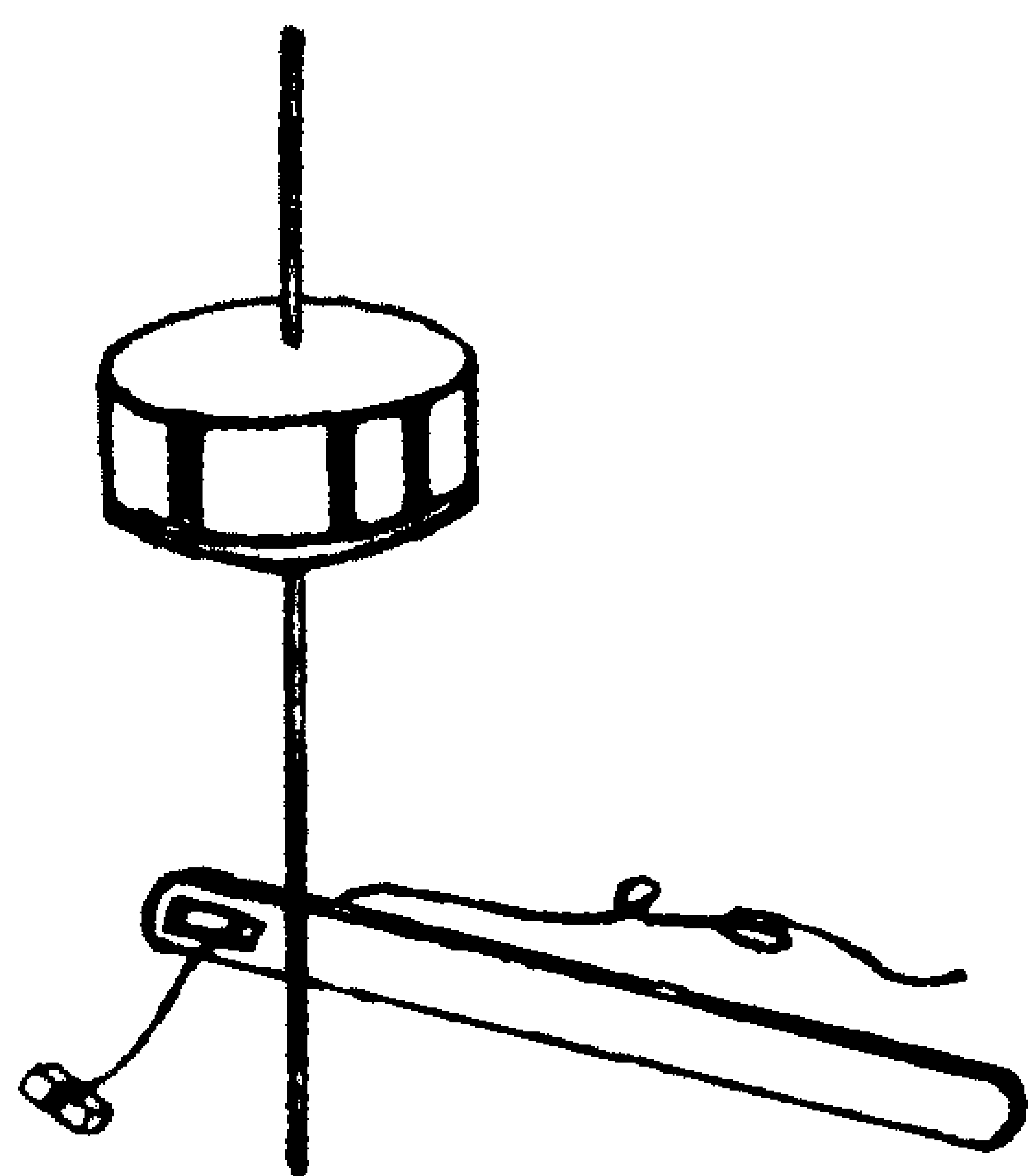
一童跳入光轮中。

儿童们一面敲着太平鼓，一面唱着这首跳百索歌，在

这鼓声与歌声中，尽情地跳百索，多么富有童趣！

摸瞎鱼，类似现今的捉迷藏。据沈榜《宛署杂记》记载，摸瞎鱼的玩法是：许多儿童围成一个圈，两个儿童走到中间，都用厚布蒙住眼睛。一人手里拿着木鱼敲击，另一人判断声音寻摸，以夺得木鱼，或将执木鱼的人推出场外为胜。然后胜者改敲木鱼，再换一人上场来摸，继续游戏。《光绪顺天府志》中记载了另一种"摸虾儿"的游戏。玩法与"摸瞎鱼"略有不同，即执木鱼的人不用蒙目。

放空钟，空钟，也称空竹。抖空竹是北方传统的游艺活动，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传统的空竹实际上包括两种玩具：在地上旋转的和在空中抖动的。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说：当时的空钟外形像圆筒，一根木棒从中间穿过，作为转轴。筒侧有狭长的小口，空钟旋转时空气流入里面引起共鸣，并随着旋转的快慢而发出不同声响。速度快时声大如钟鸣，慢时如虫子振翅发出的嗡嗡声。放空钟时，一手执顶端系有细绳的竹尺，将细绳缠绕在空钟柄上，然后用力拉绳，直到绳从柄上脱离，空钟便落地旋转，因而叫"放"空钟。



鸣声陀螺图

这种"空钟"，从前北京俗称"抽绳转"，天津人叫它"闷壶卢"，有的地方叫"地铃"。这实际上就是

"呜声陀螺"。

到清朝，地上旋转的空竹不再流行，而改为抖在空中，嗡嗡作响的一种。成书于清嘉庆以后的《燕京杂记》中有："京师儿童中有抖空钟之戏，截竹为二，短筒中作小干，连而不断。实其两头，窍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端而抖拨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这与现今儿童玩的空竹已别无二致。

踢石球，北方冬季风高气寒，滴水成冰。一些贫苦儿童衣单袜薄，以踢石球取暖，活血御寒，后来演变成一种有趣的儿童游戏。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说："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盖京师多寒，足指酸冻，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亦蹴鞠之类也。"富察敦崇认为踢石球是古代蹴鞠的变易是有道理的。

踢石球的方法是，将两只如弹丸大小的石球放在地上，一人先将其中的一只尽可能地向远方踢去，另一人接着踢剩下的一只，以靠近前面石球，然后跟上再踢一脚碰击，击中为胜。

抽陀螺，明清两代，抽陀螺是冬春季节较为普遍的儿童游戏。陀螺，形状像海螺，木头制作的最常见，有的还涂上颜色，旋转时形成一圈光环，十分好看。陀螺与"空钟"略有不同。《帝京景物略》说："陀螺者，如小空钟，中实而无柄，绕以鞭之绳，而无竹尺卓于地，手鞭之，则陀螺转无声也，视其缓而再鞭之，转无复，正如卓立地上，

顶光旋，旋影不动也。”

抽陀螺深受当时儿童们的喜爱。清朝初年，元璟借山和尚写有一首《鞭陀罗》诗，以清新洒脱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当时北京小儿鞭陀螺的生动画面。诗云：

京师小儿玉瑳瑳，紫貂裹袖红锦靴。
嬉戏自三五，乐莫乐兮鞭陀罗。
香尘堆里，牛羊马骡；
鞭个“走珠”，鞭个“旋螺”；
随风辗转呼如何。
阿哥、阿哥！
明年带刀佩箭跃马金盘陀。

身穿紫貂袄，脚着红锦靴的俊俏小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抽陀螺。他们将陀螺抽着飞转，并抽出“走珠”、“旋螺”等等花样。他们唱着“阿哥、阿哥！明年带刀佩箭跃马金盘陀”的歌谣，希望像父辈那样横刀跃马，征战四方。这显然是一群满族贵族小儿抽陀螺的群戏图。

明清时代的儿童游戏是丰富多彩的，要在此处详尽叙述是较难的，下面再就几种独特的儿童玩具单独介绍给大家。

八　嘎拉哈和抓子儿

嘎拉哈和抓子儿是清代民间流传的两种女孩子特有的

游戏。

“嘎拉哈”是满语，指的是羊、猪、鹿等胫骨与附骨之间的一块骨骼，学名叫“距骨”。因它略呈长方形，有四个面，玩时可以不断地变换四面的位置，十分有趣，所以逐渐成为一种儿童玩具。“嘎拉哈”起源于女真族。早在金朝时，“嘎拉哈”已经成为贵族和平民所喜爱的游戏活动。近年来，在黑龙江省绥滨县的金朝墓葬，以及金朝五座都城之一的上京故城遗址（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中，先后发现用水晶、白玉和铜等雕刻的嘎拉哈，说明当时玩“嘎拉哈”还是很盛行的。金朝以后，玩“嘎拉哈”的风气在北方各民族中流传，满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也出现了玩“嘎拉哈”的风俗。清朝建立后，这种游戏传到了全国各地，成为中国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直到现在，许多地方的儿童还在玩这种游戏。不过，汉族称这种游戏叫“抓羊拐”。

“嘎拉哈”的玩法各式各样，各民族的玩法也各不相同。清朝初年，徐兰在《塞上杂记》一书记载道：“嘎拉哈”分四面，凸出的一面称“珍儿”，凹进的一面称“鬼儿”，另外两面称“背儿”和“梢儿”。人们就利用这四个面的不同变换来进行游戏。玩时，二人把“嘎拉哈”若干抛在炕上，以珍、鬼、背、梢的顺序，用手指弹击，即珍弹珍、鬼弹鬼，同类对同类，打中则赢得一枚，如撞到其他，则算负，罚出以前所赢的，并改由对方玩。最后以所赢多少决胜负。这是清朝初年的玩法。到民国以后，主要

流行一种“撂嘎拉哈”的玩法。用一个石子抛到空中，在未落下之前，用手迅速地把“嘎拉哈”，按珍、鬼、背、梢的顺序翻转，然后把石子接住，再抛，再翻，谁翻的次数越多，谁就是优胜者。此外，还有“拉珍儿”、“搬珍儿”、“打嘎拉哈”等许多玩法，锡伯、藏、蒙古都有自己独特的玩法。

“嘎拉哈”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的儿童游戏，在汉族也有一种类似的游戏，叫“抓子儿”。《帝京景物略》中就记载了这种游戏。每到春节，女孩子们就要玩抓子儿，游戏的关键是要做到不停地“掷、拾、承”。玩抓子儿要准备好小石子、杏核、桃核等当作子儿，玩时把手中的“子儿”先向空中一掷，反手接住其中一枚。再把接住的这枚掷起，趁未落之际，很快抓起下面的子儿，还要把掷起的再接住。抓下面子儿时，有一定的规矩，有时规定第一次抓起一枚，第二次抓起二枚，递增上去，直到抓完为止。有时抓这个不能碰那个，抓这边不能碰那边。有时规定要隔几个抓几个，或一把都抓起。限制不同，玩法多样，十分有趣。《红楼梦》第六十四回有一段文字，生动描写了麝月、秋纹、碧痕、紫鹃、芳官、晴雯玩抓子儿的情节，十分精彩。如今，在许多乡村还保留着这种有趣的游戏活动。

“嘎拉哈”和“抓子儿”虽然是两种普普通通的儿童游戏，但却反映中国民族文化的悠久和相互融合，以及富有艺术的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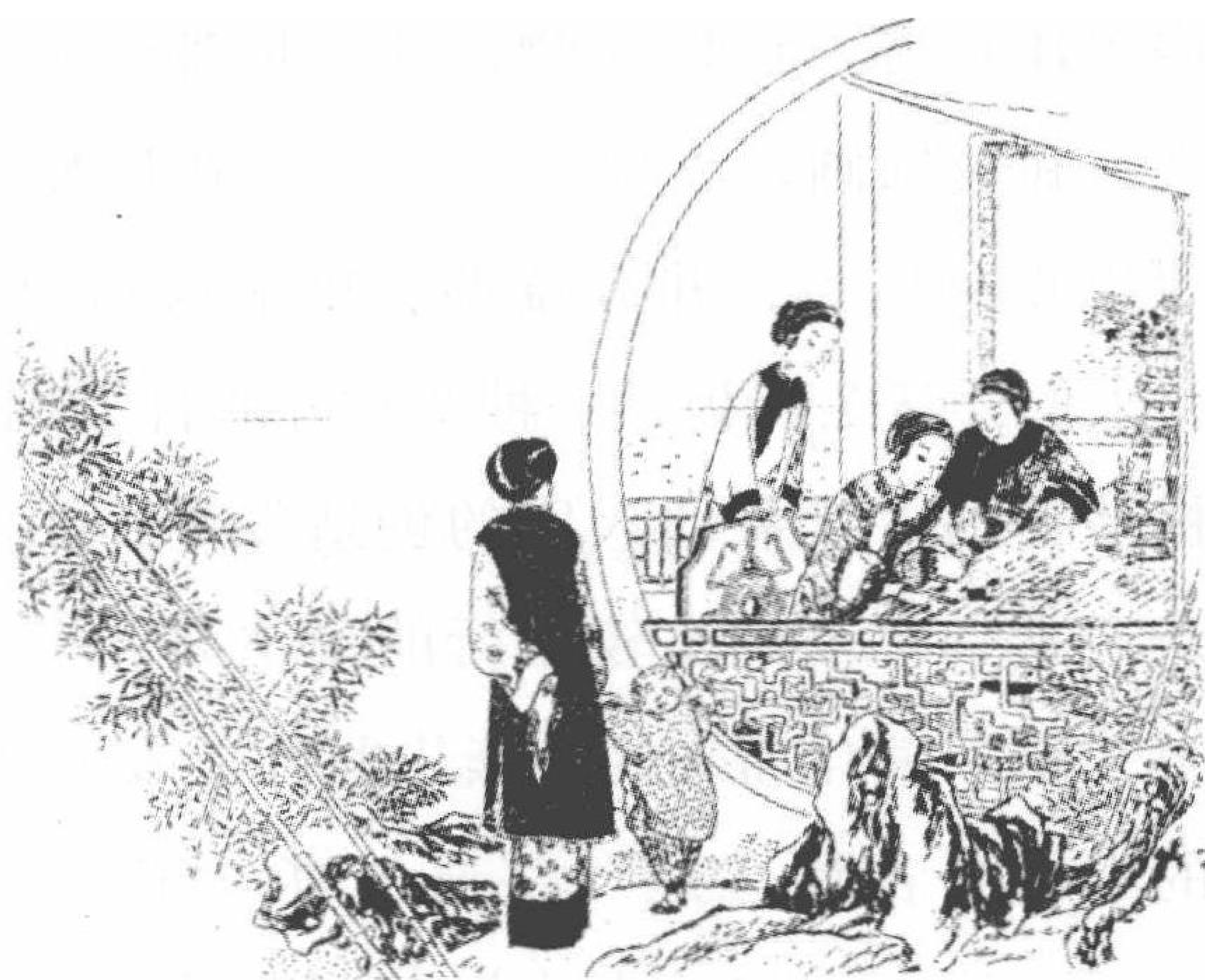
九 七巧板

七巧板，又名“智慧板”，它是我国传统的拼板游戏活动。七巧板是由七块具有特定形状的纸板或木板组成的，可以用来作拼板游戏。七巧板虽然只有七块，但拼组成的图像，却是五花八门，变化无穷。用七巧板拼组的飞禽走兽和人物造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用七巧板拼组的花卉器皿，房屋建筑等，神似实物，妙生情趣；至于用七巧板拼组的文字和装饰画，更是别具一格，引人入胜。因此，人们从中可以得到乐趣，并有益青少年增长知识，开发智力。所以，人们公认七巧板是一种非常好的智力玩具。

七巧板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关于它的历史，历来众说不一，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七巧板是由古代的“燕几图”演化而来的。燕几也叫“骰子桌”，是宴筵上所用的桌子（古代“燕”字通“宴”字）。这种小桌子最初是六只一套，它们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在宴会上可据具体情况，或分或合拼搭出各式图案，以此增加宴会的欢乐气氛。平时，这种小桌还可以当作摆设，布置厅堂，陈列书画古玩。燕几在宋代十分流行，宋朝人黄长睿专门撰有《燕几图》一书，详细地记载了燕几的产生、发展和制法。后来，燕几从六只变为七只，又称“七星桌”，用来“按图设席，以娱宾客”。此时的“燕几”已与“七巧板”

大体相同，只不过是立体的、大型的“七巧板”罢了。

燕几图是怎样演变成七巧板的呢？根据现在的资料分析，可能是古人在设计燕几图时，感到把七张小桌摆来摆去很不方便，于是就用小薄板代替桌面拼组各种图案，并把这些图案画下来，需要时，挑选恰当的图案，按图摆设小桌子。代替桌面的七块小薄板就成了后来的“七巧板”。燕几图演变成七巧板后，因它拼出的图式变幻无穷，对启迪思维、丰富想象颇有益处，加上制作方法简便，因而问世后不胫而走，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民间游艺。



仕女七巧板图

七巧板在清代风靡一时，现存最早的七巧板书籍就是清代碧梧居士潘氏辑印的《七巧图合壁》。这本书是清嘉庆（1796～1820）年间出版的，以后又有好几本关于七巧板的专门著作陆续问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桑下容著的《七巧新谱》和钱选青辑印的《七巧八分图》。特别是咸丰年间

（1857）慈溪严笠舫首创了“七巧书法”，突破了以往七巧板以拼搭人物、器皿为主的传统，把书法艺术与七巧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出了独具一格的“七巧行草字”。光绪八年（1882）由著名书画家吴昌硕题签的《听月山房七巧书谱》一书发行后，在书法界轰动一时，成为人们争购的收藏品。

从19世纪起，七巧板逐渐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欧美各国把七巧板称作“唐图”（Tangram），意思是中国的拼板游戏。

1805年，欧洲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七巧板的书，名叫《中国儿童新编七巧图》，书中有24张七巧图，并按字母顺序排列。从此，七巧板在欧美各国流传开来，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游戏。七巧板游戏在欧美各国的流传速度是令人惊异的。在1818年之前，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出版了有关七巧板的书籍。意大利出版的一本游戏书《中国谜解副刊》除了介绍七巧板的拼摆规则外，还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书中讲道：“从七巧板这种巧妙绝伦的游戏上看，中国是文明的，非有人所说是野蛮的”。

七巧板中所含的数学知识特别受到欧美数学家的重视，直到如今，英国皇家学会学员，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在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高度评价了七巧板，认为它与“几何剖分、静态对策，变位镶嵌等有关，也与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师用在窗格上的丰富几何图案有关”。

1918 年，美国出版的《时髦的中国之谜》一书中认为七巧板是一种普遍适宜的消遣游戏，男女老幼、高官显贵、平民百姓都可以玩，而且令正直的人们赞赏的，是它不像其他赌具那样，时常会输掉自己的钱财。书中还有一首《机巧的中国之谜》的诗，对七巧板推崇备至。其中写到：

就是说，在精神疲惫消沉的时刻，

只有在七巧板中才能找到舒适；

七巧板不知不觉地吸引了我们，

在忧郁中只有它能使你欢愉。

可见外国人对七巧板的喜爱。在美国出版的《流行的中国拼板游戏》等书中记载：曾经显赫一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是个热情的七巧板游戏爱好者，即使在被流放海岛后，还经常玩弄七巧板。这带动了一些人对七巧板游戏的一种特殊兴趣。如今，在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等国家，每年都有一些七巧板书籍和各种新颖的七巧板玩具问世，中国的“唐图”已经成为外国人日常消遣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在七巧板之后，清代光绪年间人童叶庚又创制了“益智图”，即十五巧板。1878 年，童叶庚编的《益智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快流传开来。鲁迅先生对这种既可消遣娱乐，又可锻炼智力的拼板游戏十分感兴趣，多次托人到杭州购买《益智图》、《益智图千字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七巧板和“益智图”。他们认为七巧板并不是拼图玩具的最少限度，努力探索更少的巧板玩具。1987 年，一位名叫顾伟国的年青人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立钻研，设计出巧妙的拼图玩具“五巧方”，获得成功，受到许多专家的赞赏。可以预言，以七巧板为代表的拼板游戏仍将继续发展。

十　消寒迎春的“九九消寒图”

古时候，人们将冬至后的81天，分为9个段落，称作“冬九九”，也就是所谓数九寒天的由来。在寒冷的冬天，室外活动受到限制，人们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娱生活，消磨因不能外出而带来的苦闷，便发明了“九九消寒图”这种消遣游戏。

“九九消寒图”究竟出现在何时？尚未见到确切的记载。南朝梁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一书中有“俗用冬至日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的说法，这是有关九九消寒风俗的最早记载。而最早记述“九九消寒图”的是元代诗人杨允孚的《滦京杂咏》。其中一首诗云：“试数窗间九九图，馀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杨允孚又注解说：“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日图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作杏花，即暖回矣。”可见，“九九消寒图”的游戏，在元代已经产生。

明代宫廷中盛行填画“九九消寒图”的游戏。每年冬至节前，司礼监印刷许多“九九消寒图”，由宫眷们贴在墙

壁上。一般是画青梅一枝，为瓣八十一。自冬至日起，每日用丹笔染一瓣，过九天为一九，九个九天共八十一天，待瓣染尽则寒冬消逝，春天来临。有的在消寒图上还要书以“九九消寒歌”，例如：一九，“冬至才过一九逢，家家闭户避寒风。风送雪花如斗大，飞来飞去满空中。”《明宫词》一书有多首宫词描绘了填画“九九消寒图”的情趣。

清代宫廷中填画“九九消寒图”的游戏更加盛行，并在花样上愈加别出心裁。道光皇帝御制了一幅“九九消寒图”。上书“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每字都是九笔，符合九九之数。从头九第一天开始填起，逐日填廓，每字九笔，每笔一天，每填写完一字，便过一九，全句填完，九九八十一天也就过完了。用硃笔写完当天一笔后，还要在笔画上用白笔填写上当天的天气情况。如：“过午狂风”，“天气清凉，微风扑面。”“终日凉风侵入皮肤，如刀刺。”“大雪纷飞”等。当一幅“九九消寒图”填写完，便成了一冬的天气记录。九九消寒图除供娱乐消遣之外，在当时还是记时、记气候的有效工具。此外，还有书“春前庭柏風送香盈室”九字为一幅消寒图的。



九九消寒图

清朝末年，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生活空虚无聊。他的侍臣编制了两种“九九消寒图”供他娱乐消遣。一种是“井”字形，九方格，每格内有九个圆圈，共为81个圆圈，一天画一个圆圈，九个圆圈画完，表示过一九。在圆圈内则用我国古代的阴阳鱼图案来表明天气情况。阴阳鱼由黑白两色组成，一个圆圈中，一半是黑，一半是白，构成阴阳相对，黑色象征阴天，白色象征晴天。在黑的一半中有一白眼，在白的一半中有一黑眼，形状似鱼，故名阴阳鱼。另一种“九九消寒图”亦叫“消寒益气歌”，共有九个方格，格内绘有九个圆圈，采用上点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当中的方法，在圆圈上加点，来表示天气变化情况。每格又都有图名和歌词，所以叫“消寒益气歌”。

此外，还有“九九消寒诗图”等形式。诗图是每一九为四句诗，共36句。全诗252个字又环绕着“雁南飞哉柳芽待春来”九个字，组成葫芦、寿桃、花朵等形状，既可读咏，又可填画，很有艺术性。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清宫的一幅“九九消寒诗图”。诗文如下：

头九初寒才是冬，三皇治世万物生，
尧汤舜禹传桀事，武王伐纣列国分。
二九朔风冷难当，临潼斗宝各逞强，
三翦一怒平六国，一统江山秦始皇。
三九纷纷降雪霜，斩蛇起义汉刘邦，
霸王力举千斤鼎，弃职归山张子房。
四九滴水冻成冰，青梅煮酒论英雄，

孙权独占江南地，鼎足三分属晋公。

五九迎春地气通，红拂私奔出深宫，

英雄奇遇张忠俭，李渊出现太原城。

六九春分天渐长，咬金聚会在瓦岗，

茂公又把江山定，秦琼敬德保唐王。

七九南来雁北飞，探母回令是彦辉，

黄夜母子得相会，相会不该转回归。

八九河开绿水流，洪武永乐南北游，

伯温辞朝归山去，崇祯无福天下丢。

九九八十一日完，闯王造反到顺天，

三桂令兵南下去，我国大清坐金銮。

这首“九九消寒诗图”，从三皇五帝讲到清朝建立，扼要地叙述了我国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提到了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文字生动有趣，在娱乐消遣中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

“九九消寒图”作为一种高雅的冬季文墨娱乐消遣，在中国古代娱乐文化的百花园中，可谓是一朵独出心裁的奇葩。

十一　隆冬时节话冰嬉

在我国北方地区，汉族及少数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各种冰上游艺活动。人们称冰上游艺活动为“冰嬉”。

据文献记载，明朝时，每到三九寒冬，冰封大地，皇帝便携皇族、嫔妃及侍从大臣到位于皇城内的太液池（今北京北海）乘冰床取乐。冰床，也称“拖床”，既是一种冰上滑行用具，又是一种冰上娱乐玩物。明嘉靖皇帝常坐冰床往返于太液池东西两岸。当时阁臣夏时言曾有“胡床稳坐渡层冰”的诗句。《天启宫词》中载有一首冰床诗：“西苑冬残冰未澌，胡床安坐柘黄衣。行行不藉风帆力，万里霜原赤兔飞。”注曰：“西苑池冰既坚，以红板作拖床，四面低栏赤红色，窄仅容一人，上坐其中，诸珰（太监）于两傍用绳及竿前后推，往返数里，瞬息而已。”这描述了天启皇帝乘冰床取乐的情景。

清朝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自古重视冰上活动，因此入关以后，冰嬉大为盛行，有“国俗”之称。清朝诸帝中，以乾隆皇帝最好冰嬉。《高宗御制诗集》中有不少关于乘冰床的诗句。《腊日坐冰床渡太液池志兴》诗中有“不知待渡霜花冷，暖坐冰床过玉津”之句。乾隆皇帝乘坐的冰床，用两条厚木板做成向上的翘头，钉上铁条。两板之间用木制横带固定，其上敷以平板，板上四角立柱，上支顶盖，翘檐飞角，周挂帷幔，上以龙凤为饰，里面铺着方茵茸燠，上放檀木坐榻，铺以貂皮坐褥。这比起天启皇帝坐的冰床华丽多了。

明清两代，冰嬉在北方的民间很普遍。民间的冰上之戏较之官方的冰嬉更加生动有趣。冰床是民间冰上之戏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的人们，“将拖床结连一处，治酌陈肴

于上，欢饮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真是乐趣无穷。清代有首竹枝词这样描绘到：

十月冰床遍九城，游人曳去一毛轻。

风和日暖时端坐，疑是琉璃世界行。

除冰床外，民间冰嬉还有不少花样。如滑冰、打滑挞、冰上蹴鞠等。

在民间，滑冰是一种娱乐活动。清代北京的什刹海、积水潭等处，每逢冬季就有许多人前往滑冰。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说：“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有的初学者，免不了摔上几跤。《北京竹枝词》写道：“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滑冰活动的愉快心情。

清代还有一种打滑挞的冰上游戏。据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打滑挞的游戏是用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然后人们穿上带毛的猎皮靴，从顶上站立着滑下来，以到地不倒为胜。这种游戏既惊险又有趣，深受男子汉们的喜爱。

清代还出现了滑冰与蹴鞠相结合的冰上蹴鞠。冰上蹴鞠主要盛行于宫廷中。《帝京岁时纪胜》说：“金海冰上作蹵鞠之戏，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位而立，以革为球，掷于空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在民间，冰上蹴鞠也有所流行。清人东岩居士在《帝京岁时纪胜补笺》中说：“什刹海、护城河冰上蹵鞠，则皆人民练习

者。”但是因为冰上足球的制度还不完备，所以发展得不广泛。

十二 “东方圣鱼”传四方

金鱼是中国特产的珍贵观赏鱼。明清时，它作为“友好使者”，传到世界各地，成为这些国家人民美化生活、观察娱乐的重要爱物，被誉为“东方圣鱼”。

日本是中国金鱼输入最早、品种最多的国家。公元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中国泉州商人携带一批金鱼从泉州乘船到达日本长崎，在山阪城（今大阪附近）居住下来。这批中国金鱼在日本不断繁衍，形成现在日本人称为“和金”的那种金鱼。“和金”是中国金鱼在日本最古老的家族。它体形细长，有红、白、黄、红白花斑等各种颜色。金鱼一到日本，王公贵族，武士官吏，都纷纷出高价争购，加以饲养，一时成为他们最心爱的东西。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皇帝派遣官员携带大批物品出使琉球，其中就有中国金鱼。大约在公元1772～1788年，相当于日本安永和天明朝代，这种在琉球繁殖起来的中国金鱼传到了日本的鹿儿岛县。这种金鱼体形短圆，脊背弯曲，头小而尖，所有的鳍都很长，颜色有红、白、花斑三种。日本人称其为“琉金”，意思是从琉球传入的金鱼。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在“和金”、“琉金”两种金鱼传入日本之后，曾被荷兰人称为“荷兰狮子头”的中国金鱼，经过台湾转到日本。这是一种头上包有一层厚厚肉瘤的狮子头金鱼，相当珍贵美丽，日本人后来把它改名为“金鲭”。此后不久一种定名为“兰鲭”的金鱼又传入日本。这两种狮子头金鱼都没有背鳍。由于背鳍消失，背的形状发生弯曲，很像日本妇女用的发梳，所以又称“梳子背金鱼”。它们的尾鳍有三尾、四尾、樱花尾。颜色有红、黄、橙黄、白、红白花斑等。这两种金鱼，日本人认为最美丽，尤其受到姑娘和家庭主妇们的喜爱。

又过了几十年，中国金鱼中的龙睛鱼、珍珠鳞、水泡眼、望天眼、紫帽子等品种，都陆续输入日本，成为中国金鱼在外国品种最多的国家。

1643 年（明崇祯十六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马蒂尼·马丁（Martini，Martin 1614～1661）来到中国，在杭州、兰溪等地传教。他非常喜好中国文化，特地为自己起个中国名字，“卫匡国，字济泰”。杭州是中国金鱼在南方的养殖中心，马蒂尼很快就被美丽的金鱼所吸引。1651 年（清顺治八年），因罗马教廷内部发生礼仪之争，马蒂尼奉命返回罗马。

马蒂尼在中国留学生郑维信的陪伴下，从福建乘荷兰商船，途经荷兰返回意大利。临行前，马蒂尼购买了“龙睛”和“红头”等金鱼品种，装在直径三尺、高六尺的带盖木桶里。这些金鱼经过几个月的海上颠簸，居然奇迹般

地活了下来，并在荷兰展出。马蒂尼在他《致杭盖洛神父的信》中说："我奇迹般地发现，这些瑰丽神圣的中国金鱼竟然活着，已长到八英寸。它给教友们带来难以比喻的惊奇和赞美，它使荷兰博物学家为之倾倒。你要知道，我是多么快活，这是我的中国学生厄玛诺（郑维信）的伟大功绩。这些中国金鱼将留在荷兰，我相信，这将是个历史事件。"这样，中国金鱼漂洋过海第一次来到欧洲的荷兰。随后荷兰的生物学者经过不断地认识实践，终于在 1728 年人工养殖金鱼成功。随后，中国金鱼经过荷兰，又传到意大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国家，受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喜爱。

19 世纪中，广州商人方棠，在美国旧金山经商20 年，积累 3 万贯家财。他深知美国人好奇的心理，从广州运进了一批"龙睛金鱼"，以每条 30 美元作为起码的价格，公开拍卖。结果，购买者十分踊跃，拍卖七天，所有金鱼全部售完，有一条金鱼卖到 170 美元。与此同时，方棠还推出中国的佛山陶瓷鱼缸，配合金鱼出售。金鱼传入美国后，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成为中产阶级家庭中时髦的观赏摆设。1876 年，美国费城举办赛珍会，中国金鱼盛在华贵的龙瓷鱼缸里，使美国观众叹为观止。经过赛珍会，全美国都认识了美丽的中国金鱼。中国金鱼便进入美国普通人民的家里。

此外，中国金鱼还流传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南洋国家，并辗转到南美的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到 20 世纪初，被誉为"东方圣鱼"的中国金鱼，已经传到世界几十个国家，成为这些国家人民喜爱的玩物。

后　记

沿着中国古代游艺的滔滔长河，走马观花地浏览了几千年来游艺发展的历程，并着重撷取每个时代最具特色的游艺内容介绍给大家。一本小书难于展现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游艺宝藏，对此作者常常有望洋兴叹之感。

中国人总是愉快，总是高兴，总是自得其乐，总是韵味无穷而敏慧，不管历史的车轮是多么沉重，中国人永远是乐观豁达的，他们的生活中也总是充满了欢愉。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发展之中，才凝结出——这独具异彩的中国游艺文化。它根植在人民之中，仍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巨大深远的影响。如今，我们只有吸取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蓄的这部分精华，才能使现在、将来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充满欢乐。

作者虽有志于中国古代游艺史的研究已很久，但本人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故而书中的不当之处，尚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古代游艺
作者=王宏凯著
页数=230
SS号=12801288
出版日期=2010.08